

MG

D951.267

2

蘇聯小叢書

蘇 聯 監 獄

著 物 柯
譯 詒 祖 費

王雲五 章 慈 主 編



3 1799 9285 6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引言

蘇維埃刑罰制度的重大責任·····	一
生產工作的教育·····	一一
囚犯們的空間時間·····	二六
公共制裁·····	三六
權力比法庭大的組織·····	四八
當囚犯們生了病·····	五八
流浪的孩子們·····	六一
布爾雪伏的公社·····	七三
少女教養區·····	九二

難弄的女犯.....	一一一
入獄的紅軍士兵和黨員.....	一一三
開放門戶的監獄區.....	一三三
一 農業監獄.....	一三三
二 靠近鐵路的監獄.....	一四五
他們不願我參觀的一個監獄.....	一五四
難馴和落伍的人們.....	一五九
囚徒的評論.....	一七六

引言

如果有人想研究蘇聯刑罰制度的工作，藉以明瞭些他們改良監獄的新原則究竟實施到怎樣地步，在開始調查之前，先該寫幾次自薦書和詢問書，徵得他們人民司法委員會的同意。我在一九三一年秋天決意往俄國，但直至翌年五月，纔接到他們正式允許的消息，准我參觀他們的監獄。起初，我料想自始至終要被他們監視的，我決心屆時一定拒絕他們爲我而設的參觀計劃；可是到達莫斯科以後，我非常奇怪，那兒竟絕對沒有預先佈置什麼。一位蘇聯人民司法委員會的刑事庭長阿潑退爾（Ардаль）十分大方地答覆我一切問題，並且給我一張通行證，無論何時，在莫斯科任何監獄，我都可以隨便進去。

頭幾天一輛很忙的公務車給我使用着，後來我該自己認路了，那是不十分方便的事，我必須學會怎樣登上這老是擁擠不堪的電車……然後在到目的地時擠下車來。我滿想懂得一千個俄國字已足夠日常生活上的應用了，然而這卻不夠對付複雜專門的問題。當然常有些會講德國話

的公務員和囚犯，我可以直接跟他們攀談，可是他們都很忙，繁瑣的盤問太費他們的時間。

於是，兩星期後，我到人民司法委員會去要一個譯員，他們叫我到旅行機關裏去設法，但我不願這麼辦。因為我最怕給淺薄的翻譯弄糟。結果，罪犯研究所裏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工人自願在空暇時候每天幫我四五小時忙，從她透澈的學識以及各項問題的研究裏，感謝她，我收集到不少有價值的材料。不過三星期後她不得不走了。於是只剩下我一個人。

那時我已熟悉了監獄中的主要工作，也明瞭好幾個機關的情形，我的俄文程度已經能夠和沒有監獄方面專門知識的譯員作伴當了，不過我依舊需要翻譯。經過很多麻煩，我找到一位退職的小學教師，但後來她不能和我旅行，過了一月，我還得找請別人。

我沒有料想到會碰着這許多困難。我不明白在蘇俄，爲什麼每個有用的人都有極多極多工作的機會，各人都忙碌着自己的職務。我於是努力想避免各種誤會，從各方面觀察蘇聯刑罰制度的內容。幾位負責人員的態度着實使我驚異。他們異常坦白地是善說善，是惡說惡，絕不拘泥；然而一方面卻常不守約，延宕公事，他們的遲緩脾氣常使我的調查進行困難。我的工作極容易得到毫

不遲疑的允許，公務員不在面前，我也可以跟任何囚犯談話。當我必要時要看他們的文件以資證明，他們從不拒絕。在莫斯科警察監獄和太根卡（Targanka）法庭附近一個監獄中，我去探望的監房的門都不上鎖，我能在監獄官面前和囚犯們隨便說話。當然我只接觸普通的囚犯，政治犯監獄的情形大約不同些，我當時沒有打算進去。

參觀了幾處莫斯科四周的「開放監獄區」後，我決定再看看遠處鄉間的設施。調查烏拉山脈、烏克蘭和高加索的監獄。列寧格勒我沒去，想來那邊採用的方法定然和莫斯科差不多。我走遍各處，選着要看的地方。各方面高級人員都知道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姓名上的方（Von）字也不足為我參觀的障礙。（註德國貴族子孫的姓上面常冠以Von字）就只遇見一次例外，那下面會提到的。

囚犯們很有助於我的調查計劃。他們比德國的囚犯自由得多。他們常常能在壁報——囚犯們的舌人——上自由討論，因此他們無須隱藏自己的意見。我常到這些「教養院」裏——例如，我去過蘇可尼基（Sokolniki）十九次，有時整天在那裏——他們准我一個人到處徘徊。我獨自

走到場上，俱樂部、會議室、同志法庭，和囚犯們在一起，常有能說德文的囚犯做我的嚮導和翻譯，解釋我所不明瞭的一切。這樣，我見到他們在工作日和例假日，工作時和閒暇時的情形，明白了蘇俄囚犯的生活狀況。

監獄這東西，蘇俄叫作 *Miesta Lischenija Svobodi*，意思是解除自由的地方，或者叫 *Sak-rize Koloni*，意思是與外界隔絕的區域。為避免以下幾章裏讀者的誤會起見，我將「隔離監獄」和「開放監獄」的意義解釋一下：都市裏舊式監獄的監房都是隔離着的，而開放監獄，既沒有牆，又沒有鎖着的門。蘇聯監獄裏的公務員德國人看來簡直不像獄吏，可是他們的才能卻並不在德國官員們之下。

我也偶而發現了幾處未臻完善的地方。可是，我看到更多的好現象，他們一日千里的進步之處，我希望別國能夠接受，那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蘇聯之監獄

蘇維埃刑罰制度的重大責任

蘇維埃刑罰制度建立於無產階級獨裁的政治制度之上。共產黨祕書浦司陀歇夫 (Postysaev) 曾於一九三二年二月第六次全蘇聯司法長官大會席上這樣說：「司法是一種對付階級敵人的威權，是保護新主義的戰器，是工人自治的導師。」

毫無疑義地，大家都承認凡侵害無產階級利益的人，如盜竊公產、妄用公款、怠工、同盟罷工而毀壞公家財產之輩，一定得受嚴厲的處分。凡人做不利於工廠工人的安全和健康的事，如投機事業、重利盤剝、假公濟私、欺騙大眾以及破壞工人的紀律，都算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有被從嚴定罪的。可能在鄉村裏，爲了私利藏起穀物，等價高時出售，或濫費穀種，罪也很重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跟蘇聯不同了，人們對於上述那些罪犯的重罰，定會十分驚異的。

每個蘇維埃公務員都負有重大的責任，倘有不正當的事或因不小心而起的意外發生，他是最先應受查詢的人。任何事有意搗亂建設事業，妨礙工人正當的活動和言論，阻撓工人的自由研究，都都得受處分。有許多罪案資本主義國家並不重視，有些簡直不成其爲罪案，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裏便大不相同了；因此，蘇聯罪犯的人數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多些。不過有一點我們該記住在沙皇統治之下，俄國一共有監獄四六八所，革命以後，馬上減剩二八五所。依最近的調查，現在祇有一二三所，而且開放監獄比隔離監獄完善百倍。

共產政策常依照着蘇聯內部的情形而因時變動。最先是共產主義的軍政時期，接着是新經濟政策。這是容許一部份私人小商業和國營的或合作的貿易同時存在，使和平的建設事業少受阻撓。國內工業化的工作慢慢地進行着，最後富農的勢力瓦解了，實地的示威和宣傳，使農民相信合作農場的好處。不消說得，過度時期中當然有不少錯誤。最近幾年內農業政策大致漸漸改變了，趨向於農民集團的統一——集體農場的組織。

因爲蘇維埃想把牠從前的敵人甚至如已定罪的商人和投機事業者之類改變成忠實的公民，所以許多監獄就遇到不少困難。當局對那批不是無產階級的犯人們說，假使他們真的能從事於建設的工作，那末五年之內，他們能恢復公民權。我在人民司法委員會聽到過，一萬以上的犯人，未及規定的期限，已經重得公民權了。

蘇聯刑罰制度的本身重在苦幹，它希望把頗有成效的改善青年罪犯的方法能夠同樣適用於成年的罪犯，這些以後我將詳細提到。失業的消滅，是五年計劃的結果，使刑罰制度在各方面更有革新的可能。

以下幾頁我記下些罪犯的數字，這些罪犯在其他各國也該定罪的，因此，這些數字在統計上比較有用。

一九二六年蘇聯最近的戶口調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國民共一〇〇、八五八、〇〇〇人，囚犯人數也同時調查出來了。於是此後罪犯研究院的工作差不多是專門找出人數的百分比來研究犯罪曲線的變化。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大學出版的一本蘇聯法律學中，密該兒依

薩亦夫 (Michael Issajev) 教授在他的專門作品裏提示出值得注意的數字：在一九二六年，蘇聯男罪犯計六一四、六六一人，女罪犯計九〇、三五〇人，其中男三二九、五三六與女三五、三四二人爲侵犯個人罪，男一三三、六三〇人與女二一、一二七人爲侵佔財產罪，男三九、七八五人與女九二八人爲怠忽公務罪。調查戶口時，在獄的侵佔財產犯人數計男三〇、八五六人，女二、一一〇人。

同年，男七、四二五人和女一、七五五人被判暗殺和殺人罪。男一一、八一八人和女五七五人預謀傷人罪，男四五、八八六人和女九、六二三人毆擊罪，男四、二三五人和女三四人淫亂罪，男一九、二七七人和女一四、六〇七人毀謗罪，男二、三七六人和女二、四三一人敗人名譽罪。

一九二六年的數字表示出從前犯過罪的十八歲至十九歲間佔百分之十，二十歲至二十四歲間佔百分之三十一。犯過三次或三次以上罪的青年在二十歲至二十二歲之間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二。這個事實表示出爲什麼他們的政治保安局要格外致力於改造青年的無產階級。如果

拿一九二六年的數字跟以後的比較，頗有深長的意味。損害個人罪的囚犯在一九二九年自百分之百增加到百分之一六八，而一九三〇年則減至百分之九一·六。傷人罪在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增至百分之一四五，一九三〇年則降成百分之四四·六。如以一九二七年爲標準數百分之百，偷竊罪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增至百分之一五一，而一九三〇年則減至百分之一四一，但這樁記載定然有誤，一九二七年的偷竊罪實際上還要多，因爲實際上現在的警察格外訓練得好，即使細微的罪過也要追究。我在罪犯研究院的表格上看見過暗殺案數和被判暗殺罪人數的統計；現在的莫斯科警務工作確乎比從前周密得多。在蘇俄，謀殺罪就等於殺人罪。

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三六八件殺人案中祇有七三件水落石出。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六二九人被謀殺，只擱到三六九個囚首。但在一九三一年，一六七件殺人案卻有一六三件審查清楚。莫斯科謀殺案的所以多，可以拿人口的密集來解釋的。每年成千成萬的人水一般地從鄉村流入都市中新設立的工廠中去。莫斯科人口原是一百五十萬，近十年間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所以我們應該知道，比較起來，殺人案件的數目已大大的降低了。這粗看統計容易忽略的。另一方面，較小的罪案亦

減少得令人驚異。例如誣謗和敗人名譽的案件，一九二九年計三二、九三一件，而一九三一年減至五、九四五件。那原因的一部份是各種工業組合中的同志法庭也受理不緊要的案件。他們有權徵取十盧布以下的罰款，有懲戒權，最重的罰則是宣布驅逐出同業組合。

一九三一年的數字有用的很少。因為五年計劃實行以來，工作的機會多得不能計算，毫無疑義地犯罪的行爲是銳減了。

蘇聯的刑罰制度目標並不在報復或處罰，而是增加工人數目，加強勞工組織，來替代刑罰。蘇聯司法的領袖和人民司法委員會的委員告訴我，蘇聯政府所做的主要事項，無不以造福大多數人民爲最終目的。所以罪犯住看守所的期間必不超過兩月。倘然檢察官一時不能完成其工作，他一定要得到了上司特別的允許，然後可以延期。延期至多十四天。

可能的話，罰款，訓話或一年以內的強迫工作得替代監禁。在目前，政府明令強迫工作禁止延長到五年以上。強迫工作期內，須扣工資百分之二十五，除去坐牢，百分之六十五的犯人是定強迫工作罪的。俄國還有一種特別的處分，是把囚犯發配遠地，爲期三年至十年，強迫工作則或有或無。

沒有被判決強迫工作的囚犯，得在指定區域內自由行動。如果判決強迫工作，那末工作的地點由法院指定，但他們的工資，至多被扣掉百分之十五。

法庭只審判十六歲以上的犯人，十六歲以下的犯人由青年犯罪委員會處理，改造他們的方法，僅僅是教育。

蘇維埃的刑罰制度將教育每個囚犯成爲有用的工人，故極致力於監獄中的生產工作。這樣的教育是需要時間的，因此罪犯的監禁期沒有在一年以下的。倘使囚犯自己願意，工作可以替代坐牢，兩天的工作抵消三天的監禁。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天工作就能抵消三天的監禁。有期徒刑最重判十年，不過蘇聯的判決很少執行到底的。無期徒刑是不存在的。槍決只用來對付有危大局的罪犯，以儆效尤罷了。大部囚犯如果能守規則，事前可以預算出他們減短監禁的時間。以下幾章，我就詳述這些改良工作的實施。

蘇聯監獄裏沒有不給錢的工作。囚犯的工錢，相當於自由工人的工錢百分之二〇至五〇，按例三分之二發給他，三分之一替他存帳，等他釋放時還他。工錢的多少，根據工作的種類和技巧而

定，工作精巧，錢當然可以多掙。

不識字的囚犯得學習讀書寫字，每個監獄裏設有好幾種課程，預備給不識字和缺乏教育的人們；還有一個包羅一切的工人聯合會教育囚犯，依照囚犯們的天資和興趣，使他們在工作上有所發展的機會。

人民司法委員會給我如下的數字，顯示着囚犯的人數在職業學校裏增加的情形：一九三一年，蘇聯有囚犯七七、〇〇〇人學習工藝。內中約六、五〇〇人在六個月到八個月內完畢他們的課程；一九三二年底一〇、〇〇〇以上的囚犯將成爲熟練工人。

刑罰制度的重要任務還包含着訓練團體生活。因此每個監獄由囚犯們自行選舉出一個文化組織。當局只指導他們開始組織，管理權操在囚犯們自己的手裏，必要時囚犯們就開大會。此外還有工廠會議，彼此鼓勵，以促進工作的進步。

內部的糾紛由囚犯自己組織的同志法庭解決，很少由監獄長官來審判的。每隔五天囚犯們出版一張報紙，還有一種壁報，那特殊的效用，我在最後一章裏將論及。

蘇聯的刑罰制度打算刺激人民，使他們的活動轉向到有計劃的生產工作上去。囚犯們穿他們自己的衣服，不穿制服，獄中不禁止自由談笑，吸煙和奏樂都准許的，他們儘有許多不單調的生活方法。

淒涼的禁錮在蘇聯是不存在的。囚犯們常和同伴混在一起，很少機會獨自孤單另另。

囚犯自治的訓令早頒布在一九一八年，後來漸漸實施到各地。革命前囚犯的日子異常可怕地寂寞，牢裏難得有工作，如果監獄和普通的縫衣店或鞋店之類離得太遠，他們簡直就沒有工做。每天只准半小時散步，整日整夜給看着。革命以後，囚犯的守衛兵大減，一部份可靠的囚犯分成兩班，代理獄中守衛之職，幾處開放監獄，連獄外守衛隊也是囚犯充當的。無疑的，囚犯自編的守衛比官方組織的相宜得多，因為他們熟悉同伴的生活，他們是過來人。只有過於頑劣之輩，爲了再不能賭紙牌了，抱怨着這新的制度，囚犯們並不報告當局相互攻擊，他們明白保守秩序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請求取消看守，每間屋子由他們自己負責，結果勝利了。每當監獄行政官例會席上，有

三個囚犯來報告他們所做的一切和尚未改善的地方。

舊制度之下，少數老囚犯對於剛踏進監獄的囚犯有極大的威力和影響，他們熟悉監獄生活，把自己的狡猾花頭教給新同伴。此刻賭紙牌之風已經完全禁絕了。我屢次注意到他們怎樣的鼓勵着囚犯有負責的自覺，用盡方法以圖最後的成功。

工人國家的刑罰制度和她的整個政策是沒有秘密的。她只知道爲勞工的利益打算。這點是要明白蘇聯刑罰制度的人們必須先了解的。

生產工作的教育

德國監獄裏也有工作可做，他們也早已承認囚犯有了事幹，就不會覺得生活的黯淡乏味；可是德國監獄裏的工作並無經濟上的必要，只是經濟學家的胡亂計劃而已。監獄鞋店、裁縫店以及其他行業中學徒的地位毫不穩固，因為工商業公會不承認監獄裏的學徒，而且不准他們加入公會當工匠或老闆。所以雖然囚犯在獄中能夠學習和工作，釋放之後還是無補於事。

德國囚犯跟任何布爾喬國家一樣，監獄裏的時間總是浪費的。囚犯再不會忘卻計算日子，每天晚上懶洋洋地撕去一張日曆——假如日曆能掛在監房中的話。囚犯生活極端枯燥，只能在夢境裏找尋安慰，有的自騙自幻想着，有的等待着意外的新的政變，等待救星的來臨。監獄的門開了，囚犯們恢復了自由出去了，然外界的不景氣，對他一點不客氣，他比一般奉公守法的朋友卻更難找插足之地。

蘇聯的監禁方法全然不同。他們監獄裏的工作是和國家整個的經濟計劃有關係的。每天每小時工作都是必需的，開會的時候，有人解釋使囚犯知道五年計劃一部份靠着他的生產的品質和效率。俄國的刑罰制度把監獄變作學習和工作的場所，使囚犯開釋後成爲合格的工人。監獄這個名字和它的實在，不過便於刺激懶惰不肯工作的囚犯而已。

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許多囚犯管了一部機器之後，纔發現自己的野心，而這野心，以前卻促使他犯罪的，看到同伴孜孜工作，他也就換一條路走了。所有平日捉來的囚犯大都工作得非常勤奮，竭力利用着每一分鐘。

工作實行的情形是這樣的：國家設計委員會送表格到監獄工場裏（各種不同的表格分發各處工廠），於是工作開始了。有些囚犯自己組織了突擊隊，競爭工作，努力想突破表格上所寫的數字。清晨各隊集合，拿出紀錄來，譬如他們超過了規定工作的百分之十，他們將求多多益善，如果發現工作太遲緩，他們就討論其所以然之故，譬如一部份的原料輸運遲了，隊員們就到管理處去交涉，使原料輸運速率正常，必要時他們把這事交到全體的生產會議去解決。

各突擊隊爲着國家的前途，把急速實行預定計劃當作自身的本分，因爲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國成功與否的關鍵。他們發起競賽來彼此鼓勵，每個方法，例如工資和技術成正比，都用來鼓起各人的工作興緻。落伍的工人倘若想多弄錢，必得學習，一學習，他的知識就增加了。囚犯既有權加速生產來減少監禁的時期，那末多勞苦一些也是他自己的利益。

競賽優勝者的報酬，或是金錢，或是有價值的東西，或是意外的開釋。他的名字給記在紅色的板上。各地監獄跟各地的工廠一樣，都有紅黑色的板，最好工人的名字記在紅板上，最壞的記在黑板上；各小隊都有特別的板，這樣各個囚犯知道誰是競賽優勝者，誰生產最少。

在潘姆（Perim）的女子監獄裏，囚犯們聚在一間大廳裏開管理會議。臺上主席位上坐着幾個女囚犯和一個女官。樂隊奏着進行曲，於是官長起立致辭。她講到囚犯的功績：「第一班超過規定數字百分之九十三，第二班超過百分之九十六。做運動鞋的一組比較好；第一班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九，第二班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第二班生產較少，並非她們的錯處，她們的原料到得太晚了。」

同志們！從前第十一組贏到這「紅旗」，現在第七組勝利了。」

那時各隊在悠揚的樂聲中走上前去，一個囚犯莊嚴地把紅旗交給另一個。第四組領到一塊木牌，上面畫着一只烏龜，因為她們是競賽的最末一名。可是第四組的代表中，一個年青的吉卜西姑娘卻贏着獎品的；她眼睛閉着說是她的一組決不永遠保留這隻龜，過幾天一定奪還紅旗的。於是分發獎品。一位得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囚犯被喚出來，在華美的絃管聲裏官員贈她一套衣服。另外一人竟超越紀錄百分之一百二十八之多。其他工作優良的，拿到些鞋子，抹胸或手帕之類不等。

一個細長的女人上前了。她具有堅實的下巴和顯得強有力的嘴唇。拿着她的獎品，她跟大眾說：「現在我走上正路了，我勸告大家照樣跟着我。」這簡短的兩句受得滿堂喝采。大家知道安娜（Anna Wasilovna Zamiatina）像一只老鴉，偷過東西，做過出名的盜匪，此刻她是誠實的工人了，在鞋廠裏當機匠，每月掙一百二十盧布。她跟我說她是很難轉移的，決不輕易放棄她的綠林生活。此後她決意過着有益別人的工人生活了。大家知道安娜極守信用，都看重她。還有一位隊員說

道：「同志們，我們的工作還不十分好，我們必得生產再多些，這個月算作突擊月，我們來創立品質和數量兩方面的新紀錄。」

五年計劃怎樣影響到罪犯呢？和當局談話或懸賞徵求都找不到答覆的，因為我們不能調查出出獄罪犯的行蹤，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工作的機會太多了。囚犯開釋後，每人都能任意選擇職業，但他做多久，他以後到那兒去，卻無法知道了，因此我們不能具體地說出開釋犯的命運。大概囚犯們在出獄之前大都能做很好的工作，他們已經受過訓練了。不熟練工人在獄期內得到不少理論和實際的知識，他們很有自信。我在另一章內將詳述布爾塞伏（Bolsheviki）政治保安局的區域內的情形來證實這些。

有時囚犯在監禁期內改換了職業。在鐵夫立司（Tiflis）的一個監獄行政官自己以前坐過五年牢監。另一官員羞澀地跟我說，他曾以私用工廠公款而被監禁。他受過高等教育，踏進監獄的時候，他覺得他的終生從此休矣。這種觀念雖至今日仍普遍於一般俄國人腦中。他們對於自己國內的監獄情形很隔膜。卻不知道新統治之下的監獄情況，大非昔日的凶險可怕了。他們只知道目

今監獄中有工可做了，如此而已，其他引不起他們什麼興趣。所以囚犯們剛進監獄常常對於自己的優遇表示非常的驚異。

那位喬其亞受過教育的官員剛進監獄時簡直不知所措，他跟我說：「當我進來之後，他們領我到俱樂部去的時候，我不知說些什麼纔好。桌上放着各色各種報章、雜誌、書籍，讓我隨便翻閱。幾天後，他們請我教些不識字的人，我自然滿心歡喜地答應了，於是我教授俄文和喬其亞文。我的學生進步很快，指導員都對我的工作表示滿意，這樣我當着教師，直至執行期滿。釋放之後，我不願回到舊時的工廠了，願意擔任監獄中的職務。我的希望立即成爲事實，現在我做了公務員差不多兩年了。」

我看見了他制服領上的高級徽章。

「怎麼你升得這樣快？」我問他。

「我們的升遷不靠服務的年數，而在乎能力。我已經浪費掉很多時間了，我沒有理由再不努力工作。」

這番話使我了解俄國人怎樣地在替囚犯謀利益。在監獄中囚人被安排得能夠發展自己的能力，開釋後他們能找到最合適的差缺。

再說一位撒帕洛希 (Zaporoschie) 監獄區醫院的醫生。據一個公務員告訴我，他是個極聰明的專家和教授。我很詫異，爲什麼這樣多才的人，老遠走到這樣荒僻的地方。那公務員跟我說道：「他是兩年前拉姆新 (Ramain) 案的被告之一，起初判決死刑，後來減成十年徒刑，你大可以跟他談談。」於是我去和他閒談了一會兒。

我問他：「在這樣大的宿舍裏，和這麼多的囚犯睡在一起，你大致不大舒服吧？」

「一點沒有什麼，」他答道：「我妻子也在這兒住，我們自己另外有小平房。」

話說完他被請出去診治一個獄外的病人。就是這種待遇，使蘇維埃從前的敵人變成正直良善的公民。

在同一獄中我偶而碰到一個德國人。他從小生長在俄國，他的祖父是德國僑民。他詳細地告訴我獄中生活給他的影響，談話時僅只我們兩人。他正在不遠的鍊鋼廠裏做工，同時他又在監獄區的學校內讀書。他堅決地說，囚犯們對於有興味的工作及和善的待遇非常有好感。最近他回去看他的爺娘，他們都不相信他所說的獄中生活情形。

我問道：「判決失去了恐嚇的效力，不是很危險麼？許多囚犯豈不會這樣想：這麼幹一番倒不壞，反正牢裏有好日子過？」

「不。我的經驗告訴我，我們很受這兒生活的影響。暴虐的待遇只能使我們傷心，毫無效果。而工作和競爭卻着實增長我們的血氣。」

「你的親屬常來看你麼？」我問道。

「我的父母住得太遠，他們不能來；然而我的老婆搬到這村子裏來了，她就在那兒工作。放工後或例假日，我常到她那裏去。」

不多一會我跟一個官長談起適纔的談話，我說我不會料到從那德國人那裏只聽見好感的

批評他冷冷地說道：「噫，無怪他不曾抱怨，他化在夫人身上的工夫比在獄中多得多呢！」

在莫斯科拿文斯基（Novinski）女子監獄中我遇見已死巨盜庫斯納查夫（Kusnezov）的妻子。她二十八歲，被判幫凶殺人罪徒刑八年，她生來從不做工，現在她卻是突擊隊之一，愉快輕鬆地工作着，爲全獄女犯之冠。

她極詳細地述說她的一生和那可怕的強盜庫斯納查夫，她許多年來在他的掌中。某女官告訴我，她曾經一度愛過他，但如今自然而地忘卻這事了。那面貌不揚的婦人服飾整潔舉止大方坐在那兒，深思熟慮地帶些冷漠的神色說話。幾年驚險的生活使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顯得老蒼些。

她幼時生活艱苦，三歲時父母雙亡，就給送到孤兒院。在那兒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孩子六歲就得作工，十二歲必須會洗衣服，並不吃敲吃打，不過假使有一點兒不服從，她們得罰跪在屋角裏幾小時。范洛尼娜（Veronina）走出孤兒院正當十八歲。親戚都不收留她，她於是偷一只錶去換吃

的東西。就給擡住而送進監獄，在獄中她結交着老流氓和頑固囚犯之類。

范洛尼娜庫斯納查夫說道：「那兒有一個我喜歡的女人邀我同住。她有一間平房，許多人常來看她。就在那裏我遇見庫斯納查夫。他說他是一個店夥計。我們就此同居了……不久我發現他原來是一個賊，於是我想逃走，他不准我走，鎖我在屋子裏。他買給我很美麗的衣飾，我們吃的也舒服，但有時候他待我十分殘酷。後來愈過愈壞，他打我，恐嚇着要殺掉我。有一次他想勒死我，還有一次他要投我在冰河的洞洞裏。因為他的虐待，我的孩子生下地就死了。我親眼睛看見他勒斃他自己的四歲幼孩，只爲了那孩子病着，哭聲厭煩了他！每個年頭他的生活越變越可怕。他常在我面前殺人，他說他殺人只爲了喝血。」

范洛尼娜宿舍裏有她男人的罪狀的記載：馬賊，偷兒，頭目，殺人犯。他曾到他的叔父那兒去擾亂，把他們全家殺死，然後潑上火油燒乾淨他們的屋子。此事是和他一九二九年最後的殺人案一起發覺的。

她繼續說：「他最後殺我們的鄰居。他逼我握住她的腳使她不能抵抗。這就是我進監獄的緣

故……他呢，鎗斃了。」

這囚犯說這話時簡直好像事不關己，不動聲色。開始談到她的工作，她的表情卻變得有生氣了。

「工作使我變了一個人了。」她說：「以前我寫讀都很困難，如今我已能學習高等的課程。我不打算再結婚了，因為我賺的錢能夠養活自己。我的位置非常重要，我是這兒監獄工廠的管理員，每個人都必須每秒鐘符合着預定工作的速率。肯工作的人都能在這裏好好過活下去。釋放到了外邊我將繼續工作，當一名工廠裏的自由工人。」

安娜波立拿伐 (Anna Kostantinova Blinova) 在潘姆被判徒刑兩年，後來又改成三年。但她完全改過了，她極有赦免的可能。所有認得她的公務員都這樣說，剛進監獄時她像一只野貓，用極其下流的話罵人，一些事都不肯做。有一個公務員很同情她，解釋給她聽為什麼她一定要作工。意料之外地，她發狂般工作着，在鞋廠裏她打破紀錄達將近百分之二百之多。囚犯們有些怕她。

她做起工來簡直像一個魔鬼。」

她廿歲，戴一頂尖頂帽，頭髮截得短短的，看上去像一個男孩子。她的雙親是貧農，她起初跟他們一塊住在村子裏。有一天她發現生活太單調，就和幾個農家小孩一起逃跑了，在外流浪了好幾年。十五歲上她回鄉探望爺娘，但她習慣了自由，仍舊不能住得長遠，爲了禁止她吸煙，她又逃走了。從此不想回家。一知道爺娘在跟蹤她，她就立即遷居。一九二七年起她常犯些小案子被捕。

安娜煙癮極大。如果不能放縱她的嗜慾，她會越獄逃走的；幸而俄國所有的監獄裏都不禁止抽煙，她纔決意住下。

我疑惑地問她：「那末你真能夠放棄偷竊的事麼？」

「當然。我早就感到這事之乏味了，可是沒旁的好活兒幹。現在我從工作裏找樂趣，再不高興偷東西了。」

這些是對付困難情形完全成功的例子，那些罪犯，正如俄國人所說是「走投無路」的。有人

求全責備，說既然俄國有集團制裁的辦法，那些人爲什麼不早一點覺悟呢？其實有許多案件要看落在誰的手裏，囚犯一定完全改過的，只要公務員能給他以好的印象，能使獄中的工作使他發生興趣。有時這種工作在公務員方面需要極度的忍耐。倒是小賊最難處置，他們偷一星星東西苟且儉安地活着，耐不住正當重實的生活。

我開始耽擱在俄國的時候接觸到五十個萊福托伏（Lefortovo）隔離監獄送到工廠來的囚人。他們尙未開釋，只是爲了工作而被送出來的。開過了會一個囚人跟管理官的代表要求新衣服，他的外衣破了，鞋上有洞。「我們目前沒有，」那代表說：「兩星期後我們可以分發新衣了。」我第一個念頭是：「他到期拿得出麼？」

大家知道蘇聯缺乏布匹，雖然需要很切，但近幾年來生產數字已經比較增加了。從前鄉下人只穿草鞋或破布頭裹着脚走路，現在他們大半有布鞋橡皮鞋穿。這一萬六千萬人民巨大的需要是很難應付的，因爲一切布料蘇聯都在國內自己製造。外國進口的東西差不多沒有。所有錢幣單購買機器還感不足。他們讓囚犯們穿和平常人一樣的衣服，我看見許多監獄裏囚犯身上都是新

的工人服，然而依照中歐諸國的標準，隔離監獄裏的囚犯卻衣衫襤褸。

一個女公務員跟我說不久以前一批囚犯被送往工廠，但有幾個送了回來，說是行爲不好。

「爲什麼？」我問。

「那很難說，」她答道：「也許工作太苦，也許工廠環境不好。其中有一個人喜歡喝酒的，他當然不是好東西。」

自然並非每一個囚犯都能用工作來改良他。可是總而言之，俄國這麼做法，總值得我們歎美贊歎的。

俄國人決不能輕易弄到好運道。他們得努力工作，再和巨大的阻礙苦鬪。以相近迪泊落脫（Дибролат）五層屋的監獄為例：當一九三一年七月管理員到那裏的時候，那裏祇是一塊荒僻的草原。官員們只好睡在貨車裏，囚犯們自己搭營帳住。房子蓋起來了，囚犯們漸漸和迪泊落脫的自由工人一塊兒工作着，他們驕傲着這自己出過力的偉大的建築。

我會出席這五層樓監獄的一次大會。管理官在他的講演中說道：「我們必須戰勝工程學；我們必須學習，學習。假如你們每個人都這麼做，我們在工程工作上一定得更大的成功。」

許多囚犯參加討論。會場中間一個人說道：「我們這兒是突擊隊的監獄。囚犯中有的是私商，我也是。現在我覺得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倒着實不錯。」

文化部的領袖也是囚犯，跟我說：「你瞧：我們和自由工人在鍊鋼廠裏一塊兒工作而且掙很多錢。我是一個賊又是殺人犯，現在我昂然坐在你旁邊當起主席來了。沒有人在獄裏工作之後再去犯罪的。這四百人中沒有一個人會告訴你這兒有守衛兵，事實上確乎毫無守衛。請你跟世界上的人們說吧，我們囚犯被鑄成新的國民了。」

囚犯們的空間時間

在莫斯科一個隔離監獄裏第一次看到一間宿舍中放着二十來張床，我就問那位官員：「這麼多人睡在一塊不很危險麼？他們豈不會將惡習慣影響到別人？」

「他們並不生活在宿舍裏，」他答道：「他們只睡在這兒。白天他們在工場裏，放工後讀書或享受團體生活，我們的困難是地方太小。因為工作重要，工廠是擴充了，隔離監獄制度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我們還得把睡的地方縮小。總之，這只是開放監獄制度尙未完全實現的這幾年間的問題。」

後來我到過容四十、五十，甚至一百二十人的大宿舍。它們老是很清潔。有一次我隨便走進一所監獄，管理員帶我參觀各處之後問道：「這兒清潔不清潔？」這話使我詫異，因為我不懂俄國監獄爲什麼這樣注意清潔，於是一個官員跟我說明，訓練俄國犯人要他們清潔原是非常不易的事。克

而其人 (Zinze) 到冬天加上一件外衣就完事。常怕麻煩幾個月不洗衣服。老農夫們認爲洗衣服完全是多此一舉。現在他們學好了。在囚犯自治之前我們不可能使每個人保持清潔，叱罵和責罰毫無用處。囚犯自治之後的此刻全然不同了，鯉與同志永遠不得安靜，連最愛惜水的人也決心要乾淨，沒有人高興在懶漢旁邊搭鋪睡覺。這種清潔教育，教他們把屋子弄得叫別人看來整齊無疵，是極需要耐性的。

我走得累了，坐在一張床上。那床出奇地硬，三塊木板釘成，上面蓋一條薄薄的墊子。我說這床不舒服，俄國人都驚奇起來了。一個老太婆跟我說：「如果我們躺在像你們德國的軟床上，我們只會做惡夢。睡硬的，早晨起來爽快；是的，是的，我們女人也這樣。我們一點兒不軟。」

「囚犯們怎樣消磨工餘的時間？」閒暇時間的支配是極關重要的事，因此這常是我走進監獄第一個問題。許多人觸犯法律因而嘗鐵窗風味，單單爲了做罷了工不知上那兒去好。他們游盪於公共場所，結交下流朋友，於是走入邪路了。確乎，囚犯們應該知道如何利用他們的空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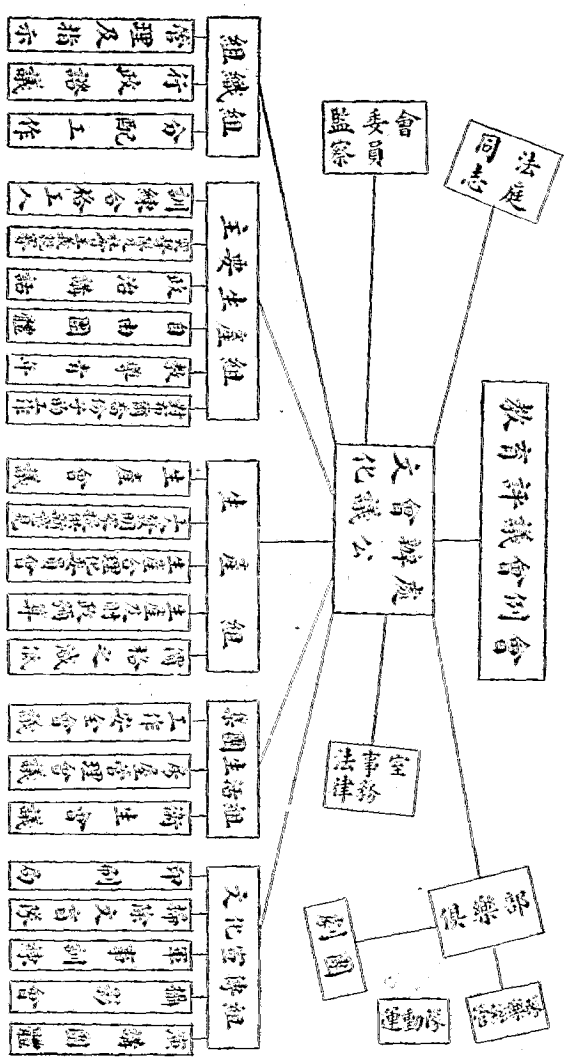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並非所有蘇聯的監獄都已解決。譬如蘇可爾尼基監獄的工作便十分緊張。管理權操諸文化委員之手，文化委員是囚犯全體大會公舉的，任期半年。這文化委員會先調查出不識字的人數，然後把他們分成班次。每一獄中都設有程度較高的課程和工藝課程。例如在烏拉爾山脈一帶，須訓練一大批木匠，因為那邊有大木廠。莫斯科就需要專門而熟練的織工和金工。各監獄中都有種種不同的工作機會。如在蘇可爾尼基，有為汽車夫、貨車司機、織工、會計員、養豬的以及集體農場農夫而特設的技術課程。學成釋放之後，這些人將散遍各地發展他們所學得的才能。

除這些技術課程之外，每個監獄中都有政治小組和藝術團體，還有訓練從事病院工作者的課程。常有法律專家演講蘇維埃對付罪犯的態度。希望每個囚犯都能懂一點法律，懂得為什麼個人的反社會舉動會傷害國家。

我去過的每個監獄中都有運動團體、赤色團體、壁報編輯部和下棋的團體。下棋很普遍，但賭紙牌絕對禁止。誰不守規則就得受同志法庭的審訊。

讀書室置辦各種報章雜誌書籍，寂靜適宜於用功。他們不單鼓勵囚犯們進去，有幾處監獄還

昆岩獄大 (K. P. J. W.) 開放監獄文化委員會工作系統表



有指導員，拿書籍給囚犯們，供獻意見，使他們對讀書發生興趣。俱樂部佈置得很安適，壁上掛着圖畫，列甯和斯太林的像片當然少不了，標語用白色大字寫在紅布上，由文化委員會選擇採用，時時更換，以免看的人厭倦。

尼許尼拖拉 (Nishni Tura) 關重犯的監獄裏有這樣的標語：「要使自己進步成爲社會上的有用份子，必須愉快地工作，習得起工作，養成工作的習慣；每人必得保守秩序，把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水準提高。」

烏克蘭的囚犯大都可以在例假日自由出外。有許多隔離監獄也准許囚犯們暫時離獄。平日品行端正的囚犯任何時候都能請假外出，至少每三次例假能出去一次。他們每年更有十天至二十天的自由。莫斯科的監獄囚一點。囚犯每年只准自由七天至十四天，他們沒有一定的「解放」日子，如時常請假出外，則扣減這七天至十四天。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收穫期中農民可以還家幫忙。僻遠之區像尼許尼拖拉監獄的規例就全然不同了，囚犯即使例假日也不能出外，因爲他們大半沒有親戚之類住在近旁，而且家也離得太遠，往返不便。所以關在城裏的犯法朋友要比關在鄉間

的着實自由些，幸福些。

起初我不大相信蘇俄和烏克蘭的囚徒離獄時間這樣的不同。在卡可夫（Karkov）司法委員會裏看見了一張罪犯離獄日程表之後，我纔明白即使在烏克蘭的隔離監獄裏，囚犯們享受的自由比在莫斯科要多上幾倍。請假出外必先得高級長官允許，在烏克蘭也這麼辦。離獄的日數是由管理員規定的。

在蘇俄，囚犯於例假日得接見三個人，他們的親戚朋友當然極歡喜地進監探望，但面談的時間至多不得過二十五分鐘。我在莫斯科常去看他們接見的情形。一只大廳，以三尺高的牆一分爲二，囚犯們三十人一班進去，探望者站在牆外，囚犯站在牆內說話，以防私下授受燒酒之類。探望者大抵帶着一包食物或衣服送給囚犯，官長有時約略查看一下。

我第一次參觀這些印象不十分好，因爲在這麼多的人面前除散漫的話以外似乎沒有甚麼可以談的。然而第二次我看到每個人專心壹志地利用着這二十五分鐘，他們如果有要事相商，可以請求坐在靠牆的棧子上，棧子相距極近，他們能夠絮絮商談，不受驚擾。

大多數隔離監獄不限制散步的時間，囚犯們在天井裏隨便走動，或坐在椅上，或在小道上徘徊。開放監獄內的閒暇時間中，他們更可以任意到什麼地方去。

太根卡一個獄官得意地點給我一片大運動場，四週飾以野花，我並未特別加以注意。太根卡是一所看守所，已定罪者千人，未定罪者二千二百人，每天只准在監視之下散步一小時，所以他對於那些野花毫不關心。蘇可爾尼基靜穆平滑的草地較之監視下的花床着實高明得多。蘇可爾尼基幾乎沒有守衛兵。

俄國各監獄中都有演劇團體，劇院和電影院是他們最喜歡的娛樂場所。我去觀光過幾次，非常佩服演員們排演的耐性，尤其是在城市裏的監獄，每隔兩三星期換一個新劇本。演出時臺下雖老是擠滿觀眾，但觀眾的鑑賞程度太低，他們很會吹毛求疵，假使一齣戲冗長使他們厭倦，他們就跟演員過不去，不管演員們曾盡心竭力在這戲上頭費過心血的，他們責問劇團爲什麼挑選這麼壞的劇本，叫劇團以後慎重點。我也確乎感到劇本的標準太高了，難使一般人了解。

在混合監獄裏男人女人都擔任角色，在男子監獄裏女角由女職員充當，他們在正當工作完畢之後演習脚本。有一次我問一個女職員這樣合演會不會引起不愉快的意外之事，「不，絕對不。」她回答道：「我們的囚犯全是老實人，女職員往往獨自和他們混在一塊排演，這是自然而又自然的事。」

大部份劇本扮演着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內戰的情景，中間配着音樂。在黑海旁的蘇克姆（Sukhum）我見到囚犯們驚人的紀律。那時出演着三個劇本，第一個是用喬其亞語的，大家都懂，然後明格來而（Mingrelians）人上臺表演，觀衆中聽得懂他們的話的人很少很少，最後一本是土耳其語的戲，我不得不找一個囚犯翻譯給我聽，因為職員之中沒有人懂土耳其語；觀衆雖然只明白一小部份，但自始至終，他們完全肅靜而守秩序。

壓臺戲是明格來而歌詠團合唱原始和悲哀的曲子。於是民間舞蹈來絲芹絲加舞（Laggin）伴着使大家歡喜了，一個囚人先開始跳。跳舞在俄國人是使他們忘卻一切投入狂喜的一種人生經驗。歌詠團拍着手使舞隊的步調漸漸加速，跳舞的人把自身投入旋律之中，頭都向後勝利

地仰着，兩手撐在腰裏，腳踏着小步子，在地板飄來飄去，愈來愈速。驀的樂聲戛然而止。神往的觀衆於是喝采如狂。

在卡可夫同志法庭開過之後，我想還旅館的當兒，那管理官，一位精力飽滿的普羅人物，不讓我走，說：「我們的管絃樂隊正在練習，你有興趣聽一會兒麼？」

那時已經晚上十一點鐘。我懷疑地問：「這麼晚你們還准囚犯們練習麼？」他道：「當然，同志法庭今天開審，他們可以遲一點睡，平日他們十點鐘上床。」

「十時以後他們在宿舍裏是否能夠互相談話？」我問。

「談話是不禁止的，不過不能吵出大聲音來擾亂別人，否則同屋的人會起而干涉的。」

我們走上扶梯。是一間看上去不很舒服的大屋子，木板床推在一只角上，他們就在室中或立或坐拿着樂器勤奮地練習。我們進去他們都很驚奇。一個瘦長子過來招呼我問我想聽些甚麼。「請你們奏烏克蘭的曲子。」我說着。我四週看看，這是一間怪可怕的屋子。天在下雨，冷氣溼氣不住從牆壁間透進來。

囚犯們奏着謠曲、舞曲和進行曲。那醜陋的屋子消失了。只覺得這國土的廣漠無垠，只聽見新而強有力的步調，那舊世界的潰滅，那現實生活中毒辣的鬭爭。

公共制裁

同志法庭制是囚犯自治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承審員、陪審員、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都是囚犯自己充當，由囚犯全體大會選任。囚犯們信任他們自己的法庭，甘心遵守它的判決，處決的嚴厲與否視案情之大小而定。蘇聯的判決非常公開，不只爲維持司法的尊嚴，也爲了給好影響於旁聽的人。同志法庭中亦復如是。

同志法庭受理關於一切違反監獄條例及偷東西毆打之類的案件。判決須由獄官批准，但很少會發生問題的。囚犯都能去聽公開審判，無疑的，只有極少數人流露出毫不關心的神色來。有時受審訊者用倨傲態度來遮掩他的神經質，在這種情形之下，除非律師表示同情和判決異常寬厚纔能改變他的品格。

我參觀過莫斯科各監獄的同志法庭，也出席過幾處在烏拉爾山和烏克蘭的。

蘇可爾尼基監獄。一間臥室裏失竊了食物。發覺了是誰偷的，同志們商量一下，給這賊骨頭一個警告。可是不興，他又竊取別人的香煙、煙葉和麵包。他們不上同志法庭控告他，把他打了一頓。他狂怒咒罵。於是同志法庭來調查真相，原告方面證據確鑿，而被告的態度卻似乎以爲偷別人的東西沒有什麼大不了。結果是室長叫來查問，訓誡他不該讓這偷兒隨便被人痛打，以後不准再有此類事發生；那偷兒也受公道的處罰，令他明白偷東西怎樣有害於同志間的合作，唯一的自新之路只是發展自己的團體意識。

另一個被告在工廠裏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別人的上面希圖多得報酬。承審員問他爲什麼這樣做，他否認一切，反而誣告別人。然而目擊的人證明他一定有罪。那檢察官跟他說：「你是我算術班裏的學生，你懶惰得很，爲什麼你不用功讀書，上進一點呢？」

「幹麼我學算術，它不能幫助我偷竊。」

我奇怪得沒有話說，一個隔離監獄的囚人，竟在這許多人面前直認自己曾經偷竊，而且宣稱

要繼續偷竊！後來，我注意到這種健全的坦白態度，往往是歸正的先聲。當囚人率直地說出他的心境，這就表示他踏着第一步的自新之路了。當然說老實話的人未必一定能變好，但被幽禁之苦弄得愁眉蹙額而不天真之輩——如像我在德國遇到的——卻始終難以感化。

蘇可爾尼基的檢察官，有一個非常聰慧的囚犯，在他的法庭演講裏說囚犯們已經明瞭集團意識的重要性。囚犯不只坐候他們的監禁期滿，他們利用時間苦幹着，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我們全知道，」他結論道：「從早晨六點到晚上十一時，我們完全沒有守衛，所以我們自己一定得保守秩序，來證明我們的確不需要什麼守衛的。」

有一段辯護演說簡直在罪犯事業上投下一道新的光芒：「被告告訴我們開釋之後他仍將繼續偷竊，這是我們全體的罪過。我們並不努力規勸他，我們沒有感化他，我們不會使他相信他有改過的自由。是的，他在獄中犯過九次罪，但這適足以證明我們對於他的漠不關心。」

我注意演說時被告的神色。他的傲慢狂妄的態度完全消失了。也許他這回纔第一次嘗到人類真正友情的撫懷呢。」

另一樁有計劃的賭牌案。被告在獄中已經治罪八次。檢察官問他將來打算怎樣，他說：「真奇怪的！問題下個月我將成爲自由的人了，你問它幹麼？」

「那麼你想繼續賭紙牌麼？」審判官嚴厲地問。

「那很難說，」那張着嘴好像沒有睡醒的約莫二十二歲的囚犯答道：「一個人總難免做些錯事的。」

一樁跟上述完全不同的案件，一個神色康健的少年被控作賊。他打開同獄囚犯的籃子而私取食物。他寧願承受一切罪名，不肯連累他的同謀者。弄到同志法庭來當然使他不舒服，檢察官和辯護律師聲色俱厲地責問之後，他纔說出因爲肚子餓，家裏沒有包裹送來，而那籃子的主人卻吃的東西很多。承審員問道：「那麼你爲什麼不跟這位同志直接討取呢？」

「他小氣得很，讓東西爛掉倒情願，不情願送人的。」是傷心的答話。

於是傳工廠管理員來詢問。他擔保被告是優秀的工人，宿舍室長也說他平日安靜而且品行不錯。於是他倖免功過簿上足以延長監禁時日的一條黑槓。

我幾次三番想發現囚犯偷竊食物的原因。他們的食料供給充足，極少有人抱怨，他們主要的食物是菜湯菜羹和麵包，德國人或者會嫌這些食品單調，但這在俄國人毫不足慮，他們似乎重量不重質的。有些囚人每天吃六百至八百格蘭姆麵包儘夠了，可是有些人感覺不夠，只好靠親戚之類在接見時送來。但當他們沒有接濟時，其中有些人不得不做小賊了。

有時同志法庭裏逢到毆鬪案掀起熱烈的辯論，兩造的感情都在審判時發洩出來。我還記得一樁案件：被告納沙洛夫，一個長身黑髮的人，爆出了漆黑的眼珠，用激動的聲調描摹着怎樣會打起頭，而且他並沒有錯。那時他在換衣服，亞雪帕夫在他背上寫一個侮辱他的字眼，不僅如此，他後來還要做鬼臉，引得大家哄笑起來，納沙洛夫方纔發覺，大怒之下，就給亞雪帕夫應得的懲罰。

原告亞雪帕夫站在他旁邊，膽小而拘謹。他抗議道：「我沒有寫什麼，我不識字，我不會寫。」但是沒有人相信他。檢察官說道：「這只不過四個字母，不讀書的人也能寫的。」全場空氣顯然不利於亞雪帕夫。檢察官正式宣稱有罪的不是納沙洛夫，而是亞雪帕夫，辯護律師則引申事實，說被告

是一個誠實的人，強有力的工人，受了恥辱極容易發脾氣。一場風波就此了結。

在太根卡我聽着審訊一個工程師。他以前擔任了幾樁西伯利亞的工事，預支了三個月薪水，在莫斯科胡亂化完，不返原職，因此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此番他在同志法庭中被告吞沒私款，而這筆錢是別的囚徒們託他代買違禁的燒酒的，結果給他一個人用掉了。證據確實，他的確拿到錢，轉託一個獄外的工友去買酒，而那工友卻早已不見，無從辨認了。

檢察官再三指摘，說受教育的人須肩起責任，作沒知識同志們的模範，假如誰無力克制自己的貪慾，別人將受不好的影響。

那工程師聲辯着他並不算賴債，他不明白爲什麼他們嚴厲地注意這事，特別在買酒這一點上，他承認自己是一個酒徒，有時連油漆也要喝的，他說當一個人沈溺杯中的時候，人們只能看待他像一個病人，不應該當他犯人。

羣衆默默地聽他陳述。他是個瘦長而眼窩凹陷的人，他的表情顯出在某種勢力支配之下不

能自拔而生的痛苦。

承審員和檢察官莊嚴地坐着。在他們面前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犯人，他不僅放棄自己並且剝掉別人的幸福。所以他必得償還同伴們的錢，從他的工錢中扣取，此外功過簿上給他記上一個過。

烏克蘭在一九二二年開始設立同志法庭，他們成功之後纔推廣到俄國各監獄。只有高加索比較落後。我會到鐵夫立斯去調查開放和隔離的監獄。事前我費了許多工夫邀得當局的允准。但獄官急速地領我各處看，又看了兩個農場，我竟沒有時間去仔細考察，和囚犯談談。他們明確地約定我參與俄國例假日的同志法庭，還說那天晚上或會演戲，只等獄官在正午領我去。

然而那天下午一點鐘還沒有人來。結果一個職員來關照說獄官出席重要會議去了，而且同志法庭未必開庭，因為官員們忘記十月十二日是例假日，幹事的囚犯都出去了。因為同樣理由，晚上也不演戲。

這有兩種可能：或者事實真的這樣，或者是監獄高級人員的組織不健全——也許同志法庭

的開庭是不定期的。

我對我忽忽走過的監獄不能發表甚麼意見。在莫斯科市區之內，烏拉爾山脈和烏克蘭，我能夠隨便什麼地方來來去去，看我所要看的，而且任意發問。但我在鐵夫立斯好像充軍，差不多沒有時間去詢問囚犯你工錢多少。我沒有機會再進那監獄一次，因為監獄官老是不在，而且那裏沒有副獄官，也並無准我進去的命令留下。在蘇克姆他們文明地帶我參觀小監獄和農場，我的問題均有圓滿答覆。鐵夫立斯的獄官們只會講理論，理論我不要聽，我要看這些理論怎樣地實施。

烏克蘭沒有女子監獄。無論在隔離監獄開放監獄以及同志法庭中，男子女子一塊兒工作着。有時女人當陪審官，聽衆在長檯上男女雜坐。

有時案情非常有趣。譬如有一次兩個囚犯被控同盟罷工，說他們故意弄掉一個輪子，使廠裏的工作發生阻礙。

細心審察之後，問題是：兩個人怎麼搬得動輪子？誰發命令叫他們搬的？因此他們的舉動好像

並非有意，因為他們是良好的工人而且都是突擊隊員，而且平日品行也非常之好。於是法庭中七人從事於討論研究該案件。烏克蘭特別情形，聞人非但能旁聽，也允許發表意見。他們較別處監獄格外自由，責任心也格外濃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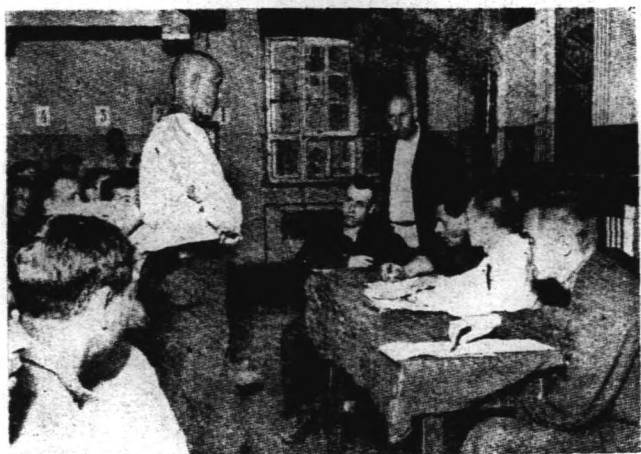
他們在陌生人面前並不羞於談起他們困難的文盲問題。蘇維埃其實辦得非常得法的。據最近可靠的數字，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已經能讀能寫了，連克而其也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革命前那地人民識字的只佔百分之二。各監獄都在進行掃除文盲的工作，我看他們上課，大多數人很用功，因為這也有助於他們早日開釋。

在卡爾可夫有文盲十五人極端反對讀書。審判官把特別愚魯的五個年輕傢伙叫出來。他跟其中一個站在那裏，彎着背垂頭喪氣的朋友說：「你現在好像孩子立在娘面前。可是我並不是你的娘。說吧，你爲你自己辯護啊。幹麼不響？你的舌頭什麼用的？」

他繼續發問：「你們工作之後做些什麼？」其中一個人說道：「沒有什麼。」他問道：「你們拿到紙張和鉛筆沒有？」答語是：「有。」於是法庭中別的囚犯開始說話，一個女的問他們住那個房



在工作的男女



蘇可爾尼基同志法庭

間，提議把他們隔離起來，討論之間，一個男的反對將他們直接帶往同志法庭來，說這些事應該質問文化部的。

審判官轉向一個被告說道：「你幹麼不肯學？」

「我不能。」

庭上一個女的問道：「你曾經試過麼？」

「沒有。倘然你們一定要我學讀書寫字，送我到旁的監獄去吧。」沮喪的聲調。

「那不好。你上那兒也得讀書的。」

靜默。

審判官的最後一手了：「如果你們一個都不肯讀書，那末我要請我們這位德國客人去告訴德國的工友們說，這兒的囚犯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而且他們還不肯學。」

又是大家不作一聲。

忽然一個被告大喊：「你們不讓我早些出去！你們上回說我必須坐滿判決的期限。所以大家

不肯努力了。」

審判官保留着嚴肅態度：「提早釋放，全看你們年青人是否肯學。像你們這樣年紀在監獄裏還學不會寫字、看書，決不放你們自由的。」

正如晨曦的光明提醒了一個愚笨的囚犯，他立刻答應願意學習。挨次問他們，他們一個也不反對。一人說道：「現在我願意上學了；必要的話，我即刻就去。」

然而庭務還沒完結，展開了有生氣的討論，爲什麼教育組織，這些囚犯給送進去不多久，就顯著地失敗了？它是完全可靠的。因此錯處在落後的囚犯們自己，他們該受異樣的待遇，隔離着，常受種種鼓勵，然後能望好結果。他們的允諾是不中用的，主要的事情是去察看他們是否能保持它，是否能在教室中學學不倦。苟細心調查，獄中的識字同志大致總對什麼都不懂的同志有些歧視。

審訊在熱烈的討論之中宣告完畢。那天晚上在宿舍裏他們也許仍將這件事辯駁得很久很久。

權力比法庭大的組織

在蘇俄，工作不慎因而肇禍，損害別人的權利以及其他越軌之事會引起嚴厲的制裁。判決的輕重依犯事者的教育程度，智力高下，和他或她平日工作的盡責與否而定。因為最重判決是十年——死刑只施諸例外案件——因延誤食物的輸送及其他類似案件而被判二年至五年，就顯得太重了。

這些判決有減輕的可能。我早已說過，在莫斯科兩天工作可抵消三天監禁，在烏克蘭一天的工作就等於三天監禁。五年計劃的表格分發各監獄，超越紀錄的算作特別好工作。工作特別好的囚犯的學問的進境和平日的品行都算分數，使他能更早開釋，因為他努力工作決心向上。

減輕工作和准否請假外出都由監察委員會決定。他們的職務是監督獄官和他的屬員們，他們不論何時有權視察監獄和工場。蘇俄的監察委員會包括羣衆代表三人以上，本機關職員三人

以下事實上難得有職員二人以上出席的，常時只有一個，因此凡事的決議總是留待羣衆代表的意見。委員會開會准許囚犯旁聽，有時有人籲請什麼事。

我曾列席一個烏拉爾的委員會。席中有一位著名的獄官。雖然羣衆意見的代表們紛紛有所陳述，但他巧妙地憑着口才和閱歷轉移辯論的目標。以前我在莫斯科市區內出席過不少這類會議，我知道正式的審判官和工會代表也必須列席的。

後來我跟一位官員談起這位監獄管理人員的代表不顧律例而專權的情形。「他又這麼做麼？」那官員道：「我們得再重重的辦他一下。你瞧最近囚犯的壁報上怎麼說他。」

我在一「速率和技能」雜誌上讀着那則囚犯通訊：

監察委員會於八月一日開會。審判官缺席，主席由行政人員的代表充當。他用專制的語氣答覆每個囚犯，並且待突擊隊員毫不公平。這證明他是不懂政治的。例如帕弟林（Radierin），最努力的隊員，曾經有計劃地在建築學校時出過大力，照例應該早日釋放的。監獄壁報上也將帕弟林的工作喚起大家的注意，而且說別的隊員應該當他作榜樣。但那行政人員的代表竟不

明白提早釋放的政治上的意義，也將報上的言論置之不聞。他對付工友們毫無同情。他跟一個作工的囚犯說，他是政府的官長，不能答應他的請求。

這錯誤的措置減低了監委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囚徒們工作的積極性。這表示監委會本身非但壞，而且有害。此事極應該改正纔好。

我和那位官員談論着這些批評的嚴厲。「評論在這兒是很自然的事。」他道：「我們常給別人批評，毫不接受公正的批評的，只是例外。假如事情確乎這樣，囚犯們見到了，並不放過，將作更厲害的攻擊。批評是絕對必要的，它使我們補自己的過失，改良眼前別人的過失。我們不能想像在別個國度裏怎麼可能沒有壁報而工作。」

蘇可爾尼基一次公開監察會議。六百個人戲院裏擠得實實足足。坐在主席臺上的是審判官一人，監獄代表一人，工人的商業組合代表二人和農工考察團體代表一人。還有一個政治教育委員會代表，監獄工廠經理，還有醫師也出席，但他們沒有表決權。檢察官辦事處的代表並非監察委

員，然而他可以對議決案表示懷疑，如監委會不理他的懷疑，他有權將該案提交法庭重行審查。申請事件六十件以上提出討論，五小時方纔完畢，秘書面前堆着一大捲公文，她朗讀該申請人被判的原因和期限，他過去在獄中的行爲，以及他的工作情形。於是那申請的囚犯給喚出來。

一個吉卜西人因拿刀殺死誘姦他的女兒的表弟，被判五年。現在他纔入獄八月，請求釋放。委員會拒絕這申請認爲申請人未經考慮，而吉卜西人的法律是不能算數的。我曾和他談過，他始終不了解爲什麼他不該殺他的表弟。這在我們看來是駭人聽聞的大錯，而在吉卜西人的老例則是認爲萬分應該的。近來殺人復仇的案子變得並不常有了，從前在高加索幾乎每日發生。蘇維埃的明察和重刑收得一種恐嚇的效果，教育的普及也使古老的報復觀念無復存在於一般人的腦筋中。

第二個囚犯曾以竊案被判三年。最初他曾請求到政治保安局的工作區，那邊比較完備一點，工作的機會也多一點。但結果他卻在人民司法委員會的隔離監獄中住了一時。現在他是一個領班，工作非常勤奮，只在獄中搗亂過一次。他住過八個月監獄，如今請求開釋。委員會關照他四個月。

後來再請求，因為他懇請得太早了。

另一囚犯因侵吞公款舞弊逃走而入獄。他的申請給拒絕了，因為他的行為還不能令人滿意。一個從前供職郵政局的職員，曾在獄中犯罪四次。他以屢次侵吞公款被判兩年徒刑，已經住滿一年又七個月了。根據他的工作情形，既不達到標準，又沒有顯著的進步，他們不答應提早釋放他。

一個青年會以偷竊罪被判兩年，已入獄一年一月，得到立即開釋的命令，因為他的工作特殊完美，會打破紀錄達百分之二二一。

一個農夫請求往田裏工作。他以前在鐵路上做事，不小心把火車遲開了一刻鐘，幾乎鬧出亂子來，因此被判三年。他在獄中工作毫無疵點，也沒破壞過規則，如果農會同意他可以離獄兩月。

另一少年同樣地請求。審判官問他：「你想往那兒鄉間去工作？也許你從前在工廠裏的吧？那末家裏不會需要你去幫忙的。」他的申請給否決了。

其次的申請人是從前一個村蘇維埃的主席，曾犯私用公款和毆打罪。他利用他的地位造成

村中的擾亂，而且他到任何地方都要討酒喝。知法犯法，罪名格外重大，他被判兩年，現在他已在獄一年又三月，請求釋放。爲了最近工作不好，又是兩次破壞規則，他沒有得到准許。

另一人會扣留裝食物的火車四小時，十八個月的罪，他已經執行了九個月，因爲工作可靠，行爲不錯，立即開釋。

另一申請人曾任太根卡監獄辦事處的會計，以盜用公款被判徒刑十四月。現在他已在獄十月，工作良好，可以開釋，不過再得做三個月強迫工作，那就是說在那期間內的工資須以百分之二十五充公。

一個外貌康健的年輕人，罪名是行爲不端。現在兩年的監禁減剩一年，爲了他平日辛勤，還有一人超過了紀錄百分之一三六，也減免一半罪名。

於是還有幾件短期離獄的申請，只有兩件未蒙批准：一件是那人次出去喝酒；另一件因爲那人上回告假還獄遲到二十四小時，說不出充分的理由。還後一個申請人犯過四次盜案，是社會上的危險份子，所以他的公民權已被剝奪，所以他得不折不扣地執行完畢三十二個月徒刑。

有一次監察委員會在小室中開會。那種會議是並不十分公開的。職員們每天在一塊兒工作，那審判官常在獄中做許多事，像是他們的忠實老同志。他們商議着一個囚犯的提早開釋問題，那囚犯會在家中犯罪，被判徒刑十八月，現在距期滿還有八個月。檢察官代表提出反對，他說他曾和那囚犯在路局同事，他喜歡喝酒而且糊塗得很。「我說，」醫生插嘴道：「你熟悉的那個人運氣不高。倘若你不知道他的一切，那末他是個好工人，委員會當然議決釋放他。現在呢，不見得這樣做了。」委員會聽了醫生這番公平的論調，最後決計允准那人提早釋放，不過要他做三個月強迫工作，使他記住他的一舉一動是和社會生着關係的。

然後一個樂師進來。他擅離軍樂隊，被判十八個月，已入獄九月，工作好，立即釋放。

一個擅離職守的海軍人員請求釋放沒有給接受。一個紅軍士兵同樣的請求也沒邀准。

另一從前農民協會的主席，曾和私商們比酒量，讓他們偷漏國稅，被判兩年。現在他請求回家割草，而且保證自己的行為沒有錯兒。他在獄守法奉公克苦工作，他們接受他的請求，但他們要問

問農民協會看，他家是否真的需要他幫忙。

一個從前的工廠老板因侵吞公款被判三年，他們看他成階級敵人，不准離獄。另一從前的投機家申請提早開釋，也給拒絕了。文件齊全而清楚，所以審查起來一點不費手脚。

末了進來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囚犯。他在獄犯賭紙牌律十五次之多，平時的行爲也不見高明。

「爲什麼你會犯禁十五次？」主席問。

「他們以爲我賭牌，我並沒有，」他說。

「那末還有那十四次怎麼說？」主席再問。

「是的，我玩了牌。」

他因不端行爲被判兩年，已在獄十一月，想出去。但在這種情形之中當然不會邀准的。審判官的結論是：「停止玩牌，過四個月再送申請書來，那時我們再考慮。」

另外一次監察委員會的公開會。各色囚犯來到桌前。兩個紅軍高級長官爲了職務上的不小心被判徒刑三年，已入獄兩年，他們再做兩個月強迫工作就能釋放了。一囚犯曾在獄中以賭牌受

過六次處分，即是他難於擺脫的嗜好。但他們不管這些，也不管他兩年的偷竊罪僅執行了一年零五月，終於把他釋放了，因為他曾打破工作紀錄百分之一五九。

一個婦人前幾時請求離獄，但後來又收還了申請書，說她是托兒所的女主任，不能缺席的。主席建議她去央一個人暫代。

她說：「那不能。我剛開始工作，現在不能脫身。」

主席冷冷地說道：「隨便你，總之我們答應你十四天假期，怎麼辦是你的事。」

起初我見到在公共集會裏縷述着罪案的性質、徒刑時期的長短和人們在獄中的舉動的詳細報告，覺得非常奇怪。我以為把私事在許多人面前細細討論，囚犯一定很苦痛的。後來我發覺在蘇聯，各種生活狀態都能被坦白地討論，只要討論者站在社會的觀點上。

結果是狹窄的個人經驗的界綫打破了，而各個人的缺點也容易消滅。囚犯們了解自己的同志們的行為的真價值。「有過必改」——這是在每次審判中數見不鮮的事實。敲別人一頓也許

能夠媽虎過去，但一個廠裏的工人，如果不幸弄出一樁可以引起危險的錯誤，就得帶到法院裏了。所以個人行動最重要的是對社會負責。

當囚犯們生了病

我考查每個監獄中的病院，發現事實上平均一、〇〇〇人中總有兩三個醫生，必要時可以請來的專家們和幾個實習醫科學生照看他們。他們告訴我，二二五人中必有一個醫生或醫學生。看護在囚徒中選出來，加以澈底訓練。

俄國醫生極少，絕對沒有失業的醫生，所以我很懷疑爲什麼監獄裏獨多醫生，我就去問蘇俄公共衛生處的總指導員，答覆是：「監獄裏人口密集，疾病比外面格外容易傳染，所以監獄裏特別需要大量的醫師。主要的事是把囚犯弄得康健，做個社會上有用的人。我們已經剝奪他們的自由，可是我們不必再將無爲的苦痛來磨折他們。我們已經把醫藥方面的協助擴充，使囚犯們的生活，健康和衛生的環境愈好愈妙。囚犯要經體格檢查，看他最適合於那一種工作。工廠也經查驗，使工作環境儘可能的舒服。對於在某種工場中的特殊疾病，我們也同樣設法使它消滅。監獄裏的工廠

和作場必不能惡劣，至少與外面的有同樣的設備。因為衛生的訓練也在我們的監獄中佔重要地位。

我在獄中看到這種訓練。醫生們組織團體，舉行各種健康問題的討論及講演。在他們領導之下，囚犯們表演着酒醉之害的劇本。這種解釋是非常需要的。因為多數行為不端罪的囚犯都受酒的驅使而作惡。

俄國人喝酒比德國人少，那是公認的事實，其原因正如俄國人自己說：「他們不懂怎樣去喝酒。」偶而他們喝得很多，平時差不多不喝的，因此他們一喝就醉。酒醉常是犯罪的原因。確數不知，但很有幾個囚犯跟我說，他們的歹事是在酒後幹的。蘇聯人民的縱酒，目今依然沒有減少的趨勢。從前俄國監獄中醫生的地位很低，如今卻非常重要了。警務處決定生病的囚犯須立即離獄，文件送往法院，極少被駁還。

醫生每天監視食料，廚房以及食物的口味，與醫藥有關的罰則都在他特殊的法規之下施行。囚犯們有權不拘何時可以責問警務處食物太壞之類，不過據說難得有責問。

獄裏的醫生待遇很好。薪水跟普通醫生一樣，有和別的官員一樣的制服發給，膳食不歸自理，每年有例假一月。醫生如犯罪入獄，只做些醫生的工作，相當自由，但薪金只及平日的一半。

有一天早晨我到撒帕爾希監獄的療養院。我在莫斯科久耳其名。二十二個囚犯正坐着吃雞蛋、麥糊、麵包、水果和茶當早飯。他們吃的時候，桌上蓋着白布，監獄樂隊奏着音樂。吃畢早餐他們到室外作些輕微的運動取樂。我的參觀一點也沒有驚動他們。

我問院長這裏頭的囚犯是否都害着病，或者正需要休養調劑。他道：「不，並非全是病人。其中有幾個做工做得特別上勁，這兒來住住算是公家的一種酬報。這十四天休息鼓勵他們，休息完畢，他們又生龍活虎地上工了。我們發現這個法子很好，不久別的監獄恐怕要仿效。」

流浪的孩子們

一輛特別快車從卡可夫駛向熱鬧黑海岸旁的沙基 (Sochi)。車中滿載着逃往海濱棕樹下療養的寒帶俄人。長途旅行須得預定坐位，如已客滿則須耐心等幾天。車廂中每個旅客派着一只長凳，我躺直身子仰臥其上，一路十分安適。

晚上我給腳聲吵醒。好像有幾個人在車頂上賽跑。我詫異得很。明天早晨我在餐車裏早餐，纔發現了那緣故。三個孩子，年紀約莫十歲到十三歲，短衫破舊，在走廊裏乞討，旅客給他們些麵包或銅元；原來他們是在車頂上過夜的。

我知道他們有很完備的收容所，所以我很奇怪爲什麼沒有人告訴這些孩子叫他們上那邊去，而鼓勵他們求乞？我於是勸導他們往兒童收容所。他們溫和地笑着，爬到車頂上去了。餐車裏兩個旅客開始和我扳談起來。「這兒我的朋友以前也會經流浪過，」其中一人說：「可是現在，你瞧，

他是怎樣值得尊敬啊。他做過幾年獄官，現在繼續在研究。」

「是的，這兒是不是讓孩子們隨便亂跑的？」我問道。「我們在莫斯科難得看見流浪的人，然而這裏他們跳上車子都不管，這是什麼緣故？」

「如今流浪的兒童很少。這些孩子顯然爲了好奇而旅行。他們想見見世面。他們從寒帶地方來，找尋熱的去處。只要問問高加索人，你可以知道那邊絕對沒有流浪者，而且永遠不會有。家庭傳統觀念太厲害了——此外呢？那邊地方很好，很暖和。」

這兩個旅客細心收取吃剩的麵包。「這些我將給小朋友們吃。」從前流浪過那一位說。「我曾跳火車飄泊各處兩年，這真有趣啊。我永不會忘掉這段生活。」

在莫斯科一位教育委員會的高級人員答覆我各種問題。他告訴我爲什麼俄國的孩子們常會漂泊着。

因爲國家在歐洲大戰時在外患內亂的不安定狀態之下。一九二一年以前烏克蘭有德國軍

隊，白俄羅斯有波蘭人，巴庫油區有英國人，遠東有日本軍隊。一九二一年伏爾加流域鬧大飢荒。七八年間國家完全混亂。成萬個家庭流離失所；父母在擄掠中失散了，孩子再不能找到。不可避免地，這些孩子四處飄蕩了。

革命以前俄國只有布爾喬的孩子會逃走出去流浪。他們在書本上認識了外國，於是要冒險，要浪漫。國內不希奇，一定要到外國。他們不考慮到經濟問題，所以大半給爺娘趕回家去。

但現在全體的孩子都能在影戲中看到，或在報上讀到俄國正進行着什麼事了，這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好些人逃走出來想目睹國內的情形。

革命以前鄉間常有孩子求乞，但在捉回去之前，他們至多能跑到第二個村莊。只有極少數人僥倖得到慈善家的幫助，可以逢山過山地不惹人家嫌惡。

革命後開始處置這小遊民問題。直至一九二一年內戰告終，很少進步。一年之中約計五四〇、〇〇〇孩子在布爾塞維克區域內被收留着。一個特別設立的兒童福利委員會和一個調查工作的組織擔任把孩子們集合起來。古舊的地方革新，從前氣悶得和牢監一樣的教養院變成幸福

快樂的所在了。那時兒童福利委員會纔把它的工作交給教育委員會管。

他們把孩子分類。十六歲以下的，僅在街中行乞流浪而沒有犯罪傾向的，送入工人區。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在勞工部管轄之中，給送進技術學校受訓練。他們之中的罪犯則由司法委員會主管。後來發現在街上生活過一年以上的孩子們很難適應新的生活，終於還是要逃走。教育委員會不能解決這問題，遂求助於同業組合方面的兒童福利組織。孩子們給分成二十、四十或五十人一組分住較小的屋子，受各種嚴格速成的教育。

各教養院裏頑皮的孩子特別需要個別的訓練。訓練的原則是藉着建設工作來重施教育。人們不能強迫這輩流浪者讀書。如果在工作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的知識不夠，他們自己會去想法長進。譬如，簡單的算法是必需了，那孩子於是明白他倘然要繼續工作，必得學習算術。於是他去請教別人。這樣他在工作中感到了求知的需要。

「那些孩子非常努力。」一位公務員告訴我：「當他們開始學着他們所歡喜的手藝時，他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罪惡的過去，只曉得工作。工作驅除了他們舊的習慣。我來舉個簡單的例子：這

個年輕人從前是扒手，偷起東西來出奇地聰明。他那雙小而柔軟的手能夠伸進任何人的衣袋，使別人毫不覺察。現在他站在機器旁邊工作了。機械使他發生興趣，他的手發達得充滿肌肉和氣力了。他絕對不可能再幹他的老「生意」了。還有一個傢伙從前常偷錢買煙來抽，現在他袋裏有錢了，再過幾天他能掙更多工錢——他幹麼還要偷呢？

「那末流浪的孩子和他從前的同伴們是不是一塊兒住的？」我問。

「不大能夠。可是他也並不寂寞。我們並不把他放在陌生的環境中，使他能夠遇快樂親切的日子。你知道，我們從經驗裏面學着一切。起初我們做出很多錯誤，但現在我們知道，最要緊的是培養這些孩子們的自尊心。奇怪的很，遊蕩孩子的自尊心竟比普通孩子高出不知多少。鎖毫無用處，他們極容易挖開，所以我們索性給他們鑰匙。於是他們詫異着爲什麼我們竟用對待普通孩子的法子對付他們。」

「我們對於我們的成功十分滿意。當然錯誤是免不了的，但總而言之，我們每年送出一萬五千至二萬孩子到平常的工廠裏。普通的孩子一班一班送，頑皮的孩子一個一個送。全體除極少數

例外，都在十六歲得到自由了。」

我曾和卡可夫蔡爾慶斯基 (Dscherschinski) 政治保安局的一位女士談過。她偶然在課後遇見我，她的德語很流利，因此我從她那裏能夠知道很多東西。她教過流浪的孩子們十年書，她說她再不願上旁的學校去教書了，因為那些孩子比普通孩子可愛的多，而且人生經驗特別豐富。

「他們有非凡的活力和天才。他們之中有許多流落在街頭，只因為不滿於單調的日常生活，一她跟我說：「他們具有各種野心，有的想做發明家，他們大半有創造和比較複雜的智慧，差不多全喜歡學算學。孩子不答應你去問他們關於他們過去的一切，那是我們這地方的特別之點。假如他們開始談起關於他們自己的話，教員能夠參加，但依然不能發問。這個主義在這兒實行得很好。孩子們在生活上翻開了新的一頁，過去的消失了。」

在娛樂室裏一個黑髮的十五歲的男孩跟我們在一起。他懂一點德文，和我們搭話。一忽兒以前我曾在廊裏碰見他，問他一個問題，他的答覆似乎很粗魯，於是我離開他，開始和另一個十二歲

的講話，那小孩站在一只大鐵櫃前面，正拿着鎗守衛，若不是走過的職員告訴我那鎗並非實彈的，我幾乎吃一嚇。

但是現在那大一點的男孩對於我們的談話也感到興趣了。他是這個五年前創立的團體中的老同志。他告訴我他似乎老是偶而到這兒來的陌生人詢問的對象，他受不了。但他現在不妨談一會。他補充着教員的話，我於是明白他們會裏怎樣去徵集孩子們的。

會裏派兩三個孩子不和大人在一起守在路口，碰到流浪者經過，就告訴他們「兒童的家」的情形，問他們要不要加入。一番商量之後，會裏派去的孩子走了，臨走時跟他們說如果他們願意加入這會，必須在原地等候到明天早晨。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流浪者大抵總候着的。在會裏，那晚選出了代表團——一個主席，兩個助手，明天一早趕了馬車，帶些鞋子到路口去。於是在中午時候全體會員往路口迎接，旗子飄搖，軍樂隊奏着樂，早晨出去的三個代表帶着新來的流浪孩子回來了。受到熱烈的歡迎之後，他們給帶進洗澡室洗澡，穿起新衣服來。他們的破舊衣服當衆燒燬。此後，教員考查他們是否認識字，替他們選擇最合適的工作。

除極少數的例外，會裏只招收十三歲以上的孩子。有一個十歲的小孩坐在我們桌子近旁，那黑髮的孩子叫他過來。他來了，傲然地站在我們前面，小小的眼珠亮晶晶，很好玩。他入會纔不過幾個月，已經是突擊隊的隊長了。客人在稱讚他的本領，而那年長一點的孩子又特意叫他出來，他自然很開心。他有個學生的兄弟，面貌的相像使他剛入會沒有責任心時做種種惡作劇有不少的便利。兄弟二人把罪過互相推諉，因為面目相同，又穿了同樣的制服，別人很難發現是那一個幹的。然而現在，他充滿了尊嚴和自信了。

弟兄兩人從家裏逃出來，因為家中景況不佳，而父母又萬分凶惡。逃出來之後他們分散了，一年之後，纔在會裏重新會面。我請求見見他弟弟，弟弟來了，不大喜歡說話，也不專心聽我的問題，一忽兒又走開了。

「你們的日子怎麼過的？」我問那黑髮的孩子。

「我們六點鐘起身，整理東西，然後聚在一起行早會，向我們的會長致敬。」

「他是誰？」

「我們選舉出來的。他每天早晨發號令，分配職務，領導這一天的工作；甚至還要管敲鐘。我們還有十二個小隊長呢。」

「那末你們一切自己會做，會裏的指導員幹些什麼呢？」

「他有很多事做。這兒三百三十六個會員，還有一百四十個自由工人，他使工廠的一切順利已經夠忙了。」

「有幾個廠主？」

「一個也沒。十四個教員教我們書，大半整天和我們在一起，無論什麼時候我們能找他們說話。工廠裏有七個工程師。我們靠工作吃飯，所以我們主要的事情是生產些什麼。」

「你們一天做幾小時工？」

「四小時，再讀五小時書，餘外的時間自由了。雖然我們最喜歡運動和瞧電影，但也有人組織文學團體和政治團，音樂會裏有六十個同志。」

「什麼時候你們到郊外去？」

「這樣的時候很多。夏天我們去避暑；去年我們就到過高加索的一個療養地方。」

「請把每天的工作繼續講下去。」

「噢。早上七點半到十二點，我們有的進學校，有的進工廠。於是輪班替換，最末一班是五點到九點。於是我們上床，年紀小的睡覺了，大一點的隨意玩，玩到疲倦爲止。」

「你們吃的怎麼樣？」

「很不錯。我們做出有用的工作，我們的吃的東西也一定要好的。我們有牛奶和肉吃。」

孩子們的機器工廠是一座兩層的巨大建築。我先去看他們的宿舍，很舒服，那工廠的佈置更十二分地完備。我早就知道政治保安局不惜鉅資建立教養院，但這樣完美卻出乎我意料之外。機器這麼偉大，無怪會感化那些無家可歸的孩子們。

當我經過孩子們身旁，他們並不仰起頭來。他們正做着精細的工作，不願意因此分心。他們生平遇見的陌生人太多了，個把參觀的他們毫不在意。他們在製造小而複雜的播種機。一位工程師解釋給我聽它的內部構造。三十六個女孩和男孩子們一起工作着，她們的工作需要特殊的技巧。

後來，一個男孩跟我說去年有二十四個同志被派往工業學校升學。工廠裏的工資不壞，資格合適的工人每月能賺三百盧布。在他們訓練的前半期間，只能掙三四十盧布，此數連他們生活都不夠，然而他們竟常有零用的錢。每人視能力和志趣，受專門工作的訓練。通常他們化在每部機器上兩三個月工夫，全部的訓練時間約計三年至五年。

走的以前，我問那邊的教育當局是否還有人偷東西。

「在剛進來的三四個月內，大部份的流浪孩子還是要偷的。」他答道：「這不足為奇，因為一個孩子偷竊了好幾年，你不能希望他立即改過。我們把完美的工作環境和富餘的工資來革掉他們偷竊的習慣。一個孩子要什麼有什麼，再偷東西幹麼？還有，老同志們做出好榜樣，使新來的一幹壞事就難為情。」

孩子們每天晚上開會，誰工作懶惰或做錯了事那時就得受責問。不幸的失職的人給羣衆圍住了，忍受種種非難。最重的處罰是暫時扯下他的會徽。

蘇聯有不少像這樣的教養院。我參觀過莫斯科司法委員會辦的少年罪犯實業學校和教育委員會辦的頑皮流浪孩學校。他們實驗出各種東西來。那些學校裏的孩子自然很快活的，空暇時候能夠盡力作樂，玩玩手風琴、三弦琴和口笛之類。那些從前的流浪孩子非常活潑，而且沒有一人不給人們以極良好的印象。經驗是難得的，每個人常常做些錯事，但俄國的人們對於錯誤的泰然自若不慌不忙的態度，卻使我百思不解。也許這就是他們的教育工作獲得巨大成功的基礎吧。

布爾雪伏的公社

在蘇俄一切事常出於吾人意料之外。我常想踏進青年重犯的布爾雪伏公社 (Bolschewo

Community) 是容易不過的事，因它照例讓旅行家考察團公開參觀。我去問人民司法委員會，

不料答覆是這樣的：「你去試試看，也許他們讓你進去，但官方的護照恐怕難到手很費事。」

「可是考察團之類怎麼能夠進去呢？」我說。

「是的然而情形不同。他們也得費許多工夫纔能進去瞧瞧。公社的幹事前幾天請求我們不要再讓參觀的人進去，因為要妨礙他們的工作。」

「但是莫斯科任何監獄都讓我自由參觀啊？而況我又久聞布爾雪伏公社的大名。」

「布爾雪伏歸政治保安局管的，我們無權過問。」

於是後來我參加了一個考察團一塊兒往布爾雪伏。我去了，但習慣了獨自來往各處，和二十

人一起參觀，覺得異常不舒服。他們是走馬看花的，我如問起些專門問題，他們便不耐煩了。臨走之前我奔到一位老資格的教員那裏，告訴他我來到俄國的任務，而且懇求他寫一張派司，使我下次能獨自再來。

「抱歉得很，我不能幫你忙。你必須去政治保安局弄一張通行證，那麼下次能來了。」

我奮鬥了十天之久，纔算把這張通行證弄到手。那是在恰當的地方，恰當的時候，碰到恰當的知道德國人不十分有耐性的官員們以後的事。

布爾雪伏是一個大村落，是年輕重犯們開始新生活的所在。我接連去了兩天。總幹事恰巧不在，由他的代表和一個教員出來招待。總幹事的代表是醫生，他們都是公社草創時代的基本人員，但他們都沒有受過教養囚犯的特別訓練，只從經驗中學得一切。

我到過幾處製造運動器具——雪橇、冰鞋、網球拍和球鞋的工廠。公社自誇他們的工作的速率和出品的優良。社中更有金工廠和紡織廠各一。

那教員告訴我公社的起源：一九二四年有一大羣盜匪被捕，內中有不少孩子。對於那些十四、十六歲之間的孩子怎麼辦呢？他們不想把他們送進監獄，恐怕他們將愈變愈壞，又不能把那些孩子安置在兒童教養院，因為他們的犯罪資格太老，恐將影響於已經在那裏的孩子們。

於是政治保安局着手建立青年罪犯的教養院。初創時遭逢不少困難。孩子們習於偷竊，難於放棄他們的老習慣。後來竟有人搗毀了貨房，給抓住了。指導員考慮着對付他們的辦法，輕的責罰已經試過，不中用，嚴厲一點又適足引起他們的反感。於是在一個公開集會之中一個教員提出了勇敢的主張：索性把鑰匙交給那些孩子，信任他們。這以德報怨的辦法他們還生平第一次遇到，他們的自尊心恢復了，自尊幫他們踏上了正路。初創這獨立組織的時候，社員的資格必須是年輕而犯過幾次罪的。

社員的數目漸漸增加。一九二八年有一六〇人，年齡也只限到二十歲，一九二八後年紀再大的也准入社了。一九二九年入社的很多，到現在公社中共計社員二二〇〇人。

我問那教員人數增加會不會多麻煩。

「不，」他答道：「人數急遽地增多只是我們工廠發展的結果。我們這二百個基本社員要求着更着實的生產工作，我們需要多招人來擴充工廠。現在，除開社員二、二〇〇人，我們還僱備了三千個自由工人和職員。我們把負責的工作來改造罪惡累累的人物，已經得到無數次的成功。我們不但了解每一個老社員，也明白每個新來孩子的志趣所在。祇要他真的熱心於工作，改過的第一步已經做到了。其實良好的待遇更比工作重要，一旦衣食無憂，他的天才就更有發展的餘地，而集團意識也更形強固了。」

「新社員怎麼來的是你們去挑選來的麼？」

「當然。犯案累累的囚犯們（即社員）在全體大會中選出代表往各處監獄徵集新社員，找不說謊話而不偷同伴們東西的『誠實的賊』。我們決不要小賊。所以我們的社員往往是十年十五年作惡爲非之輩，而一進公社往往立刻變好。等會兒你去跟他們談談，就知道我並非言過其實。從前習慣於非法生活的鎗斃坯子，如今都成爲超等的工人了，結了婚，住在這兒公社裏。我們這兒有三百多對夫妻。」

「男社員的妻子是否都是犯人？」

「不，只有三十個是社員。我們共有女社員二百人，比男社員難弄得多。她們大都自幼過着賣淫生涯，瑣瑣屑屑，心地狹窄，而且缺乏野心。」

「新社員是不是一定由社中挑選的？」我又問他。

「不，也有聽說這兒不錯而自願加入的。有些由已入社的親戚之類介紹進來。當然並不立即成爲正式社員，他們先須當「準」社員六個月，然後由行政部，最後由選舉委員會決定他們是否當選正式社員。誰如果繼續當「準」社員一年，仍未被選，必須自動離社。」

「社員能帶年老親戚之類到布爾雪伏麼？」

「有過這種事。本社曾收容一個年老的老賊骨頭，因爲他的兒子工作極努力，而非非常想幫父親的忙。罪犯們的完全自治制度使這老人轉變得很快。現在他是正式會員了。」

「新社員的接收與否是否由總幹事最後作主？」我問。

「不全體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它監督指導各項工作。它產生委員會主持一切社務，管理原

料和出品的運輸。它也產生立法委員會討論和制定各項詳細條例。」

「最普遍的罪是什麼？你們以甚麼方法遏止偷竊的傾向？」

「偷竊不常有。我們第一個原則是加強罪犯的自信，使他們感到我們是完全信任他的。我們之中比較活動的人們負責工作集體化，使新來的人感到犯罪行為是反社會的。這兒鄰近的地方很容易買到伏特加酒，喝酒的結果自然很壞。從前他們常用酒來壯膽，以便偷盜，還有差不多每樁淫亂案子都是喝酒引起的。最近就有一樁痛心的事情。一個孩子在這兒工作了五年，成績非常好，大家喜歡他。新近請假回去，親戚給他伏特加喝，他一上口就酩酊大醉，他以前是個本領極大的扒手，於是他不由自主地故態復萌，在電車裏挖人家衣袋，等到酒醒，他已記不起曾經偷別人的東西。如今他在隔離監獄裏，我們一定要弄他出來，因為他人緣很好。」

「你們怎樣想法禁酒？不會反而引起放縱麼？」我問。

「因為實際上的需要，本社已經雷厲風行地禁酒。違者罰去二星期至四星期的工資。被僱的職員們也不許喝酒，否則不准住在這裏。」

我們沿着公社的廣闊的街道走，一路社員們遇見了那教員都很和氣的打着招呼。美麗而空氣充足的建築，偉大的花園和網球場，我似乎走入理想之園了。我懷疑着所見的究竟是真正的事物，還是僅只夢境……

我們走進了一排平房。教員有事別處去，一個社員伴着我。一處門口母親安閒地坐在凳上，孩子們圍繞着她。我很想參觀這些平房的內部，碰到一個細長的青年，就問道：「你就住在此地麼？」

「是的。你想瞧我的屋子？可惜我的妻子不在家；她上克立米亞（*Crimea*）療養去了，可是你不妨看看我們的孩子。」

是一間整潔的大屋子。大床旁邊一隻白色的小床，靠窗放着一具大鋼琴。我把那青年從新打量一番：面目清秀，一雙細巧的手，似乎屬於文人的。我問這鋼琴是否社中公物而他玩着的，他答道：「不是，是我買給我妻子的，她玩着。」他說得輕鬆得很，彷彿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於是他把兩歲的女孩放在膝上，告訴我他的一生：

他——愛彌爾彼得洛維支卡明斯基 (Emil Petrovitch Kaminski) ——小時候很不幸。他纔嬰孩的時候，他的母親死了。父親隨後續娶，繼母待他很壞。沒有一個人照顧他。後來父親去打仗了，他只能獨自謀生。他沒有學過什麼，十歲起頭就與壞孩子爲伍。內戰的時候，他沒有工作的機會，就去投紅軍，因爲年齡太小不准。於是他不做甚麼事，蕩來蕩去，最後參加了製造假鈔票的組織，「工作」兩年。於一九二五年被捕，被判徒刑十年。兩年之後，他二十歲的時候，布爾雪伏委員們找到他，邀他入社，那是六年前的事。

「社員們該住在這兒多少時候？」我問。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將住多久？說不定，有許多人就高興一輩子這樣住下去。我們活動的範圍很廣，而且還想幫助那些「頑固不化」的人們。我是個工程師。我在公社中的技術學校受過訓練，我很想使我的工作有益於公社。每個社員大約耽在這兒兩三年，在這時期內學好一種行業以便將來立足於社會。如今我是一個自由的人了。我的判決早已取消。但這卻不是容易的事。一個人住滿三年，算開釋了，但仍有曾經犯罪的紀錄留着，再隔一兩年，公社纔通知當局把全體的紀錄

取消。」他得意地加一句道：「現在我是工會的會員了。」

那小女孩不耐煩了，吵着要父親和她玩，所以我們不得不走他送到門口。

「你的妻子作工麼？」分手之前我問他。

「在紡織廠裏。那邊不錯。剛來的時候她在洗衣作，可是她不高興，因為掙的太少。許多同志開手掙不多都不滿意的。學徒們在起初幾個月只賺三十五盧布一月，我們普通的生活費約莫五十盧布一月，無怪他們除去吃飯住房子之外，確乎感到沒有錢用。是的，化慣錢的人初到這裏一定不方便。我們的目的是決不准浪費什麼，每個人賺的錢剛剛合着他的需要，工錢愈大，扣掉的食宿各費也愈多。」

「你們的平均工資多少？」

「我們的工資和外面自由工人一樣；工資的多少依工作的效率和種類而定。我們掙得多。」

我相信他的話，因為公社中來往的人毫無窮相，穿着考究。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有幾個年輕人走攏來，叫我去和他們之中的一位作家談談，說他能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我答應他們明天准去。隨後我等着一位願意領我參觀各處的年輕教師。他名叫亞力山大亞爾退莫維支皮郎斯基 (Alexander Artemovitch Birnski)，管着三處房屋共二百人。他並未爽約，準時而到。

「我們可以往紅角 (Red Corner) 坐着談談。」他提議道：「那邊比較清靜些。」

俄國的囚犯常絕對坦白地談起他們從前的生活，使我吃驚。這顯然是他們工人意識的強固，擊破一切羞恥之心，而使他們毫無忌憚地公開過去生活的黑暗面。再不然，是因為他們覺得過去的過去了，而說述過去，僅只為與現在的美滿的生活作一強有力的對比，藉此顯出他們如何努力於革新自己。

總之他愉快地，並無絲毫自怨自艾，講起他多變的生涯，他現在二十七歲，生長於一個工人家庭中，兩歲喪父，母親要做工，沒有時間照看他，四歲時候他給送到外祖父家裏。他於是進了學校，讀書聰敏。當他十四歲的時候，母親帶他往莫斯科，他開始當信差。繁重的工作困擾着他，使他不得不



上左：從前的囚犯，現在布爾雪伏的教師。

上右：潘姆監獄的女殺人犯。

下左：潘姆的前進份子，從前的女盜。

下右：尼許尼拖拉囚犯中的前進份子。

找朋友尋尋樂趣。朋友中有一個小客棧老板的兒子，也是娘沒有錢給，無法看影戲買糖果吃。於是他們合夥偷錢享樂。

十五歲起他開始犯罪，和朋友們練習剪綵。當革命和內戰的時候他們繼續偷竊，並無阻撓。因為人們沒有閑工夫去管這些壞孩子。後來被捕過幾次，一九二〇年他被送進反省院，再送入監獄。他住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會逃走，因為他不打算吃什麼官司。一次他掘了地洞走出監房，另一次他從煙囪管裏爬出來。

我打斷這生動的故事道：「你那時是否曾想起別種生活方法？」

「是的，有的時候我在電車裏攔到不少東西，我想：今晚也許又要在監牢裏過夜了；但等一會兒跟同伴們一喝酒，什麼都丟在腦後了。你知道，那時倘若有誰勸我應該誠實而做正當工作，我會立即給他一記耳光。我在一九二五年跟招我加入公社的社員們甚至說：你們不要自由，滾你們的蛋吧。我在一九二七年剛加入公社，但我無意於此，只不過看看而已。初入社七個月內我常常想：明天我一定要逃跑了；然而一到晚上，往往打消逃意。機器留住了我。他們給我一部特別精美的機

器，我不能離開它啊。否則我真的會逃的。我的冒險生活結束了，我仍在煩惱不安而危險的狀態之下。」

「有沒有教師之類特別注意你？」我問道。

亞力山大把雙手掠一掠那漂亮的頭髮，然後說道：「有的是，是尼古拉葉夫（Nikolayev）就是早晨和你說話的那一位。先前他就在這兒，他熟悉我們每一個人。他從不跟我說嚴厲的話；嚴厲適足以引起我的反感。他給我那具機器，七個月之後他漸漸注意我的交際。我知道每天早晨他問着別人：「他還在這兒麼？」當我拚命工作，不注意時間的過去，他很快樂。」

他當然得意地講給我聽他的位置的穩固和工作的能力。他也發明過幾樣東西，拿到獎金。他的工作超過一切，處處地方自求奮勉，終於做了教員。

「我們一共有六位很負責的教員，他們了解我們；還有社員當教員的一共十二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夫拉特米爾剛從窗口走過，我去叫他來，他很有趣。」

隔不多久一個高高的闊肩膀的傢伙進來了。遲鈍而怕羞，不善於說話，他替了他所敬佩的朋

友一眼，似乎不知道怎麼做怎麼說纔好，他本來是個賊骨頭，來到這兒纔不過幾個月，還有些陌生。他先後在獄中住十二年，最後被禁在蘇可爾尼基監獄裏，結果公社的代表去找他出來。

他不願談起他的過去，因為他受的痛苦太深了，而且他正有興緻於工作。亞力山大尋他開心道：「下禮拜夫拉特米爾要升馬廐長的副手了。」那棕色的大臉綻出微笑了。

最後我問工作的情形。

「我們每天工作八小時，在早晨七點半開始。社規是七點鐘起身，但是大都七點不到就起來了。早班下午四點放工，晚班直到半夜。」

我們傍晚的時候坐在宿舍的空場上很久。許多社員們跟我隨意談話。亞力山大指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在場的另一頭，漠然看着我們的青年道：「你瞧，那是泊新柴夫。他還沒有和我們相熟。他定不下心來，尙未把生活弄得有秩序。我們這兒像他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有沒有像他這樣新來的逃跑的？」我問道。

「有時候有甚至於資格老的當他們請求開釋而全體大會否決了也會跑掉。我們估計百分之十六有逃跑的可能；其中一半真的逃跑了，還有一半因為不適宜住在這兒，我們把他們送回去了。你不能忘記那些孩子都是屢屢犯罪的，因此我們的成功也就值得注意了。這離社的三百人裏邊，七十八人已經重得自由，二十三人竟加入了共產黨。」

翌日由尼古拉米開洛維支歇洛卿（Nikolai Michalovitch Schelouhin）擔任招待。他節我看布爾雪伏的藝術展覽會，確乎有不少優秀作品。平常的不計，公社社員中共有出類拔萃的畫家十八名。劇團常排新劇本，軍樂隊也練習很勤。還有三弦琴隊，據說到克立米亞旅行演奏去了。

已往的學識，在手頭的材料再加上新得的經驗使我深深地感到：罪犯們有相當的天才，而且假如用朋友的態度幫他們忙的話，他們絕對能夠改過自新。真正的罪犯討厭一切慈善事業。人們只能用種種法子提醒他們，使他們明瞭個人在社會上地位的重要，然後他們纔會踏上自新之路。我來往奔波，日觀俄國正在實施着的驚人的事業，和普及教育保持密切關係，和減少失業人數的五年計劃同時並進。

尼古拉坐在那裏和我談談說說。他不喜歡人家插嘴，少年時的情景重復浮在他面前，他講給我聽他的一生，就像說着生動的故事：

他於十一歲時第一次被捕，其時他是鐘表店裏跑腳步的學徒。他的父親丟掉他母親，辦上一個娼妓，因此他變成野孩子了。有一次他瞧見父親和那女人挽着手臂在街上走，他拿了石子想擲他父親的頭，不巧給父親發覺把他趕走。就在這時候他開始偷東西。他情願住在家裏，工作也太壓迫他。他就和一個也恨着自己父親的孩子交起朋友來。他們趁鐘表匠不在時，偷些戒指和錶，把戒指戴上一塊兒走出來。不多一會兒他的朋友兜賣戒指被捕了，因為他早就給他父親攔住，吃警察一頓痛打。嚇不過只好供出他的朋友的名字。那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其後他仍屢犯竊案。一九一六年他給關進少年犯反省院。他逃走了，流浪了九年，搶了一家工廠，而且「幹的不壞。」一九二〇年他的父親尋着他向他要錢，他想再搶些錢財來開個舖子。當他第一次被判十年，他的踰牆越屋的搶劫本領已經很出名了。

有一次他在一個跳舞會裏溜出來參加佈置好了的夜劫計劃。起初進行順利，後來被人發覺，

他的同伴們給攔住，但他躲在雜物間的粗布堆下面，沒有被捕。警察走了以後，他纔爬出來重新到跳舞會裏。他繼續幹竊盜的營生，終於關在斯麻倫斯克獄中，在獄他加入了劇團打算逃走，在到烏拉爾山集中營的途中，他脫逃了，趁火車往莫斯科。後來他又在莫斯科被捕，纔會到布爾雪伏來。

「我乾脆告訴你吧，」他繼續道：「我仍然只想逃跑。我到這兒是五點鐘，打算十一點就回莫斯科和幾個夥計打劫一個棧房，我永不會忘掉那一天。剛到這裏我遇見幾個在先前監獄裏的老伙伴，他們包圍了我稱讚這新的環境。於是我參加了一個團體。我完全忘記了原先的計劃，之後發覺回莫斯科已經太遲了。終於我捺住性子等六天後開了全體大會，再作道理。結果他們不但允我入社，並且立刻在廠裏派到工作，並且我還當了一排社員住宅的副管理人。我開始時非常興奮，簡直過着絕對的新生活。有時我不耐煩了，但同志們總有辦法使我安靜。我向來不歡喜把同志們的喝酒或類似的小罪名報告上司，第一次報告別人我良心上很受責備。可是有一個被我報告的同志居然來安慰我，說他決不見怪。從那天起，我就安心盡力於社中的職務，決意對公社十分忠實，正如往日對匪友一樣。

我和尼古拉一同參觀工廠。他也是教師之一，各處同志們都對他注目微笑。有的年輕人仰了頭看他，彷彿大人物。也許他真的是。我聽人說過教師們只是他們的朋友。社員們看重教師們的智識，也明白教師了解他們；而從社員升為教師的，簡直等於他們的同胞弟兄了。我這纔明白總幹事的代表告訴我的話：「如今我們只從社員裏面挑選教師了。」布爾雪伏公社本身自己在發展。一個不明白這發展的人很難取得社員們的信任，使他們熱心於工作。

尼古拉打斷我的思路說道：「我的母親也在這兒，你高興見見她麼？她從前受苦，現在可和我們住在一塊了。你也可以見見我的老婆和孩子。我的妻子不喜歡住在這兒，她不了解我其實只爲了這公社纔耽下的。」

那晚我在車站遇見社員潑興查夫，他正來往踱着，看到了我就和我攀談起來。他說他住在公社裏不大方便，可是他是自願加入的，沒有話說，只好住。他曾被判十年徒刑，也曾流放過西伯利亞，所以放逐西伯利亞之故是因爲他脫逃的次數太多了，然而結果又給他逃跑了。這些痛心的往事

他不願再提了，總之他在莫斯科打電話給警察局長，說假如他去自首，能否送他到布爾雪伏局長答應了，於是他就來到這兒。

「爲什麼你覺得住在這裏不方便呢？」我問。

「我纔來這裏不久，而我的愛人住在莫斯科。我想跟她結了婚，帶她到公社裏，然而他們議決不准，因爲我還未十分立定腳跟，再說我掙的錢還不夠養家。那不錯，不過我總覺得這是硬心腸的主意。無論如何我總是自願入社的啊……。」

我瞧着他眼睛裏的表情，幽遠而疎散，像在回憶着過去的一切。他能夠踏破往日和目前的困難而爲真實的生活而奮鬥麼？還是重復投入那無邊苦海似的罪犯生活？

少女教養區

最後——在離莫斯科三小時旅程之後——那緩慢的火車停在波克洛夫（Покров）站了。月臺上擠着很多人。我們四週尋找，終於看見一個長身玉立的婦人大踏步向我們走來。她穿着制服，用軍禮招呼我們，自己介紹是這女孩教養區的指導員。

「我頭班車就候你們的，」她有些歸咎於我們地說着。

「那太早了，我們想十一點鐘到這兒正好。」

「無論如何我們歡迎你們來。女孩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不巧我們今晚上必須還去。末班車什麼時候？」

「今晚還去不成！我們預算你們至少耽一星期。孩子們打算大大的招待一下。乾脆你們明天走。」

「但是我在莫斯科有兩個重要的約會。」

「拍電報去就不會誤事。我立刻去發出。」

我們分坐在兩輛農用馬車裏，穿過樹林，沿一個大湖走。「這並不是大湖，」趕車人又進來道：「只是一個池子。難道德國的湖這麼小麼。」

忽而車子停在轉灣角上。那女指導員跳下車來，說要參加我們的談話。我們的車裏委直沒有空地了，但沒有關係。「當過兵的什麼地方都能坐，」她說着，把趕車的推往旁邊一點，對着我們坐在車箱的邊上。

「瞧，現在到了，這些池子是屬於我們的。女孩們在夏天差不多完全從事於農作。」
我們問她這教養區什麼時候成立的。

「八個月以前，」她說道：「一共女孩六十人。開始時非常困難。於是我們把第一個活動的團體組織起來。從那時起這就變成全體可靠的模範。和那些野而不守紀律的女孩打交道極不容易，

尤其因為她們的性格常常變化。現在我們共計一百八十名學生，大致都在十六歲十八歲之間；我們很難說出她們的確實年齡，因為她們之中有許多是連護照都沒有的。許多年以前他們從父母那裏逃跑，在路上或林子裏流浪，有時漂泊在城市裏，沒有名字，也沒有家。」

「這些流浪的人能習慣於日常生活而工作麼？」

「如果她們找到合於個性的工作，那結果往往出乎意料地好。但我們很難替年齡較大的女孩設法，除非偶然發現了適宜於她們的職務。她們大都有浪漫的想頭，而且不滿足日常生活。她們在工作完畢後需要的刺激，就能導她們的浪漫思想入於正規。外國人來參觀也是這刺激之一。她們對於外國有很離奇的見解。」

職員宿舍和療養院在右邊。左邊是一環橋，從湖的支流的一邊連到一座美麗的舊的寺院，它就是加以擴充而供女孩們之用的。

「你來的不湊巧，」那指導員當我們走出馬車時客氣道：「我們就在這兒造新房子，我應該

有所新屋子，現在的那間一到冬天非常不舒服。」

我們走過那起造屋子的地方，走進一所老屋子，經過小而黑的廚房，繞到一間更暗的壁上的紙裱了色的休息室。「不錯，這兒不十分華麗，」她說：「如果住在這裏工作，一定不舒服的，我們剛剛開辦，也只好這樣。然而女孩們的地方可真的不壞。請喝些茶，我們立刻上那邊去，她們快不耐煩了。」

橋中間掛着一面闊而大的紅旗，上面是德文：「歡迎德國客人。」

「你不曉得女孩們弄成這面旗的困難，」指導員道：「她們必得查字典，這兒沒有人會講德文的。」

橋頭寺院入口處站着兩個戎裝的女守衛，戴了尖頂便帽，短襯衫，皮帶，向我們行軍禮。

她們在場上奏進行曲歡迎我們。所有的女孩兵士一樣地排了隊，我們走過，她們致敬禮。昂然闊步，像戰場上的將軍檢閱小兵，於我是異常不慣；但我的思想立刻回到那些女孩身上了，她們最近還是流浪在街頭，如今竟這樣有紀律地排成隊伍。她們是超羣的隊伍，人們會疑惑她們是否是

女孩。有些簡直就像男孩喬裝的，剃光了頭，像夏天的男子。到底在酷暑中沒有頭髮是舒服的——爲什麼不應該剃？我請求軍樂隊繼續演奏，使我能夠繼續攝影。那第二排美麗苗條的孩子是誰？我問指導員。

「她是工程師的女兒。她從家裏逃出來，跟男人們四處走，還偷東西。她剛來的時候非常頹喪；她覺得孤寂而苦悶。現在她比較活潑了。她受過良好教育，很勤奮，如今位置不低。

在命令之下女孩們解散了。有些還屋裏去；別的在後面草坪裏跟一個男教師跳鄉村舞，我站在那裏望着四週。

「那是我們最好教師之一，」指導員解釋道：「他自己也曾是個流浪漢，現在爲迷途漂泊的人們的幸福而盡心竭力。」

「這不會發生困難吧？女孩們將不看重他？」

「我們不大留心尊嚴什麼的，我們用同志間的合作來代替。女孩們對這位先生特別有好感。她們說：『他是我們的一份子。』這些女孩，以前就像在狂風巨浪之中過活，不安定而暴躁，現在感

到，而且應該感到她們和她們的教師們一塊在工作，在互相幫助。」

「不巧我們廠裏現在停工。」引導我們的人當我們進去的時候說道：「今天是例假日，不過女孩們在夏天也很少在這兒工作的，多半在田裏忙。」

從前寺院裏的小禮拜堂已經改成工場了。凳子和機器分成長行排列着。我問金屬工作會不會使女孩們過於勞苦。

「大多數人熱烈地喜歡勞苦的工作。」指導員答道：「而且她們也需要。倘然她們的精力沒有地方發洩，她們會變得非常神經質。她們自誇有這麼一個金工廠，並且相互鼓勵，以求更多的生產。」

宿舍：高高的寺院房子，大窗，窗外望出去是樹木和池沼。各處都用花束裝飾着，女孩們盡力使我們看遍每間房間。她們起初比較生疏而謹慎，裝作不十分注意我們的樣子。

「她們今天晚上將更其認真，」指導員說：「可是此刻你得吃些東西，休息一下。我的助手會來答覆你一切詢問，司法委員會給你的通行證上載明那樣的。你是我們第一個客人，直至如今我們沒有讓陌生人來參觀過。我們進步得並不太快，一切仍在草創時期，而且沒有充足的經驗來檢討已往的工作。我希望罪犯研究院能有人來，那麼各種設施都能弄得科學化，但這兒各方面都缺少得力的幫手。」

「這教養區裏一共有多少男女教師？」

「我身邊有兩個副手，另外男教員五人，女教員三人，教師七人。」

「爲什麼男的這樣多？」

「我們只雇傭資格合適而準備獻身於這困苦的事業的，或男或女，壓根兒沒有關係。頭先客客氣氣解職過幾位，因爲他們神氣活現，而且不知道怎樣管理女孩們。」

「你們外邊有顧問麼？」

「有的，我們的教員會一共十八人，法庭中的推事和檢察官也是會員。教員會議三個月開一

次討論提早釋放和別的重要問題提早開釋是多少。要看她們的父母或親戚是否在打算，是否能夠負責任。」

「你們的教員受過什麼教育？」

「大致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有兩位教師對於訓練頑皮兒童富有經驗，一位是工程師，一位生物學家。大戰時我做過社會工作，同時在家和在收容所裏研究兒童福利事業。我曾在兒童朋友會七年，因此極熟悉流浪孩問題。」

「女孩們日子怎麼過的？」

「目今夏季她們大部在近旁的合作農場裏努力工作。收穫之後，她們在金工廠、廚房或田裏工作四小時，其餘四小時學習些理論。至今我們還沒有一定的時刻表。」

「你們有沒有文盲？」

「二十一名。她們大都能讀能寫。叫她們按部就班地學習可頗不容易。她們毫無耐性，總想在片刻之間學成一切。進步略緩一點，她們又失卻自信了。我們的實業學校二年畢業，我們希望課程



田 間 工 作 的 少 女

儘量的充實。」

「這兒的女學生是不是都犯過罪的，還是僅只是流浪者？」

「她們全判過罪的。大半犯的小偷罪，有些是嚴重的搶劫罪，還有些是合夥盜竊罪。把那些習慣於遊惰快活的生活的女孩們弄得對工作發生興趣是不十分容易的事，在我舌敝唇焦解釋工作的快樂之後，一個女孩跟我說道：「同志，你太老實了。你說我虛心學習後能忠實地作工賺錢，可是我已經能掙許多錢，一點兒也沒學習什麼——兩百盧布只消一個晚上！」

「有些女孩是變態而神經質的。有一個極富於文學天才的孩子，我們不得不送她往另一養育院。她腦子裏滿是希奇的幻想，她更固執地信以為真。有一次她拚命掘地一星期，想找金子，因為她錯以為校址下面一定有人看守着一堆寶藏。還有一個會寫文章的孩子，以前極端不受約束，從家裏逃出來，結黨盜竊。現在她完全改變了，我們能派她往莫斯科幹重要差使，她常立刻回來。她而且常帶些逃跑的同志回來，她熟悉她們躲住的地方，找出她們來，勸她們還是回來的好。」

「這兒逃跑的孩子不多麼？」

「去年冬天以來只不過七人，都已經給帶回來了。有幾個確乎有遊蕩的慾望，時時感到有逃的必要，但不多幾時又回來了。她們自己也明白，如果再作第二次嘗試，那結果就是監獄。她們在這兒把工作代替徒刑，在水和樹林中過活，自然比隔離監獄中舒服得多。我們現在對真正的遊蕩傢伙非常寬容，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如何去跟她們接近，如何去替她們的將來作打算。」

「最難訓誨的是那一類人？」

「是有竊物癖的人。她們月經期內特別不安定，易受激動，常表示出過度的愛的舉動，性感覺也特別敏銳。由此我們見到大致天才愈少的人，情慾也愈低。最容易受激動的女孩是那些為家庭不睦而離鄉的，或妒嫉繼母，或妒嫉公開的男女關係之類。於是她們無目的地四處漂蕩，或偷竊或陷入種種不幸，她們跟普通孩子一樣需要愛情，但她們異常神經過敏，人們對付她們必須非常當心。但時候不十分早了，我們可以在晚會之前往幼稚園去看一會兒。」

「你們也有童犯麼？」我詫異地問。

「不，不，他們完全正常的，是我們職員們的兒女。在我們沒有適當地方供給職員們的小孩以

先我們決不讓他們到這麼一個寂寞的地方來的。我丈夫在莫斯科當法官，我的孩子們在這兒幼稚園裏，因為我目前沒有時間照顧他們。但我每天看見他們。」

「你的工作不太累麼？」

「是的，當然，但另一方面，工作的興趣使我捨棄任何事業。有時我也得到些休息，這夏天有一個朋友從莫斯科來，硬拉我進一輛車，同時給我一條毯子和幾本書。」這什麼意思？我問她。她說我就會明白的，於是把車子開入樹林，到了一處異常幽靜清麗的所在，她說：「現在你在這兒躺下看些書，等會兒我會來接你的。此後沒有人煩擾你了。」

我們晚上到大廳裏。樂隊演奏着。女孩們圍着我們擠得密不通風，她們想明白些國外情形，是否如她們往常猜測的那樣奇異。「是的，」我說：「德國確乎美麗的。」但她們問了些緊要的問題，我證實了她們的希望並非事實，她們終於極度的失望了，我說：德國失業的人非常之多，而犯過罪的重新在社會上佔地位的機會又非常之少。

指導員登臺，等那進行曲演奏完畢。女孩們全體肅靜坐下。她先述及這女孩教養院的組織情形，然後說到現在：「我們已把我們最有力量的人送到工人羣的最前線了。這是幫助我們祖國，幫助我們子孫的模範。她們過去對於人生有極錯誤的觀念，然而在播種和現在在收穫的時候，一切都證明她們已經對公民的責任有準確的見解。不僅如此，他們同時變得強壯了，皮膚棧色而頑健。我們在農場工作的失掉了她們喜怒哀無常的態度，神經質的習性也消失了。再不會有人聽見別人說：「她又危險了。」我看得很清楚，工作緊張，於是生活充實。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的學校能夠擔當得起一切社會工作的榮譽。謝謝你們的合作。少數幾個人的失敗並不能影響你們的工作。良好的收穫都是勤勞的結果。因此，在將來，我們的食物會豐富一點了，那是你們各個人工作的酬報。我們將見到，不久我們之中沒有懶惰的人了。」於是共產黨青年團主席上來報告。她是這教養區裏青年團的首創者。她報告可作農作模範的突擊隊的情形，她說突擊隊員八小時的工作比別人十小時還強。

最後，村蘇維埃主席對女孩們忠實的幫助致謝辭。所有演說的人都熱烈地歡迎我，我也不得

不略略說幾句算作答辭。休息之後開始體育表演和音樂，末了一齣短劇，描摹舊式的個人主義的農家裏，一個年輕女兒和老朽的觀念的衝突。

倦極躺到床上，我覺得這床好像石頭做成的。俄國人受過訓練，太想不到外國人睡在他們的板上會十分不舒服。翌晨醒來我仍覺疲倦，找來找去找不到洗臉盆。後來那指導員碰見我時說道：「我們在夏天總是早晨就洗澡的。」

因此在晨曦之中我們穿進那潮潤的樹林。一個湖彷彿銀色的盆子耀人眼目，白色的沙灘靜靜地在我們前面，於是我們就在碧綠澄清的水中上下浮沉。

我約好三個女孩候我談談。格立娜尼古拉葉芙娜杜勃洛芙斯加雅是十九歲；她一直走進來，就此開始談起她的生平。她是個動人而美髮的女孩，我更喜歡聽到她說起厭倦於流浪生涯，而需要工作和安靜。

「聽啊，」她說：「我過了三年的街頭生活，四歲時候我的父親死在戰場上，我就給送到兒童之家。十五歲出來，在一所合作社裏作工。我不喜歡這工作，走出來想往沙瑪拉（Samara）碰些好運氣。但是，一些也找不到。於是我在馬路上逛，偷東西，直至給捉住關在監牢裏。後來我被送到這兒來。我在這兒很快活，因為我能學習些東西。我不再想到過去的生活，現在着實比過去好。關於我的一切就只如此，但喜馬葉芙娜的經歷卻比我豐富得多，你一定得和她談談。她早先在布爾雪伏，情願住在那兒，而且存心不再偷竊，可是有一天她的從蘇可爾尼基監獄逃出來的朋友來了，要她一塊兒出去。於是她逃跑了，跟他喝酒而偷竊，晚上睡在樹林裏。終於警察包圍他們，想捉她的男朋友，然而喜馬葉芙娜奪了一個警察的手鎗，因此她給補住帶走，而眼着她的朋友在逃走時被他們開鎗擊斃。那是她一生一世忘不掉的。她的工作不錯，指導員同志也稱讚她呢。」

「你注意到我剛纔和她說話的怕羞而漂亮的女孩麼？」指導員當我們又單獨在一塊的時候問：「她在這裏，因為七歲以來，屢次爬人家的窗口偷花。她是醫生的女兒，受過教養，然而智識方面顯得低能。遊戲和工作都不能逗起她的興緻，我們弄得很失望。後來我們拿些顏色紙叫她做花，

從這一分鐘起她似乎復活了，製造絢爛奪目的花朵，現在開始在刺繡。」

「我已經去叫克拉芙雅布爾乍伐來了，昨天我特別注意她。在她進來以前，你能不能講些關於她的事？」我和指導員說。

「她是最難訓練的孩子之中的一個，」她答道：「她很費我們手腳。十七歲，兩年前由政治保安局送來的。初來時她不肯工作，她的話別人簡直難以聽懂。一月之後她開始對壁報發生興趣，常寫幾段東西評論些事。如今她進了中級學校，在廠裏工作非常敏捷，但她總不能長住在社裏，不時逃走，隔一兩天又回來了。你必須記住，這女孩流浪過十年。此刻我們還很難說她將來會變得怎樣。」

克拉芙雅布爾乍伐進來了，猶豫不決地坐下，默默地瞧着我。修飾過的頭髮下垂着，人們看不見她的額角。一對大眼睛怪怨地向指導員：「你總之不喜歡我。沒有人留意我，我彷彿是秋天的黃葉，你們對我毫不關心。」她說。

「是啊，你常常走掉，還想希望人家特殊的友誼麼？」

「你知道我自己也做不得主。我不能混在這些女孩之中。我不喜歡她們。根本沒有什麼和她們談；還不如去跟風說話。」

「聽着，」指導員說：「倘然你要走，先得告訴我。然後我讓你出去兩天，決不能一聲不響就跑。你想這是給旁人多麼一個不好的榜樣。」

「嗯，我會告訴你的。」她粗聲粗氣說道。

「你自己以為走出去只是因為需要孤獨，可是有人瞧見你在村裏跟男孩子喝酒。」

「這只不過一回，否則我太孤獨了。你別再跟我為難吧。你肯不肯，至少和我父親談一談？」

我問起工作。

「不錯，那不可思議，」她道：「我喜歡勞苦生活。如果我沒有那部機器。我決計耐不住再繼續住在這兒。從小我就恨無聊的生活，那就是我為什麼常常逃跑的緣故。」

「我想和她一塊兒出去散步一會兒。」我提議道。

「那可以。我在這兒等你，不過你別太久。我打算領你往合作農場，我們的孩子大都在那裏工作。」

於是我們走進樹林。我問：「你離家時幾歲？」

「七歲。當我的父親，一個製鈕扣工人，被捕以後，我就像狗掙脫了鍊子出來了。我小時候受過嚴厲的鞭策，慘得很。想四處走走，瞧瞧有趣的東西。我愛艱苦的生活，不能久守着一個地方。假如這兒沒有大機器，我早就逃跑了。」

「有沒有人你喜歡的？」

「我好久以前有個朋友。那時我只十五歲，我和他在樹林裏住了幾個月。我們什麼事都談，彼此非常投機。他也是從家裏逃出來的，他是我的第一個知己。後來他們把我們硬拆開了。我看到一切徒然，只得和別人來往。」

她的胳膊上刺着圖畫和詩句，我看得清楚：「世間無歡樂。」

「你和泰瑪拉勃拉其李莫伐談過麼？」我回來時指導員問我。

「噢，那美麗的女孩，昨天問我德國人穿甚麼衣服的？」

「是的，就是那個。我不能擔保她的名字是真是假，因為她已經來了九個月，還不肯說出她的母親住在那兒。全體女孩都愛她，什麼都跟她說，她卻輕易不吐一字，她有些癡。她一定遭過許多忘不掉的傷心事。現在她混在豬堆裏。」

「那漂亮的人兒這樣喜歡時髦，卻當牧豬奴？」

「是啊，真是不可思議，她非常甘心做這事。我們都已試過，在廠裏、廚房裏、田裏她都不中用。她熱心於豬羣已經三個月了。每夜起來喂小豬，從不睡過頭的。有一次她感到太寂寞了，緊緊地摟着一只小豬，喚道：『我親愛的小寶寶呀！』」

我想替泰瑪拉照個相，她很快樂。她帶了串細項鍊，小心梳理了她金色的頭髮。隨後她誇耀似地領我們看豬圈，談起她的工作。

當我們歸去的時候指導員說道：「那幾乎沒救藥的孩子似乎對她的新工作頗有興趣。但照

我看來，工作決不能真的使她滿足。只有快樂的婚姻可以改良她的一切。」

我們還有一下午，到合作農場去看她們採黃瓜。她們送我一筐，我說這在莫斯科的旅館裏毫無用處，可是她們堅執不理。那指導員送我離車站，並且說：「你這就走，多麼可惜啊，女孩們將在今晚點火把划船，而且唱歌，她們總愛做浪漫事情的，其實你大可耽在這兒看看。你必得再來玩啊。」我胡亂答應着，進入車廂，捧着一大筐黃瓜。

難弄的女犯

「……他們帶我到警察局，把我關進一間已有五十來個婦人住的屋子裏。」小東西你幹了些什麼？」一個老太婆喊道。我說我殺了我的後母。你知道她們怎樣笑我啊！「唉，你得走遠路了。」一個傢伙說：「各位要小心，她不是好東西！」起初我的頭腦完全混亂，簡直糊里糊塗，一兩天之後我方纔能回答別人話，而且時常爭吵。」

那跟我說話的肥胖的年輕犯人記起了從前的經歷非常興奮。她的罪案的本身似乎不十分能使她煩惱。她恨她的繼母，因為她的跛足的兄弟常受虐待。她坦率的答覆我的問題。

「我很早就和後母開始衝突；她簡直半個字也不認得。我的父親是村裏的教師，我媽死了，他就把這惡女人弄來了。」

「他在結婚之前和你談起過沒有？」

「絕對沒有。有一天後母突然出現了。我傷心着我不能再管家了；尤其可恨的是她站在我們親愛的媽媽的地位上。」

「你們的家多大？」我問。

「兩小間。我弟弟睡在客堂間裏，我不得不跟他們倆一塊兒在臥室裏睡，因為客堂裏容不下再放一張床。我甚麼都看見聽見！我但願立刻就死，偏偏身體怪好，寒熱也不發一個。」

「你怎麼殺死後母的？」

「她的娘來望她。她們計劃去避暑，似乎想在鄉下弄間房子，叫弟弟仍舊留在莫斯科，在火一樣熱的地方，說是因為他脾氣壞，鄰人會照應他。我那時不十分舒服，常常容易冒火，聽了她們這麼說，我想：『那不成。』我的後母送老太婆上電車去了。在她回來之前電燈滅了——我從抽屜中取出小斧頭，奔到走道上，她走來時我就劈過去。」

「她是否立刻就死？」

「我不清楚。斫她三下，她一次都沒有叫喊。於是我奔還屋裏，燈仍舊沒亮。我抖的厲害，只好坐

在床上。隔壁父親正在應酬客人。後來燈又亮了，父親喚我出去預備茶。我略爲鎮靜一點。」

「你父親問起她在那裏麼？」

「沒有，他也許以爲她仍在電車站。我們剛喝茶，有人敲門了。近鄰的人們帶驚詫的神色說後母死在過道上。他們說：『當然是你幹的？』我說我沒有，但警察來了，我什麼都招出來。」

「怎麼？」

「他們說：『我們會把屍首的眼睛拍照，兇手的面貌一定留在瞳孔裏！』於是我立刻招認。我其實也真笨，在黑暗中後母決不能瞧見我，而況我又是在她背後斫的。」

茄麗娜拉斯脫拉也伐，另一個女兒，是二十二歲。臉龐小而美，迷人的頭髮從中間分開。她髮鬱漆黑的眼睛打量着我。雖事隔一年，那可怕的一刹那依然使她煩惱，一閉上眼，面前老是些割裂的肢體，血肉模糊的臉。

她很有些遲疑地講起她童年和青年時的情形：有一個叔父曾強姦過她，當她十歲光景，父親

也虐待她。這也許能是她犯罪的解釋。二十歲上她結婚了，非常愛她的丈夫，因婆婆的搗亂，丈夫不要她了。於是她嫁給另外一個人，他很愛她，雖則她僅僅是要找一安身之處而已。有一個他的朋友跟他們住在一間屋子裏，追求她，當她的丈夫不在家時和她纏繞不休。在莫斯科人們住得太擠，沒有辦法。終於她和他把那可惡的傢伙殺了。「這都有案卷——我說不上來了。」她說。

前幾時我在莫斯科警察監獄物證部見過這女兒手的像片。此刻她的面貌變得沈靜憂鬱了。像片在被捕的當兒攝的，那時她兩眼失神，不知所措，屍首裹在大筐子裏，擱在車廂的行李架上，後來一只手吊下來，旅客們方纔發覺。

「別談牠吧，」我道：「讓我們忘掉這一切。請告訴我，你在拘留所怎麼樣？」

「那邊我始終一個人住一間，沒有人難爲我，但一到看守所，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和六十個女人在一起，那真可怕。她們成日成夜辱罵我，而且說：『殺人犯不是好東西，必得槍斃。』」

「那末在這兒監獄裏怎麼樣呢？」

「獄官倒還和氣，從不說一句重話；而同獄的囚犯反而常常冷諷熱嘲。沒有一天太平的。有時

我和外邊知道我所犯的罪的人談，他們卻很客氣，但獄中同伴完全瞧不起我。」

「工廠裏的工作能否減少你這無謂的憂慮？」

「是的，工作或自由時間中，我大致快樂些，然而其間還有一長段時間。我和別人一塊兒吃飯，寢室裏又一共有十七個人。夜是多麼長啊！如果兩個人談得過久，就有妒忌的喜劇發生，有時甚至演全武行。我並非真被這些過分煩擾，就只再忍受不了那辱罵。」

幾天之後我問起茹麗娜。

「昨晚她想自殺，」女指導員跟我說：「我們發現她吊在盥洗室窗門上，就立刻割斷繩子放
下來的。」

我往病房，她瞧見我，轉向牆壁悲哀地哭泣了。

難道這許多女人擠在一起真會發生這麼壞的結果麼？我要確實知道。

我想探問清楚女囚犯們是否真的擠得這樣厲害。據說太根卡大監獄共有候審犯人二、二

○○人，正式囚犯一、○○○人。兩年以前尚有兩個看守所，可是現在沒有了，莫斯科市區內的候審犯人全送往太根卡。男犯的設備不壞；我參觀過許多屋子，每屋只容四五人。另一方面，女候審犯一九〇人，卻只派着三間臥室。老年婦人和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混在一塊兒。我一進去，來不及開口，她們就圍上來七嘴八舌地訴說苦處。

終於我站在廳裏。柵欄緊閉，囚犯們緊靠柵欄，想聽我們的談話，我們說得太輕，她們大致聽不到甚麼。「不錯，這麼許多女人一天到晚咒罵爭吵，確乎可怕，」職員說道：「特准在工廠做工的女人光景要好一點。」

「昨天我參觀的時候看到男的和女的在一起工作。這你的意見怎樣？」
門口起了騷動，一個嗚咽着的女人進來了。「他們不准我做工，我的位置給別人奪去了。」她大聲叫喊，藉以證明她的無辜。

「這不足為奇，」職員漠然道：「囚犯工作不認真，媽虎，是可以除名的。」

「可是你不以為她們彼此商量好之後來對付我麼，這麼許多候審犯在一起。」

「不，我們只准已經定罪的犯人在一塊工作，而況工場裏還有監督，沒有錯兒。」

「做工的有多少人？」我問。

「一半以上，不然事情就難辦了。她們工作疲倦了回來，就不會吵鬧。」

我問人民司法委員會為什麼候審犯住的屋子比女候審犯的好，現在的情形是暫時的，他們告訴我：「在你還德以前，女監就會完全換個樣子了；女看守所的屋子也將大大的增多。」

一月以後，在酷熱不堪的一天，我又往女子監獄。一個犯人跟我說我上次來過之後就發生一樁可怕的事。瑪路斯雅給打得半死，她說：「還有那個你跟她照相的黑皮膚女孩，至今還是遍體鱗傷。」

「誰幹的？」

「兩個重犯。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她們和瑪路斯雅和那女孩搗亂，她們常常開玩笑的，彷彿說

是誰偷了一張美麗的畫片。當時機器嘈雜，無線電聲音很響，大家沒聽見什麼。如果沒有人偶而經過宿舍，聽見叫喊，至少一個人早給弄死了，她的手腳都已被她們打不成樣。」

我不十分相信竟有這麼慘的故事，就去問監督。

「不幸這是真的，」她道：「一個仍舊在醫院裏。我們立刻審訊，犯事者現在幽禁在太根卡，將判重刑。這種事情委直可怕。她們以前都犯過罪的。現在我們澈夜有人看守了。」

我覺得這未免走到退步的路上去了。男人有資格自治，而女人晚上必須有人看守。

我問一個管過許多年女子監獄的經驗豐富的獄官，是否女的確乎要比男的難辦得多。

「毫無疑義的。給我一個女人還不如給我十個男人！」

我說：「我想她們的怨着自己的命運，也許跟罪惡不無關係。她們的發怒真正表示着無助，發洩在每個人身上。」

「可能的。社會工作着實能使男人們發生興趣。可是這兒有些重女犯倒也能做傑出的工

作。」

「也許女人的所以脾氣壞，因為孤獨的緣故。」

「恐怕有些關係。在開放監獄裏她們和男子一塊兒工作，格外顯得靈敏。」

在潘姆女子監獄男囚犯也一同工作。他們都是訓練女工的專家。製革廠中隨處可以見到男人。他們用同志的態度對付女人們。獄官也是男的，還有不少男職員。女犯共計二六〇人，其中七〇人在菜園裏耕作。

我問起種種問題。對的，有時不免於爭吵，但並不常常發生。她們都忙碌，而且宿舍很多，而且並不跟男子隔絕。她們和他們談笑，一塊兒工作，喜歡在他們面前顯本領。

「你們必得硬了心腸，用工作來感化女人們。」獄官道。

我發現女囚犯也有在那大的男的開放獄中工作。「他們一起過日子怎麼樣？」我問道。

「非常好。」

「倘若他們交情深怎麼辦？」

「他們如果自重，不妨害工作和公衆的安寧，我們決不干涉。」

「有沒有困難事情發生？」

「偶而也有的。我們這兒曾經有一個輕浮的姑娘，非常喜歡軋餅頭，囚犯們勸導她，但當她老脾氣發作時，我們就送她往別處去。」

我說我難於相信性關係這樣平常。

「你太把兩性問題看得重要了。你該知道囚犯們常有人來探望的。假如她們做工不脫班，平日規矩，她們就享有完全的自由。她們生活上並不缺少什麼。隔離監獄中所難免的勉強情形，這兒完全沒有。」

「那麼開放監獄裏的性問題已經解決了？」

「難道你還疑惑麼？」

俄國女犯不多。蘇俄的女犯只佔全數百分之八。高加索每二三百罪犯中女犯僅佔一人。大都是境遇的不好，驅使她們犯法，因而深深墮落。她們不安定而缺少幫助，禁錮在圈圍之中，只好彼此發脾氣。有許多是以前的娼妓之流，嘗被迫和別的婦人住在一起時，她們興風作浪，使那新環境更不適合於她們自己。一切爭吵，怨毒，眼淚，都是她們不安定的結果。問題依舊在——怎樣幫她們忙。

蘇俄境內仍有女子監獄兩個。烏克蘭就沒有為女子而設的隔離監獄。在那裏男女共同工作，共同消磨閒暇時間，一起在場上散步，毫無純粹女子監獄中那種緊張空氣。以我想來，似乎這倒是那待決問題的正當辦法。

入獄的紅軍士兵和黨員

一次公開監察會議的席上。大會廳裏擠滿了人。坐在我旁邊一個官員把他所知道的每個申請人的情形輕輕說給我聽。「看前排的那人，他是亞美尼亞人，從前當過泰豈開斯登警署長官，以怠忽職務，被判期限極長。」

我奇怪，位置高而重要的官員竟和普通罪犯一起在獄中？不僅如此，他們還指給外國人看！後來我和一位人民司法委員會的領袖談起這事。「你以為特別麼？」他問：「我們不隱瞞任何事實。一切事不管好壞都公開討論，我們很感到坦白的好處。你不妨跟那亞美尼亞人談談，他一定能告訴你許多事。」

「跟他談起他的過去，他不會不高興麼？」

「大致不會吧。你的問題必須出於正當的理由，而不能出之於無聊的好奇。你可以在我們的

辯詞中看出我們怎樣對付有罪的高級人員。」

他的話沒有錯。那亞美尼亞人十分情願地跟我談起他的生活，雖然並不十分坦白，很有些誇張，但總之是意料之外的。他承認着他的罪名的大概情形，我一面看着案卷查考他的事蹟，一面再詢問他，他並不面露不愉之色。他明瞭：倘然我要得到事實的真相，必得這麼做。

他是警察總署的副署長，偵緝部部長，有將軍銜，並非正式共黨份子，而是預備黨員。他告訴我他必得僱些冗員。因為一部份工作需要熟諳民情的泰豈開斯登本地人來擔任，而另一部份技術工作，上峯命令必須僱莫斯科派來的人。「這兩方面的人不斷的鬧意氣，」他說：「大家要我驅逐對方。我勢必做和事老，隨時處置他們的爭論。我們的責任是對付盜匪，是很不容易的工作。終於不祥事件發生了。他們特別責問我私售公了的荷蘭酒。」他說其實那是別一個官員幹的事，那人其時因病往鑛泉休養去了。「我開始受人攻擊，立刻打個電報，要他回來了結這事。但審查委員會不想把他混在裏頭。他們叫我獨自上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們信任了那時常爭吵而使我痛心的兩方面人的證據，於是我被判七年監禁。這事發生於邊睡，所以判得這樣重。他們說我當領袖簡直當

得荒謬絕倫。」

我不能確實地知道他當初怎樣爲自己辯護的。他說他打過一個偷東西的孩子，但這似乎不足以引起這樣嚴重的責罰。

然而，在案卷簿上全然相反，鑿鑿有據地載明泰豈開斯登拘留所的情形不能使人滿意。被告使囚犯有縱酒的機會；辦事非常糊塗；帳目有大錯誤；而且並不督促下屬做正當的工作。充公的酒類撥作私用，有八十升酒沒有下落。拘留的職員曾虐待犯人；逮捕無辜人民，而把有罪的釋放。我重新問他，他解釋道：「簿記有些錯誤，我承認的，但當時辦公室的人拒絕把這項修理費補登，因此帳上沒有了。」

我似乎很清楚了：他是負責的官長，不得不帶到法庭上，而判決的這樣嚴厲，也因為他的職務太重要之故。

然而他還有辦法，把細心的工作和行爲來縮短他的監禁年限。釋放之後，他仍然有機會升官；他纔不過二十七歲，正是「來日方長」哩。這是蘇維埃政權的脫去感情作用之一例證。今天是高

官，明天也許成爲階下囚，假如他對職務漫不經心的話。

一個年青智識份子，女醫生的兒子，把他的罪狀滿不在乎的告訴我。他曾在一合作社擔任重要職務，酒後在飯廳裏大鬧起來，因而被判徒刑一年半。他以爲這判決十分公正。「這真是，」他道：「如他們所說：『如果你想做文明人，必得規規矩矩。當然你不妨喝酒，但是要適可而止。喝醉了發脾氣，那末不客氣，請君入牢。在獄中你能考慮一下，決定再不故態復萌。』」

這囚犯說着德語，始終我們兩人單獨說話，我想即使他對他受的判決有任何不滿的話，他也會毫不遲疑的告訴我。我留心過許多人，覺得俄國的囚犯是能夠客觀地辨別他們被罰的性質和理由的。

紅軍的犯罪軍兵全體關在蘇可爾尼基。我曾進去和他們隨便談話，後來我要求些人跟我作個別詳談。

庫爾耐夫 (Kornev)，聰敏的十九歲的青年。他的父親是農人，他有兄弟姊妹六人。十二歲鄉

村小學畢業，他想升學，可是家裏不答應，因為離城市太遠，因此他假造了一封西伯利亞姑母要他去的信：「這孩子必須立刻動身，因為那中學校並不常有空額的。」他的父母並不起疑，於是立即讓他束裝就道了。他在路上四天四晚，行李給人偷去，但終於平安地到了姑母家，受到款待，而且進入中學。一切順利——直至那位姑母打算夏天去探望他的父母，問爲什麼叫這孩子單身走遠路，於是西洋鏡全部拆穿。

他住在鄂姆斯克（Omsk）直至一九二八年，考過伏爾克斯（Volks）航空學校四次。第五次上通過一切試驗，然而醫生說他神經不大健全。於是他預備投考軍校，不幸得很，他病了，等到起床，招生期已經過了。他非常懊惱，最後投軍當志願兵，希望能進軍校，然而又因病而錯過了考期。終於過一些時候，他錄取了，成績斐然，直至他重復害病。

同時他以前的同伴都升做長官了。這又使他煩惱，他請求離開軍校，因爲他學業優良，有的退學申請沒有邀准。他就此告假出來，乾脆不回學校，當了小學教員，娶了個女教員。一天他父親來信關照：警察要找他。他聽天由命，結果自然被捕。

「官員怎麼辦他們凶不凶？」我問。

「不，完全不。」他道：「問口供時候他們只說：幹麼你這麼做？現在要關你起來了。」

他是獄中的室長。我問他年紀輕，囚犯是否會不聽話。

「那與年齡毫無關係。」他說：「他們全體信服我。我是和殺人犯同住的；他們都偶然犯罪，並不難於管理。」

我遇見的人中沒有一個會對於紅軍的待遇口出怨言。紅軍的紀律不准士兵隨便卸責，不管這人對軍隊生活十分厭倦。如庫爾耐夫的情形，他的准予解職與否仍須視軍隊中是否不能缺少他以及他將來的工作是否靠得住而定。同樣地，工廠裏的幹練工人也不能隨便辭職，除非等幹部慎重考慮之後。鐵一樣黨的紀律約束着每個黨員，當然，那絕對管不着黨外的人民。

監獄音樂演奏會上，我注意到一個樂隊隊員，身材矮小的囚犯，眼光顯得非常頹喪。「他是殺人犯，坐在我旁邊的職員說：紅軍軍官，又是黨員；他殺了他的老婆，被判最長的年限——十年。」

幾天後我和萊波托夫，那矮小的囚犯攀談。他二十六歲。父親是沙皇軍隊的軍官。他孩提之時，一九一四年，母親死了。後來父親上前線，他被送入軍官學校。「他們極其殘酷，」他跟我說：「上級人員都是老軍官，對付我們非常粗暴，我們常因一點孩子氣而遭毒打。有一次我們戲弄一個以吝嗇著名的年老大佐。當他經過天井，我們把一袋錢繫了繩子從窗口拋下來。他彎腰去拾，我們立刻把繩子拉到他伸手夠不到的地方。結果呢，每人二十軍棍。而後來我們之中的一個企圖自殺，上吊了，幸而被我們在千鈞一髮之下割斷了繩救下來。我就決心逃走，和一個朋友預備到前線去。那時我只十二歲，仍給捉回學校。」

「革命爆發，學校解散。學生有親戚的就投奔親戚。我其時是十四歲，投入紅軍當一名學兵。我的身材還比現在小，所以爬行躲閃，都比成人容易。一九一九年我的頭部受重傷，躺在醫院裏九個月之久。他們都灰心了。醫生說：「必須開刀，不過死不死很難說。」出院之後，我在克里米亞陸軍大學耽了兩年，那兒倒不壞。我想多學習些，因此轉入莫斯科陸軍大學，此後在明斯克（Minsk）服務了一年，仍派駐在莫斯科。後來我厭倦軍隊生活的單調，打算往馬達工廠做工。」

「然而你是軍官，重新當工人，不麻煩麼？」我插嘴道。

「絕對不；我們全體都是工人。」這囚犯說道：「工人指導着這國家，工人製造法律；從前的布爾喬亞如果想當公民，必須聲明決計盡忠於工人階級。我雖然不明白別國的事情，只覺得這情形彷彿很自然，童年的狀況我記不起來了，這兒的改革實在太快。過後我又換了職業，投身警廳研究犯罪學。受了三個月訓練，就派到一個重要的職位。我得對付強盜、偷馬賊、殺人犯……」

「於是我殺掉我的老婆，」他頓一頓繼續說道：「我來把詳細情形告訴你。我在一九二八年結婚，那時我纔二十四歲，我的老婆三十八歲，我窮得厲害，她有一所美麗的宅子。我當時並不知道她的第二個丈夫是因爲耐不住她的纏繞而吊死的。她第一個丈夫是工程師，早就到外國去了。」

「我們同居直至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有時候簡直不能忍耐。她的妒忌幾乎致我死命。回家略遲一點，就要大發雷霆。如果電車脫了班，我竟必須要賣票員簽了字，纔能太平無事。她常以爲我跟年輕女人秘密來往，其實天曉得，我的工作忙得喘氣不轉，那裏還有工夫？我打算進高等技術學校，她竭力反對，說：「你有了好差使，就會離開我的。」我完全失望了，跟她說：「如果你爲難我到如此

地步我不得不跟你決裂了。」於是她尖聲大喊：「倘若真的這麼做我一定跟你到天邊一碰見你就挖掉你的眼烏珠。」

「你以為她竟會這樣做麼？」我問道。

「是的，我想她很可能辦得到的。唉，最後我熬不住了。一天例假日，我們郊外去玩。她為自己帶了伏特加，我喝黑葡萄酒。她半醉之後開始罵我了：『我占紙牌占到，說你一定愛上別人了。』隨後她要我退出黨籍，以減少工作。起初我竭力聲辯，然而不中用。我終於發怒而咒罵了她。抓住我的襯衫，把鈕扣都扯掉，我拉着她的披肩，愈絞愈緊，她的臉漸漸發青，終於暈過去。我突然轉個念頭：『難道我讓她磨折，直到老死麼？看來她永不會讓我自由了。』結果我開了鎗。

「回到家裏，我非常不安定。於是出門找朋友，但仍然不得舒服，只好回家。過一晚我有些很有興味的事幹，略為鎮靜一點了。家裏靜得像鬼屋子。我的老婆的親戚到鄉下去了，一星期內，沒有人問起她。他們一回來，就傳出她失蹤的消息。他們問警察局，為什麼她的丈夫不來報告。

「三個月後，她的屍首給些牧羊人發現了，面目模糊，只能從衣飾和口袋裏的護照辨認得出

是她屍首送到我辦事的地方，而且由我處理這案件。那真可怕。我沒有報告她的失蹤，當然立即在嫌疑之下，於是我承認一切，被判這最重罪十年，因為我又是黨員又是警務人員。」

「釋放之後你還能算黨員麼？」我問。

「說不定，也許我要從新當預備黨員。不過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僅僅是刑事犯，並非政治犯。」

在史凡爾特洛夫斯克的反省院裏，我經過一所大宿舍。囚犯們坐在板鋪上，細細地講述他們的罪案，來歷和希望。一個人酒醉中殺了他的同志，因而被判六年。

「我極情願他們判我十年，而不開除我黨籍，」他說。

開放門戶的監獄區

一 農業監獄

那區域名爲「五一」，廣五、〇〇〇英畝，其中二、五〇〇英畝是耕種地，二、〇〇〇英畝是森林和房屋之類，牧場佔五〇〇英畝。按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東西：黑麥、雀麥、小麥、番薯、蘿蔔、甜菜、蔬菜、紅蘿蔔和番茄。值得一看的地方很多，例如製磚場，廣大的農場本身以及苗圃。

我住在那裏共兩天。「你們農場中工作有沒有報酬？」我問指導員道。

「有的。兩年以前我們就得到紅旗獎，至今還沒有人奪去。」

「奪得紅旗難不難？」

「保持它卻更費勁。你要知道我們這兒纔只在三年前創辦起來的，而且我們這一省共有七

個大的國營農場，一百四十處合作農場，一律都緊張着每根神經來想這紅旗。我們的囚犯野心勃勃，都賽跑一般地工作着，不情願落後。」

「你們這區一共多少囚犯？」

「男的六百，女的三十。」

「你們所耕的地這一點點人夠不夠？收割的時候要外面招短工麼？」

「不，一切都由囚犯們自己動手。依照各人在農事方面的資格安排工作，有的在製磚場裏，有的從事林業，有的築路……」

「是否全做八小時工作？」

「夏季是十小時，他們如果高興多做兩小時，這兩小時的工資三倍計算。」

「工資怎麼樣？」

「那一時說不清楚。我等會兒給帳簿你瞧，那上面載得明白。工資看各人的生產率和工作的好壞而定。有幾個人只賺十五盧布，有些人能掙九十，甚至九十以上。」

「全體工資都用現金支付麼？」

「不用物品來代替。這樣比較適宜些，他們也完全滿足。工衣和襯衣也分發的。」

「那很合理，隔離監獄裏的囚犯的待遇沒有這樣好，我常看見他們之中很有衣衫襤褸的。」

「請你記住，蘇聯現在非常缺乏紡織品，因此好多人不得講究穿着。」

「鄰近村上的人們見到這兒的良好情形怎麼說？他們不會想做個自由人還不如當囚犯有趣麼？」

「決不會的。因為他們極不喜愛約束的。自由的勞工到他們工作的地方常每天打這兒經過。他們看見我們這兒像各處工廠一樣一切都井井有條，也看見囚犯們如何努力去提高生產量，他們也會在自己的環境之內力求完美。」

「你們雇多少職員？」

「三十五位……我看你似乎在奇怪人數太少。他們幾乎全是專家，他們指揮着各部份，分配着工作，教導着人們。囚犯之中也有突擊隊。我們的職員之中三分之二是從前的囚犯。他們工作得

力，熟悉這兒的一切情形，因此殺我們留下了。」

「沒有傾軋麼？囚犯們會聽這些以前也犯過罪的人的指揮麼？」

「當然。我們不咎已往；所關心的，只是他們目前的生產能力。舉個例，我的副手從前也進過監獄的。如今十分稱職。他曾經當過隔離監獄的副獄官。因跟囚徒們一塊兒喝酒，被判三年，執行了這判決的一半，提早釋放了。」

「而現在得到這麼一個重要位置！我詫異起來了。」

「幹麼？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勤勉。他是我們最可靠的公務員中之一。他知道用什麼方法對付囚犯，囚犯們也樂從他。爲了他作過一次錯事，我們就拋棄他麼？總之，聖人也難免無過失的。」我們且行且談，在走向養雞場的途中。我以爲養雞不大上算。我跟那指導員說，在德國，那些養雞場像朝生暮死的菌類一樣，他們養一時也許夠本，但漸漸的得不償失了，因爲飼料貴，而蛋和雞的買賣愈來愈少。」

「我們這兒養雞是值得一養的，因爲需要非常大。」指導員肯定的說道。

雞舍是最最近代化的。地板，雞架和雞籠都清潔非凡。管理的人員當然很明白成功的秘訣在乎餵食的小心和絕對的清潔。外面廣場上無數各種各色的雞羣在曬太陽。食斗和飲泉都用最新式設計。我覺得這些高價的東西似乎很難撈回本錢的，就表示着懷疑。

「不錯，」指導員說：「假如食斗雞籠之類向外國訂購，那自然貴得多了。它們全由我們囚犯自己製造的。冬天戶外的的工作不多，他們就忙於趕製或修理必要的器具。」

一個囚犯領我看美國式的人工孵卵器。許多小雞剛剛脫殼，然後分開了把毛衣烘乾。他說已經孵出的小雞在三千隻以上；他們常留三百隻母雞以備孵卵。食料是一種特殊的混合品，說是可以使母雞的產卵量增加，再攪些別的成分，能刺激小雞的生長速率。所以死亡率極低，寒冷阻礙發育的情形也不大發生，我竟沒有瞧見過在任何一羣中有垂翅低頭的病雞。從前在德國，他們預算當天氣變冷時，家禽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農人很難相信飼料，少許定量的水和絕對乾燥的房屋有多大的重要性。蘇俄亦復如是，人們是不容易使農民們相信科學化的農場有甚麼了不得，不過我敢於相信，像這種模範農場是很能夠影響於鄰近的農家的。

我們經過一個大池塘。巨大的有花紋的鴨子，有的坐在岸上，有的大搖大擺地在草地上踱方步。我不知道德國豢養禽獸的農夫，他們的場地僅僅是豆腐干那麼大，看到俄國的廣漠無垠的田畝將怎樣說。

牛去吃草了，牛棚空着。棚內站着些營養充足的小牛，伸長了頭頸似乎等人家撫摸。一個囚犯給牠們乳喝時，告訴我們牠們怎樣長大起來。爲了易於利用糞便當作肥料，牠們的厩舍並不進深，而陽溝極深。厩中共約牛五〇〇頭，博種的母牛五十頭，拉車的馬五十四，小馬二十四。養蜂者照看五十個蜂房。當然處處有人管理，這樣纔能做模範農場，能勝過別處，能使專家來參觀也少不了驚歎，在無論什麼時候。我表示喜歡這農場，那指導員自然樂意。「你簡直像在看展覽會吧！」他說：「囚犯們什麼事都有本領做成功。」

我問囚犯們有沒有受各項良好學識的教育的機會，出獄後他們也許能藉此謀生。

「我們造就開曳引機（用於農業的），畜牧、養蜂、養食禽、園藝等等的人材。徒刑期滿他們能立即找到位置。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專門工作出路非常好。」他道。

「那末囚犯們工餘之暇做些甚麼呢？」

「常有運動團體和戲劇團體。冬天受教育的鐘點多一點。夏天他們從事於農作已經夠忙了。」

「你們是否挑選特殊的囚犯？」

「是的。在這兒的囚犯都只判處兩三年徒刑的。如今只有八個比較判得長一點。他們都是偶然犯罪，因工作、口角以及失火之類鬧了亂子。有幾個犯盜用公款罪，然而全體都是生平第一次入獄。」

「那當然啦，對付這批人很容易。」我尋思了說：「他們簡直不能算犯人。現在我明白爲什麼你們這兒的生產情形這樣好。不滿在隔離監獄裏，而允許他們到這兒來工作，他們自然開心了。從教育觀點上着眼，我看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全個性溫和，沒有擾亂工作紀律的傾向。」

「那麼你錯了。」指導員說：「這些囚犯正因爲缺少紀律而犯了罪。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服從內部必要的紀律，可是實現起來頗不容易。他們有許多纔第一次知道爲公衆而作工的責任呢。」

「提早釋放怎麼個辦法？」

「直至如今，只有兩個人住滿原來判決的一半期限。其餘都很早就開釋了，因為他們工作努力，行為不越規。」

「有沒有逃走等情發生？」我問。

「有的。他們剛從隔離監獄來到這兒的頭幾天，常想請假出去，當我們礙難照准的時候，有些人就立即逃跑。第一回假如他們過一天就回來，並不深究。第二回得受同志法庭的審判；第三回再逃，須受拘留；第四回上可要送往隔離監獄了。可是這些案件難得發生的。」

「囚犯們有無不滿之處？」

「當然有的，不過也不多。我們的囚犯有控訴的自由權。同志法庭受理各種控訴，誣告則由文
化委員會解決，每個訴狀中總有些真理的。告發官吏的錯處的狀紙一定特別加以注意。有時在審訊之中會發現一位監督允許囚犯喝酒，或沒有把不上工的囚犯報告。」

「謊告多不多？」

「很少這種案件大致像這樣的：有人被派往別一組了，從前他只做些省力工作，但現在比較吃力了，然而其實他儘做得動。如果這惱了他，他就此有計劃地說該部負責職員的壞話。」

「方纔你說起酒，這兒是否也禁酒的麼？」

「當然。」

「有很深的酒癮的囚犯怎麼辦？」

「我不能說他們絕對戒絕，不過爲種種便利起見，他們會約束自己的。當他們因公進城或請假外出，喝了一點兒，然而回來的時候一定不會醉得神志昏迷，因爲他們很清楚，在這區域內，醉鬼是要驅逐出境的。」

「那末玩紙牌怎樣？隔離監獄裏那似乎很普遍的。」

「這兒的囚犯不見得對此有興趣，很難得有人玩。玩紙牌大概只在重罪的犯人中風行，他們習慣於賭博，在獄中祕密玩牌。」

「請假和探望是怎樣的？」我問。

「每年准許請假出外十四天。如果家裏的確需要他們幫忙農事，他們至多能夠回家三個月。每個例假日，他們能接待任何來賓，要多久就多久。」

「你們允許他們單獨地和探訪人在一塊，要多久就多久麼——特別是和妻子？我似乎覺得，在隔離監獄，成羣的探訪者和囚犯們在一間屋子裏說話不十分合理。」

「是的，城市中地方狹窄，而且幾百個囚犯在同日接待客人，屋子不夠也是沒辦法的事。可是我們這兒有樹林，儘他們逍遙了。此外，他們在例假日能夠到附近的村莊上去散散心。」

我和田裏工作的囚犯們隨便談心。指導員也叫幾個人來跟我談，並且給我案卷，必要時可作參考。一個少婦，當過電車賣票員，曾捏造一筆大帳款。現在她非當不快樂，因為她丈夫，一個工業學生，每月進帳只有一百五十盧布，不得不償還着欠款，她自己掙不多，不能獨力賠償，因此她丈夫幫着她忙。雖然案卷上載着她有一時會有計劃地吞用公款，她仍力辯那錢是別人偷去的，而無論如何與這筆錢有關的人們也必得受處分。她雖背離丈夫和孩子，對目前獄中的管家職務卻極其滿意。從那些囚犯的談吐中，我深悉他們毫無把光陰浪費的想頭。他們自誇着他們顯著的成就，熱心

於滿足求知的慾望，計劃着將來的生活。

囚犯們開釋之後，絕無犯過罪的烙印，就能夠享受各種蘇維埃生活的權利。雖然如此，倘若囚犯的家離獄太遠，生離的苦痛有時更甚於死別。我曾和一個家在鐵夫立斯的亞美尼亞人談過。他曾在莫斯科做暫時工作時私用公款。旁的犯人有人來探望，送來東西，他因此覺得難過，而切盼着釋放日子的到來。我答應他下月我往鐵夫立斯，當去探望他的妻子。公務員斷然地和我說，在可能範圍中，他們打算避免這種別離的痛苦，不把囚犯送得離家太遠。事實上常有囚犯告訴我，他們不准在本鄉執行判決。人們應該注意這些實情，雖然在這樣廣大的國土中，這些也真難於避免的。

次日我們參觀近旁的農場和公共住宅。車子馳過田間，到了一所大規模的「兒童之家」。那裏訓練着莫斯科的監獄公務員的孩子們。教養區本身出產各種食品，肉類尤其好。

晚上回寓所，指導員說起囚犯們預演一個劇本，就快開場了，我說我想去瞧瞧。

「不見得有趣的。他們排演的次數極少，還沒有排熟呢。」

「那正是我要去查看的理由。」

他們演習的很忙，我們到場一些也不擾亂他們。我見到一個異常嫵媚的少女，就問旁邊的職員她犯過什麼罪。

「殺戮嬰兒，」他道。

「這可能麼？在蘇俄殺戮嬰兒！你們恐怕沒有禁止墮胎的法律吧。」

「她是例外情形，她什麼都不在乎，生出孩子就弄死，此番是第二次了。普通懷孕的女人是需要墮胎，須由醫師委員會核定。如做母親的身子好，經濟情形不壞，必得忍受生育的苦痛。私生兒和普通兒童有同樣的法律地位，做母親的產前產後一切由公家照料。我們想革除墮胎，因為它有礙健康，到處有墮胎之害的宣傳運動。如果有人和庸醫商量墮胎，告發之後，懷胎的女人並不治罪，而打胎的醫生須受判決。這個少女第一次殺害嬰兒時被救緩刑，今番可判處三年徒刑了。」

預演繼續着。有些囚犯起的角色尚未純熟，重新演習。最後他們合唱，其中一兩支有名的曲子，唱得簡直動人。於是開始跳舞。拉手風琴的坐在一旁使勁奏着俄國舞曲。有一個囚犯舞得出神入

化，他的對手也不弱。那拉手風琴的人狂喜地欣賞着他的音樂所刺激起來的舞蹈；忘其所以，絕不注意在他四周的人們。當時又有一大批人來了。觀眾中也有囚犯，也有些村農。

我們從場中出來，月光瑩潔，片刻以前滿眼歌舞歡樂，此刻走道之類，都浸在死一樣的沉寂之中，只剩守衛的囚犯懶懶地來往踱着。

二 靠近鐵路的監獄

「克爾有可伐（Krjukova）」車僮喊道。火車停了。我於是下車，遍找接我往教養區的車子。我向車站職員打聽，他做了個手勢：「是橫過這兒的一批屋子，一直過去就是。」

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開放監獄竟緊靠車站！他們怎麼會作這樣的打算，莫非瘋了？一切工作決計不能進行的，除非每個囚犯身旁守着一個監督。所以我碰見指導員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的囚犯不會搭上火車逃走麼？」

他微笑着：「並不如你所想那樣壞。爲節省運費起見，我們的製磚場靠近車站。磚頭因此可以

直接裝上貨車。」

「囚犯們有時也把自己裝進去的麼？」

「不必的。他們跟平常人一樣，穿的是普通衣服，他們要走儘不妨趁客車走。」

「你們怎樣防備他們逃走呢？依我看，似乎沒有旁的辦法，除掉嚴厲的懲罰。」

「那是這麼辦的：囚犯如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回來不算逃走。二十四小時以上就作逃遁論，不管他是否親自投案，第一次犯扣除一個月工資；第二次短期隔離，在晚上和工作以外的時間內把他拘留起來，或更嚴厲一點，非特監禁，而且不准做工。不過這些嚴厲的懲罰我們只用來對付逃亡或醉酒的人們。」

我們經過那巨大的製磚場。人們在壓榨機旁工作，把磚頭送進大爐子，搬運上貨車。至少近乎一千二百人在專心工作，沒有一個閒着。製磚工場依我看來似乎太熱，着實沒有農場舒服。在田間工作並不單調，四季變化，生活也跟着換花樣：耕、下種、耘、割乾草、收穫穀物、培養山蕨……而且還能畜牧或從事於森林事業。可是在這兒，一天復一天，永遠是磚頭，磚頭，磚頭。

「這似乎不很公平吧，別處教養區的生活遠比這兒不單調。」我問指導員道。

他驚奇地看着我。「這是絕對必須的工作，」他說：「而且生產的標準很高。我想那不會老是這樣的。當我們九年以前草創的時候，一切並不順利。我們不得不雇半數的自由工人，以樹立榜樣，激勵不喜工作的囚犯們。那時我們有六十位監督員，然而如今十二個就夠了，明年我們希望只用四個人。」

一個監督管三百囚犯。那似乎有些難使人相信的。我問指導員這計劃究竟有否實施的可能。「靠政治訓練，」他說道：「我們有一個政治教育的小組織，包括教導員一人，自由的助理三人和囚犯充當的助理十六人。每個新來的囚犯都被循循善誘，使他明白工作努力是他自己的利益，能縮短監禁的期限，同時又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大家工作，大家盡責，則什麼事都行。」

「嘿！無疑的，單只熱誠不能支持工作於永久。」

「恰恰相反。瞧瞧周圍，你看五年計劃為什麼會成功的。爲了什麼熱誠。我們這兒也同樣情形。突擊隊，競賽，分工合作，這些全使工廠生氣勃勃。生產是有計劃的，工作是分配好的，囚犯們變得堅

強了，大家不願落後。」

宿舍太擠，有一間緊緊地安放着一百二十張床。有些剛下工的囚犯和衣躺着，有的蒙被而睡，避免蒼蠅。壁上掛有條告：「第一誡：要看書的人們，須謹慎選擇書本。第二誡：利用書本作你工作的工具。」

「你瞧，」指導員道：「佈置簡陋。一間屋裏睡的囚犯太多了。但是他們空暇時候的環境好得多。你想去看看麼？」

我們跨過鐵道，約莫十分鐘之後走近一個四面都是松樹的湖。囚犯們在洗澡，湖畔草地上曬太陽和看書。無數水百合浮在湖面上。我走過去想摘一球。「當然，」指導員說：「他們非常願意替你採——但請你別再走過去了。俄國習慣男人洗澡不常和女子在一塊兒的，和歐洲大不相同。」我們在草地上坐了一會兒，看他們游泳。我把一束水百合放在身旁，花朵太小，但那深而黃色的花萼非常美麗。一對野鴨給一位白鬍子老人嚇着，抖抖翅膀從蘆葦中飛了出來。

我問起囚犯們的年齡指導員道：「最小的十九歲，最大的五十五歲。」

「比較老一點的耐得住勞苦工作麼？」

「我們派他們當守衛，收拾院子或擔任別的輕鬆的職務。有許多老傢伙還很能做工，那邊游水很上勁的那一個也是極出力的工人，在夏天他常常下了班就來洗澡。」

「這兒吃的東西怎麼樣？我常常嚐獄中食品，覺得很單調，老是蔬菜湯加幾塊牛肉和稀羹之類。味兒並不壞，可是天天不得不吃同一東西，我想一定不舒服的。」

「我們獄中的食物跟外邊的一樣。俄國人吃東西不喜歡翻花樣；寧可把吃熟的菜每天吃。這兒的囚犯每天有八百格蘭姆黑麵包，二百格蘭姆白麵包，菜湯，菌類，魚羹，麥粉和烘山藷。現在我們每人每月發一千格蘭姆糖。從前囚犯只能用他的工錢買糖食吃。不久以前鬧糖食恐慌，但如今煙葉和香煙都有了。」

囚犯們在輝煌的俱樂部裏開生產問題討論會。我聽了一忽兒，等他們休息時候問我的鄰座

道：「你們對於各種會社和公共工作的興趣爲什麼這樣大？」

「因爲我們自己能夠管理這些。假如一個同志簽名加入，後來忽然不到會了，第一次，我們責備他。第二次，再無故缺席，他得受警告。第三次，就乾脆開除會籍。那情形不大會發生，因爲我們自傲於自己的教育程度，也確乎關心於會務。」

「競賽和別的增加生產的力量是用什麼方法來引起的？」

「上星期有六十個人得到獎金。但是你不要以爲這兒沒有懶惰的人……」

「請你告訴我這些囚犯究竟犯些什麼罪。你能給我一張正確的名單麼？」

「自然可以。我就去關照公事房。除掉少數例外，此地的囚犯至多是判處三年的。大都不滿期就釋放了。」

我臨動身的時候名單已經預備好了。照抄如下：

囚犯類別表

—克甫有可伐工作區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一六九章	舞弊	五八人
第一一六章	吞用公家所有物	二五人
第一七五章	破壞私人所有物	七人
第七九章	故意傷損公家所有物	一四人
第一〇九章	公務員行施不當威權	三六人
第一一一章	怠忽公務	二二六人
第六一章	抗納或被勸抗拒捐稅	一四二人
第六〇章	隱吞稅款	二六人
第九五章	懲警	四人
第一一三章	行政人員不信高級長官	五人
第一一七章	行賄	六人
第一一八章	受賄	七人
第一一〇章	行使威權逾分	三人

開放門戶的監獄區

第一一二章	怠誤公務因而發生嚴重後果	三人
第一二〇章	偽造文書	七人
第一六八章	不貼印花稅	四人
第一〇七章	投機事業	二人
第一六二章	偷竊	一一一人
第一六六章	竊馬	五人
第一四六章	收受贓械	二人
第七四章	嚴重匪行	一〇一人
第一九三章	犯軍法	一三人
第七三章	激烈反對國家代表	三〇人
第一三六章	動機不純之謀殺	四三人
第一六五章	搶劫	一四人
第一三九章	殺人	三人
第一三七章	誤殺人	二人

第一四三章	傷人身體情節輕者	五人
第一四二章	傷人身體情節重者	四四人
第一五一章	與未成熟異性舉行性交	五人
第一五二章	以不端行為施諸兒童	三人
第一五三章	強姦	一七人
第一四〇章	代婦人打胎因而發生意外	四人
第一九七章	硬要與一婦人結婚	一人
共		一、二一七人

他們不願我參觀的一個監獄

我知道從史凡爾特洛夫斯克 (Sverdlovsk) 過去一天路程可以到忒尤門 (Tjumen) 就只那邊的一個西伯利亞式的監獄我易於進去的，因此我在烏拉爾山脈一帶的旅程完畢之後，急切想去看一看。在莫斯科人民司法委員會時，他們對我的熱心想去忒尤門似乎有些奇怪，勸我去參觀別的監獄。然而我固執要去。後來不久開全蘇俄監獄官大會，我被邀列席，會議過後我和烏拉爾區人民司法委員會主席商量我參觀的日程。我說我想往忒尤門，他搖搖頭：「你幹麼去那邊？無可看。」當我到了史凡爾特洛夫斯克，他們不但勸阻我，而且坦白地說：「那是一個可怕黑暗的監獄，極其淒涼而不舒服。」這樣之後我的要去之心反而更堅強了。

終於他們讓我去，派一個年青公務員當我的嚮導。沒有他的幫助，我買票還得等許多工夫，因為那經過忒尤門的往來遠東的車輛老是擁擠不堪，如果一個人只等了兩天買到票子，就有些近

乎奇迹了。烏拉爾一帶電報也好像不依常規的，因此我們不能先期通知他們。

我急於知道那黑暗簡陋的監獄的情狀，如果比史凡爾特洛夫斯克隔離監獄的舊的部份更壞，那麼真的有些怕人了。所以，當我們在車站打了電話即刻就有一個面露喜色的囚犯開着汽車來迎接我們的時候，我大喫一驚。然而更奇怪的，是那囚犯絕不向左右看，彷彿坐在陰慘的土牢中。在我慣於坐囚犯們開的汽車之前，我常常愕然，以為怎麼可以拿這樣貴重的汽車託付囚徒呢？官員們不能了解我注意這些的緣故，其實也正自然，會開汽車的囚犯，獄中自然因該雇用的；而況他沒有必要的車照等等，也不能隨便把車子賣掉的。在史凡爾特洛夫斯克和潘姆所有監獄公用車輛的駕駛人全由囚犯充當。因此我對於在忒尤門囚犯開車這一點上倒並不驚奇。忒尤門是一個潔淨的六萬人的小城，空氣異常清新。據說冬季更好，也不冷，去年冬天就只列氏四十度。

那年輕的監獄指導員招待我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參觀者顯得非常興奮。莫斯科人決不會到忒尤門，何況外國人呢？有攝影記者等在旅館裏替我拍照，以點綴本地報紙的篇幅。主筆先生也來拜訪，記下我所談的一切。到明天報上全發表了。我走在街上，有兩個女人窗裏探出頭來指着我大

驚小怪。我跟她們去攀談，等了好久好久她們打扮漂亮之後，把快鏡在門前替她們照了幾個像。這在她們是冒險的英雄事業了。

忒尤門就是如此。但是監獄怎樣呢？第一件事情我注意到的是指導員一團和氣而發亮的臉色，其他職員亦然如此。

「哦哦，現在，」我說：「請你領我去看看這陰慘的土牢吧！」

他笑着道：「以前差不多是這樣的，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換了樣子很久了，這消息竟還沒有到史凡爾特洛夫斯克。」

我走遍監獄，張望各處。廣闊的公用屋子裏一壁是巨大的窗子。另一面可以看得見以前的囚室的柵欄窗。犯人們竟大都毫無愁容，使我惶惑起來了。這所監獄是隔離獄，同時又是遣戍西伯利亞的囚徒的暫時羈押所。不管教育工作如何努力，不管自治運動如何深入，在隔離監獄裏總可以找到幾隻感到幽禁痛苦的哭喪臉的。也許忒尤門的囚犯的絕不頹喪和那出奇地新鮮而溫和的空氣不無關係吧。我看到病房裏幾乎沒有病人，這一點似乎可以證實的。

忒尤門監共有囚犯七六二人，不過因為同時是羈押所，人數天天有上落，只有兼當職員的囚犯留着不動。文盲約二十人，欠缺教育的五十人，那很費這麼小的一個監獄中的文化部的手腳。對於將解往別處的囚徒，只不過喚起他們的工作興趣，使到別的監獄中不惰懶而已。但文化部的目標始終不變：囚犯們在離獄之前必得學會看書寫字，大多教文盲盡力着求書本知識，因為勤學能夠提早開釋。

獄中祇二二人是已經判決的；其餘都在候審；被判搶劫和結黨為匪者二人，性慾罪一六人，謀殺、殺人和毆鬪罪三八人，行為不端罪一二人，縱火罪三七人，竊取家畜罪三二人，侵吞公款罪四〇人，偷竊罪一四人。被判三年者一九四人，五年者九人，八年者四人，七年者三人，四年十年者各一人。囚犯年齡最小十八歲，最大六十五歲。年老的囚犯管看些畜舍菜園之類，據說他們特別適宜於當守衛，因為他們只需要極短時間的睡眠。獄中有各種工場和一個規模不小的木工廠。木料從尼許尼拖拉運來，製成碗櫥、檯子以及其他本地有用的器具。

囚犯們告訴我，他們自己之中有文化和政治訓練的組織，有突擊隊，壁報和一個學術團體。

部人員共五十六人，多得使我詫異，他們跟我說不得不然。因為羈押所和監禁固定囚犯的監獄性質不同，確乎需要大批人手。

我問臭蟲多不多。「沒有，絕對沒有，這兒很乾淨的。」一個囚犯說道。

「我倒想在你們監獄裏過夜，」我嘆口氣道：「客棧裏簡直咬得睡不着。」

難馴和落伍的人們

在蘇可爾尼基獄中我曾和奴曼洛特英維耶 (Numerod Invia) 作長談。他二十二歲，父母從波斯搬來的，遠祖是古代亞西利亞人 (Assyrians) 他八歲起就偷東西，難得給攔住。他說他那時很不幸。他有讀書的願望，然而父母親完全不了解他。他們是目不識丁的商人，據他說，簡直不知天地爲何物。

奴曼洛特在家裏很苦惱。他怨恨家裏不讓他讀書，八歲時候逃出來了。他立刻變成赤條條的流浪孩子。在橋洞或牆角裏過夜。當時乞丐們常租了牆角睡覺，冷而黑的屋角最便宜，暖和的次之。亮而暖的屋角租錢頂貴。他不情願在這情形之下過活，於是練習扒手，很能生財有道。

「一個人幹這種事決計幹不好，」他道：「我們至少三個人一夥，那纔不至於給捉住。我們專剪開人家的衣袋，有時挖而不剪，看局勢。有一回我一天之內弄到一千盧布以上。可是錢去得也快。」

晚上我們慣於上大藥館開藥。第一次進監牢在十一歲的時候，那時我就立志始終做一個犯罪的大了。」

我問他是否從來沒有做過工。沒有，他從來不做工；幹麼不呢？說是工錢決不夠開銷。十一歲上他染上了哥加因，鴉片和嗎啡的嗜好。「你賺的錢決不夠買這些藥料。」他道：「而且一上了癮就放不下。噢哥加因真的舒服。抽了鴉片，你能瞧見多麼可愛的幻景啊，而且忘卻一切！嗎啡能叫你清醒而陶醉！我初到這裏十分難過，出獄之後打算仍舊去滿足老脾氣。我不能做甚麼事。那是我過慣的唯一的的生活方式。」

他的手上刺了顏色。一隻手上一根鐵錘，還有一隻手上是：「人生無歡樂。」

「你以為我只十九歲，就容易馴伏麼？」那文雅嬌好的米湯雅克魯格洛伐 (Mitanga Krug) 說着：「我何必說謊呢？告訴你事實，然後你去想你的吧。」

她詳細敘述她的童年狀況：父母待她不壞，兄弟姊妹六人，都是她所愛的，而且在學校裏

她是好學生之一，她的生活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直到十六歲上遇見一個黑皮膚的美貌青年，愛上了他。她的母親不喜歡他，他送米湯雅貴重的禮物，她忿忿地退還給他。

有一晚一個賊穿入天井，她怒不可遏，催促她的愛人趕出去割掉他的頭，她的愛人驚異地望着她道：「我就像那樣。我是一個賊。然而你還愛我呢。」於是沒等她開口，他走了，四個月不來近她身。同時她對於她的情人是賊漸漸不以爲奇了，當他回來，她的舉動好像沒有那回事。他們倆一塊兒往奧特沙（Odessa），那裏匪黨共九個男人，三個女人，計劃着晚上去劫銀行。但是他們沒有弄死守夜人，給他爬出來報警。於是四輛警車趕到出事地點。米湯雅的朋友開鎗擊倒兩個警察，逃走時候也終於被擊斃。米湯雅看守寓所，並沒有參與這件劫案。

這番經歷使她很受刺激。她不願回到她母親那兒，耽擱在新朋友們的賊巢裏。後來認得了另一個賊，就和他同居。爲了耐不住無所事事，她進入工人學校和工業專門學校，打算做個合格的工人。她覺得工作不容易，而讀書不難。那時賺九十盧布一月。「如果我和母親住，這點錢是夠的；可是我和他生活在一起，吃的東西講究，尤其是酒喝得很多。我已經習慣了偷竊，再不作什麼考慮了。」

知道，這事進步得很快。我只和同伴們一齊幹事，從沒有單槍獨馬出去，因此除坐過幾天看守所之外，我從未被捕。」

她會和另一個女孩賭東道，說她能夠偷一支兵營裏的旋輪手槍，小心嘗試了好幾次，她果然成功了。她的朋友們拿這手槍給一個小店的掌櫃看了，就起人疑心而被捕。那跟米湯雅賭東道的少女也給帶走。米湯雅本人給帶入看守所，但後來竟宣判無罪。

「但是那手槍是你偷的！」我說道：「沒有查出麼？你這樣老實地告訴我，不怕什麼麼？」

「倘然我不在獄裏，當然不直說，可是現在怕甚麼？」她道。

母親寄一個包裹到看守所，使她深深感激。她馬上覆信道：「別害怕，我就還家。」後來她守着信用，從朋友那裏脫身回家。

「我可再受不了毫無風波的生活。我知道那是自己的錯處，並不怪怨任何人。我過慣了舒服日子，不得不重入匪黨。後來我親眼看見他們殺死一個人，那可怕的景象嚇得我幾乎發瘋。我就逃到共產黨青年團懇求他們給我一個安身之所，他們領我住公共宿舍，而且進廠工作。」

「於是定心一時，不過碰見了老同伴，還是要偷竊的，特別是酒後，最後我脫離工廠了。因為賺的錢不夠滿足我的慾望。我是個得力工人，他們挽留我，設法優待我，使我和母親重新住在一塊；但我那時和一個賊骨頭同居着，沒有人曉得我睡的地方。」

然而青年團偵出米湯雅的寓所，把她和她的朋友捉住，想送她往娼妓們的檢驗所，她於是決定回到她母親身邊了。過了不久，她和一个誠實的青年結婚。「然而初戀才是真的愛情。」米湯雅在紙片上亂劃着數目字，沉思着說道：「我感激我的丈夫，也尊敬他像一個男人——但決不可能像從前愛別人那樣愛他。」

這樣太平平過了八個月。她在廠裏努力做工，不大想起舊日的的生活。有一天她在街上忽然遇見一個關了五年而越獄的老相識，她跟他說她已經結婚而和丈夫同居着。但他不關心這些，只要求她再入伙，她拒絕了，他恐嚇着要殺掉她和她的丈夫。

回到家裏她跟丈夫並不說起什麼。幾天之後，她放工出來一個匪徒緊釘着她，要她立刻跟他走。她說她能夠，不過只是在飯館裏停留一會兒而已。想不到一進飯館，許多舊相識熱烈地歡迎她，

弄得她不想走，直至早晨四點鐘。她和丈夫只說是在工廠同志家過的夜。之後她四天不去上工，恐怕匪徒埋伏在那裏候着她。最後她向丈夫直說一切。她料來要受責罵，她丈夫卻只勸她留在家裏，別再出外遭麻煩，使她十分慚愧。兩星期後她又街上碰見那個匪伴稱他爲「狼腳色」的傢伙。他把她惡打一頓，關她起來，一星期不放她出去。

「那時我決定和他住在一起了。」她說：「金錢和奢華又把我勾上。他給我珍奇的食品，最上等的酒和許多美麗的衣服。在家我們只有生活上最低限度的必需東西而已，現在我一切全能講究了；又可以上戲園子，和老朋友們圍坐着喝酒。後來聽說我的丈夫因爲我的離家變得完全消極，醉酒而不做工。我比較上還是回家爲妙，我已經又享受夠了懶惰的生活——但那「狼腳色」老叫人看守着我。他出門，門就給鎖上。

「我們坐吃山空，夥計們打算幹一個著名有錢的私商。我當時不明白他們的意思就是殺掉他，跟他們一塊兒去了。我拿着支不靈的女用小手槍，爬進窗牖，開了門，其時那老人正睡着。我嚇醒了他，拔出手槍要他錢。他不給我，反而奔到街上狂喊救命。別的夥計守在外邊，就此「幹」了他。

「我們全體被捕，我是十年。我明白假使拚命工作而守規矩，我能早一點開釋。然而將來的事我不能說。我在這兒做工，正如我以前在廠裏一樣，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抵抗引誘的力量，如果它竟來的話……」

烏拉爾有一個監獄專關入獄數次的人，低能和難馴的人和妨礙工作而給同獄囚犯以壞影響因而難於在普通隔離監獄存身的人。那所監獄外國人從來沒到過。我在參觀之前打聽了好幾次。是在烏拉爾山脈中間。烏拉爾區的副刑庭長勸我不必去。「只有一列慢車通那邊，」他說：「而且，在晚上，一共要走十二小時極端不舒服。到站上來接你的是沒有彈簧的木車子，道路峻險。到達那監獄還得兩個鐘頭。」可是他嚇不退我，我們就搭車從史凡爾特洛夫斯克向北，經過無邊的赤楊和烏拉爾山脈長綠的森林而達尼許尼拖拉。

那巨大而古老的監獄建築靠近拖拉，闊得非常不自然，蜿蜒在森林之中。伐下的樹幹鋸成木板，用木排裝着往河的下流運。監獄中有鋸木場，大的木工廠，金工廠以及各種小工場。我參觀了光

線充足房屋不壞的工廠，暗而擠的宿舍和暗黑更甚的教室。不識字的人們坐在一間沒有窗不通空氣的屋子裏，光線只能從隔壁一間的窗子裏進來。別的教室也是小而擠。我注意囚犯的神色，覺得除看上去似乎變態的之外，其餘也全是愚魯、沒精打彩、漠不關心的。我記起了在史凡爾特洛夫、斯克時烏拉爾刑庭長說的話：「你不能猜想被送到尼許尼拖拉的人是怎樣的。有的撕裂自己的衣服；有的患盜竊狂，搭得上手的東西全要偷。很多重犯關紙牌，沒有牌賭，他們就拿火柴來代替。近來進步一點，不過總是討厭的工作。」

尼許尼拖拉的獄官已任職五年，年紀光景三十五歲。從他的和犯人談話的神情，對每個人的關心以及謹慎地答覆大小問題，我們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忠於職守的。他愛工作，因為工作困難。他喜歡從犯罪意識形態的重圍中搭救一個個的可憐傢伙。

那是極困難的工作，比蘇聯任何獄務都難，因為高加索、烏克蘭和蘇俄的最難辦的案件全送到尼許尼拖拉來。我去參觀的時候共計囚犯一、八一六人。他們大都從前犯過不少次罪，一自由，始終生活在匪羣之中。案情重大的盜竊案居多，有的獨自幹的，有的合夥幹的。他們之中有些徒刑

年限不長，恐將繼續關下去，以免他們出獄後又與老夥計爲伍而圖謀不軌。

尼許尼拖拉囚徒的分配情形不能令人滿意。共產黨秘書泊切乞夫在他的演詞中特別指出老少囚犯一古腦兒關在同一監獄中的不合理，他的話完全對的。尼許尼拖拉囚犯在十六歲、十八歲之間的共一九二人，十八歲二十四歲之間七六九人，二十四歲五十六歲之間的八五五人，全混住在一起。其實他們並未真的罪惡滔天而無法處置的，犯罪的傾向乃是不良的環境使然。即使人們不相信所謂「罪犯天生」，他也不能否認年幼的酒鬼應由遺傳負責，而生就的低能兒是無力抵抗外界的引誘的。在這樣可驚數目的囚犯之中實施教育工作確乎大成問題。不僅如此，該地的氣候也惡劣不堪。療養室裏擠滿着人。據獄官說那驟升驟降的大陸性溫度常易使人出毛病，尤其是南方來的犯人。

我參觀過的監獄之中，要算尼許尼拖拉最不合人道，房屋最壞了，但另一方面看，工作卻非常順利地進行着。四七六人從事木工，四二人伐木，六三人管搬運，四〇人撐木排，金工廠共四一人，建築事業四五人，一五〇人當造房子工匠，一八人在電氣間，二〇人是鞋匠和裁縫，七人在磨坊，五

四人供職於製磚場，一七人管牛奶棚，一五〇人從事於農業工作，其餘的或者是候審犯，或服務於療養室，或請假出去了。囚犯的平均工資是三十二盧布，最懶惰的人大約只賺十二盧布，百分之五十扣作伙食。工資的四分之三發給囚犯，其餘一份替他儲蓄。（在俄國很難把各處工資來作比較的，因為生活程度各處有差別，譬如高加索的工資較大，然而那地的食物也似乎貴。）尼許尼拖拉囚犯們每天的麵包量很大；俄國人吃麵包和麥粉的本領特大，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番薯也不常吃的。食物的供給很豐富，然而也有人的家裏還要送麵包來。木工每天發給麵包八〇〇格蘭姆，較勞苦的工人一、二〇〇格蘭姆。

尼許尼拖拉的囚犯很有點煩惱。那監獄官主張將各人的行爲、興趣以及活動時時作成報告。這項工作由六個監督員擔任，每人管一組，而訓導犯人的成功與否全視他是否具有始終如一的恆心。獄官這樣說，然而我想起了當我巡行獄中時囚犯們冷淡而漠不關心的臉，也想起了一個職員曾和我說過：有許多監督員不大有耐性，常會極度地懷疑他們的工作的價值的。

謬誤是難免的。傍晚時候我跟一個看木棚子的姓伏格達諾夫的囚犯談。雖然他因怠誤工作

被判徒刑十年，公務員們卻看得起他。我疑心他一定有過大錯處，要不然怎麼會受到最厲害的處分。我的印像之中他是一個狡滑的騙子，我可以保險他的什麼熱心於新刑罰制度的工作的話全是吹牛。我在俄國不大碰到諂媚的囚犯。他們大都非常坦白，當着公務員面有逾分的勇氣，決不卑躬屈節拍馬屁的。而伏格達諾夫是一個例外。爲了好奇我約他明天作長談，想聽聽他究竟說些甚麼。

到明天他來了，坐在我前面，服裝整潔，告訴我說他從前是克里米亞一個大工廠裏的重要工人，而且又是一個中央食料分配處的經理。人家發現他的屬下一個合作社把食物擡高價格私售出去。他說他的罪名是爲了貿然把食料供給過度。此案涉及五十七個人，他是經理，當然應該負責。他只怪怨自己不好，雖然錯處卻不在他身上。他以爲他的六年徒刑是罪所應得的，因此不再上訴了。但是有幾個與此案有關的受到更重的處分，不甘服，要求把他的情節重行審查，於是他的徒刑就變成十年了。

我一下子就不相信這些。單只爲同伴嫉妬，決不可能就此加重判決的。我去看案卷，故事竟全

然不同。事實上他曾私售一〇、〇〇〇磅麵粉和一二〇噸食油，賣麵粉他把一、二五〇盧布飽入私囊，賣油二、〇〇〇盧布。並沒有什麼先是六年後來增加的事，倒是一開頭就判了十年。

幾個我約他們談談的囚犯正等在大廳裏。烏羅索夫，三十四歲，曾以竊盜和不端行為入獄四次，以前是白軍軍官。他在獄中有比較靠得住的職位，常獨自而沒人看守着率領了二百人往林間散步，在他領導之下從沒有囚徒逃跑的。他只執行着一年半的輕罪，也不抱怨命運。那十七歲的伊凡諾夫屬於相反的类型。一張板生生的臉，圓顛光頭，下顎頑固地突出。他因家裏沒得吃，流浪了十年，靠偷竊活命。那時候日子不怎麼壞，」他說道：「捉進去至多吃六個月官司，但如今一關就是兩三年，所以如果不停止偷竊的話，一個人一生一世只好全在獄中消磨掉。」

他想出獄後走入正路。然而沒有這樣容易呢？無家可歸和不安定的幼年已經遷移了他的本性，雖則他對漂泊生活並無多大興趣。他打算將來做正當工作，但他還不能確定能否守着此志始終不渝，也不知道別人能否信任他。

聽說俄國的盜賊只會用單簡的方法，西歐的穿窬專家慣用的摩登傢具他們還不知道。一位公安局的警官曾淋漓盡致地把個中情形描述給我聽過。

他們常挑選街角的店舖子幹事。事前先審察地勢，試驗鎖鑰。當店門鎖閉而門外有看守人，看守人總有一刻要睡着或幹其他什麼的。竊賊就先丟一個煙頭到他身上，試試他是否睡着了。如果沒有睡去，當然要破口大罵的。老資格的賊就是守門的醒着也不在乎。他們等他立起來轉身踱方步的時候，其中之一悄悄的從門旁走過，而用百合鑰把鎖開了；然後都避開，等守門人再踱方步。守門人一轉背，其中之一帶了一只袋溜進門去，而另一人迅速地在後面把門關好。袋子裝滿之後，在房子裏面的傢伙小心地爬近門口，不讓外面的人聽見，在玻璃上黏一小片紙。同夥的見到了這暗號，等守門人再轉背的當兒，立刻敲門，於是大袋賊賊隨即丟出來。可能的話，那同夥的去跟守門人借光一根火柴，和他搭訕幾句，一方面街角候着的車子早把賊和賊賊一起截走了。但假如守門人在他們裝運好之前或車子尚未開到之前忽而回轉身來，他們也會若無其事地等候在原來地

方的，因為大門緊閉而且鎖着，不大會引起守門人的疑心。就在他的眼前，他們帶了贓物去搭電車了。

偷盜的事在中午休息，職員們都不在屋的時候更來得簡便。他們可以大模大樣地坐汽車來，用百合鑰開了門，然後把東西運走，誰也不會猜想這是竊案。但是，在莫斯科，偷竊容易，處置贓物卻難乎其難。普通的方法是把它混入貨車；但作這種企圖的竊賊大致是要被捕的。

梭可洛夫，在尼許尼拖拉的囚犯，就是此中之一。他三十歲，曾入獄八次，可以歸入聰敏而有主張的囚犯一類，這類人意志堅強，所以也就有力量改變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受過不少苦楚。一九一四年他的父親參戰去了，遺下他，他的不宜做工的母親和弟弟妹妹在家裏。窮困可怕的家庭生活使他異常沮喪。因此他入了賊幫。起初做扒手，後來專在火車上偷東西。一九一九年他十六歲上第一次進監獄，認識了些年長盜賊，他們教給他全副本領。

一九二四那年他和同黨幹了一件大劫案，他分到七千金盧布。於是他想永遠洗手不幹，開始新生活，進入工業專門學校。進學校可不是容易事。當時招生的額子少而甄別非常之嚴。每個人要

報告自己過去的生活。梭可洛夫這點辦不到，因為他是從未工作而且專門偷竊的。他把一切向一個學生直說，那學生答應盡力幫他忙，但結果竟沒有什麼。

梭可洛夫怎麼辦呢？他不願當一名普通的不熟練工人，於是乾脆繼續幹他的本行。其時他已經結婚了。他的妻子明白他的過去生活，知道他故態復萌了，就想法勸他，可是他聽不聽，重新墮落是容易的。一九二七年他又被捕，判處徒刑十八月。過了一月他就逃出來。

「這事這兒沒有人知道，」他跟我道：「即使曉得也沒關係的。如果一個人努力工作，顯示着自新的決心，他的舊罪名是不計較的。這很公平，否則你還得執行過去的判決，你豈不會氣餒麼？」

總之，他現在是工作辛勤而得獎章的一〇五人中之一。他每月只賺十五至二十盧布，因為修習學業的人每天只做四小時工，其餘的時候上課；然而他對金錢的態度似乎變更了，他的生活也全然換了一個方向。我問他能不能給別人以好影響。他答道：「難得很。老賊當我奸細。他們以為我現在是被官方收買了。不過，逐漸地有決心的人多起來了。我常跟同志說：『來跟我們一起我們開心得多。試試看，只試一回，來和我們一塊兒工作。那末當你出獄的時候，懂些東西，不怕沒飯吃了。』」

已經有幾個人給我勸轉。你要知道，我們這兒落後的人這麼多，都是旁的監獄沒辦法而送來的，因
此一切都難辦。這兒也有賭鬼。有一時賭風極盛，如今同志法庭管得嚴，好一點。」

「囚犯常把什麼東西全可以當賭注，是否真有其事？」我問梭可洛夫：「我聽見過一樁可怕
的故事，說是前幾年一個浪子給斬掉一只手，因為他輸掉的。」

梭可洛夫點頭道：「那十分可能。我就親眼看見過一個囚犯輸掉四只手指。他賭牌欠了錢，說
他的女朋友在接見日一定來還清的，不來的話，他一定斫掉自己四個手指。那女孩沒有來，於是
他就到機器刀下割斷了四只指頭，用紙包好給那贏錢的人。」

我戰慄了。依照囚犯自尊的通例，信用必須保守——不管它近乎癡獸或可怕。這足夠使人們
了解為什麼人民司法委員會的領袖們不遺餘力地企圖使難教化的囚犯從事生產工作。如果他
們的這些不時顯露的出奇的果斷能導入生產的路上，他們的成就一定了不得的。

另外一個我和他談過的叫莫斯科卡。他二十四歲，曾定罪十六次。當先在史凡爾特洛夫
斯克看守所時，不識字，而且毫無反悔的意思。那時有一位當地人民司法委員會的委員極其同情

囚犯們，因為他自己在革命前也會帶上腳鐐手銬，當過六年政治犯。他非常關心囚犯，竭力使他們不復抑鬱，作理智的考慮，而對社會生活發生興趣。他在囚徒中間感化力極大，但和莫斯卡侖可纏卻顯得吃力。他告訴我怎樣和這個人一星期又一星期漸漸接近，終於成功。因此解到尼許尼拖拉後，莫斯卡侖可就專心壹志地在木棧房工作。他不久學會寫字看書，變成突擊隊員，同時又是他一部份的政治領袖。他已在尼許尼拖拉耽了年半，現在切盼早釋，雖然他的徒刑是三年。他在我的記事簿上寫下了文字清通的申請書，託我帶交史凡爾特洛夫斯克刑庭，要我也說句好話。我和烏拉爾區刑庭長以他的事為題而作長談。「絕對的當然，我們要立即釋放他了。」他說：「這種人不應該等得太久的。我們必得鼓勵他作新的努力。你看見過他吧，他賭得不成話，毫無希望。現在可轉變了。」

囚徒的評論

壁報是囚犯們的喉舌。他們發現了工廠、公務員或同志們的任何過失，不必把苦痛悶在肚裏，都可以在壁報上發表的。稿紙都由囚犯們自己組織的編輯部審查，如認為不無可取，無不儘量刊登。俄國人愛用想入非非的誇張字眼，當他們對某件事表示反對的時候，舉個例，在太根卡看守所裏說是有一個囚犯開了「一月大百貨公司」，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吧。我猜想起來她大概只有幾雙漂亮襪子而已，因此引起了同伴的嫉妬。雖然，這些挖苦評論壁報也收羅的，所以我敢說它至少解除了不少人骨鯁在喉的痛苦。在太根卡監獄刷新的當兒，囚犯住得不很舒服，我在壁報上看到：「誰能夠找張報紙當作床舖真幸福啊！」

囚犯單調的呼聲而外，壁報也批評各項監獄活動。如果這些言論沒有人注意，下一期又來了，而且更激烈。多半是公務員們不敢忽視的，因為不然的話，他們難免要受人民司法委員會的責問。

壁報上常有特別關於囚犯的工作和學業的重要文章，那不僅僅是諷刺批評也有讚揚稱道以鼓舞別人的。以下我只挑選些犀利的不滿的批評，以顯示俄國囚犯的言論自由確乎是自由的。

× × × × × × × × × ×

蘇可爾尼基監獄壁報，一九三二年九月。

紡織工場的缺點

紡織工場的儲藏室裏毫無秩序。要用一樣東西，必得極費時間纔找得到。等到必要的東西尋着了，織機已停了，工作也就耽誤了。並且那裏面還堆積着許多我們絕不需要的機器零件，但是別處用得着。我們必須把這些送往用得着它們的部份。

「尖眼睛」

誰阻礙了海爾克來斯廠的工作？

囚徒的評論

機器修理所阻礙了我們的工作，因為它定修的機件並不按時送來。沒有螺旋釘，廠中一部份停工幾天了。技師去了三次，最後庫羅布新同志自己去，仍然沒有結果。這事不能這樣下去的。我們等着確實的答覆。

「等待着的人」

太根卡壁報，一九三二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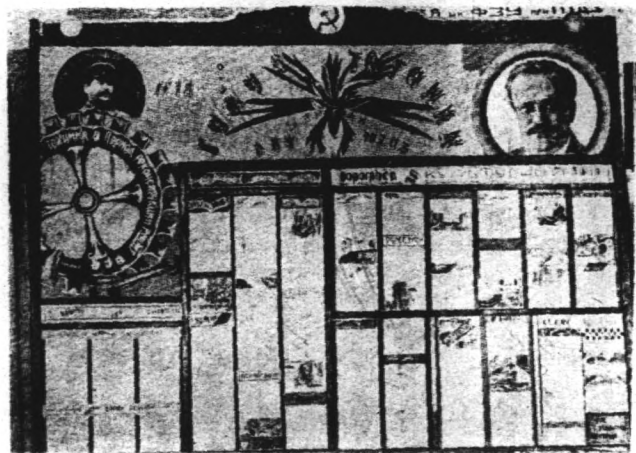
所謂突擊隊

夫拉索夫非常草率。他的位置上常常雜亂無章，做罷了工也從不弄齊整的。紀錄板和他風馬牛不相干，工作的質的方面他也絕不顧及。唯一的大事是拿工錢，其餘呢，如他所說「一笑置之」。檢查委員會應該留意及此。

「工人」



例 假 日



大 根 卡 的 囚 犯 壁 報

突擊隊員庫司尼查夫可以算當代的英雄。他懶得快出蛆了，睡着像根木頭，不能準時起床工作。有誰想去喚醒他，只不過去聽聽被頭底下呼里呼里的鼾聲而已。俄國俗語說得好：「工作不是熊，用不着逃進樹林的。」那末你，庫司尼查夫，你逃進什麼地方呢？

「伊凡」

我爲合理化計劃的建議已蒙採用了，當可減低生產品的成本。可是我尚未拿到酬報，雖然合理化委員會早已議決了給我的。我請編輯部幫幫忙。合理化委員會必不可以遲給，要不然囚犯們喪失建議權了。

「發明家」

這是不合理！

最近汽車間裏幾輛車子需要修理了。車間裏夠資格的工人不多，只是那些不懂車子的不熟

練工人。然而我們囚犯之中頗有幾年經驗的汽車技師不少，他們卻學非所用。例如在政治訓練部工作的蕭波許尼可夫就當過汽車匠和汽車夫，有十五年的經驗。把夠資格的人位置在不適宜的地方，真是毫無意思。

「阿立克」

選自全烏克蘭囚徒報工農通訊欄去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灰塵在我們眼裏！

在克里凡洛格農業區春天用的播種機仍舊留在田裏，而翁格爾技師，卻擔保我們說一應機器之類全保管得很好……。

「彼得倫科」

社會主義者的合作打倒富農

囚徒的評論

一八一

謝謝政治訓練部，把二十三個曳引機工人從契爾加斯克監獄派到這兒農業區來。農業區會舉行突擊隊競賽，那曳引機團體超過紀錄達百分之二五。厥後他們出了兩壁報，成就了集團訓練的工作。但是我們必須指出農業區公務員們的情性，因為他們沒有向囚犯解釋過社會主義者合作的必要。和以前一樣，富農們總反對突擊隊，淆惑人心，但我們強有力的抵禦阻止了他們的企圖。那曳引機突擊隊臨走以前，囚犯大會中檢討了過去的工作。突擊工作是由庫洛米查夫獄官私人管理的。他稱謝他們特殊的勉力，因而能增加收穫。送些錢給他們，而且給假五天至十八天。

「蘭馬」

蘇可爾尼基壁報，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又有懶蟲了

當得起這個尊稱的是那些遲上工的人——不遲的也可以在我們的一部份裏，現在新出現一種懶蟲：躲在廁所散心的傢伙。最近而且人數已有增加。你不信，往我們的廁所去，就可以發現那

兒有人滿之患。這一批人難得在機器旁邊做一些工作的，就只成羣結隊來來往往，從這一間廁所到那一間；而我們驚奇着我們的生產是落後了！這也是原因之一。爲改革起見，我提議下列的辦法：每個突擊隊員有一定的休息時間吸煙，他們往廁所就借這緣故。或者請隊長分配清楚工作時間，記下各人吸煙所費的時間。這辦法想來同志們一定同意的。那末懶蟲就此沒有法子了。

理論離開了實踐是沒用的

創辦每天夜課的目的是爲了造就合格的工人。第四天上午起他們只教些理論，而缺少實習。學用織機全體開着，選這門功課的人每天只聽見明天要實習了的預約，就此回家，主要生產組必須注意這些學程，而把學理和實際工作連繫起來。爲達到這目的，那些馬達須去修理，完全壞了的電氣馬達也應該換一個新的。理論離開了實踐是不中用的。

「但尼洛夫」

我們從未聽見我們的指揮和突擊隊

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指揮和突擊隊的議決案是這樣的：他們必須走在衆人之前，他們的權力應該擴展。我們這兒他們的位置呢？廠當局算遵守議決案了，把指揮和各部突擊隊長的力量盡一切可能地增加着，其餘的人跟着領袖們走。可是我們的領袖們糊塗而且紀律極壞。生產管理當局必須好好的管教他們一下，使他們能依照新的議決案做。

「拉獨爾斯基」

蘇可爾尼基壁報，一九三二年九月。

團體在那裏？

政治實習的團體怎麼啦？柏格司脫洛姆同志幹什麼事啦？爲什麼沒有教師啦？整個的八月過去了，一個學程都沒有開始。工作是必須鼓勵的。許多人想學習，只缺一位熱心的組織者罷了。

「螞蟻」

大家必須讀書

文盲學校管理不善，因此不識字的人仍沒減少。我們的任務是在十月革命十五週紀念以前把這沙皇政府遺留下來的劣點剷除盡絕。負責的人們應該記住，文盲必須站住腳跟。同時印刷所該幫忙把黨和政府關於這問題的議決案印出來。

「螞蟻」

選自史凡爾特洛夫斯克壁報，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史凡爾特洛夫斯克獄中的識字運動一向工作得不夠。在七月裏，只上了四小時課。不識字和缺乏常識的人數也沒記載。政治訓練部會引起了不逞之徒的圖謀反對這最關重要的運動的進行。終於舉行測驗，發現全獄共文盲一七〇人，推舉好各組組長，於是校中必要的書籍辦齊，一切佈置就緒。但革新不久，那最有勢力的文盲，皮爾定斯基、波歇可夫和其他幾人，常常脫課，而且陰謀使

其餘的人的熱心降低。那些反對剷除文盲運動的有力份子因此給帶到同志法庭，訊明有罪，判決不能提早開釋。現在，剷除文盲運動繼續在進行了。

拿文斯基壁報，一九三二年九月。

您來啊！

識字學校請諸位不識字的或只識一點兒字的同志們參加，你們的無知應該告終了。我們一定要成爲文明人，那麼可以和別的同志們一塊兒使社會主義成功。蘇維埃國不應該有半個文盲。

「希發諾伐」

來福托伏壁報，一九三二、三、卅一。

滋養的油！

近來晚餐裏的脂油很多，但是，有時晚餐端上來了，那股香味好得很，使我們竟難以把鼻子湊

近盆子，因為不能領教的緣故好多東西給人們丟掉了。不放油與不興雖然油是滋養的必需品，這些清水在菜羹和山蕒裏總比連晚飯都不吃好一點。

來福托伏，一九三一，十二，廿六。

吃飯要活命的！

我們的一部裏二十三日午飯中有牛皮一塊。牛皮怎麼會弄到鍋子裏的？也許從洗豬桶裏揀出來的吧？那天在廚房值班的同志們幹些什麼？是預備食物麻煩了他們，還是他們專門刮皮而絕不顧及別的同志們呢？我們哭訴醫師，答覆是我們不妨吃吃好了，換句話說他的意思是：「有什麼吃什麼。」監督員同志們查考一下吧。然後將來不會牛皮當午飯了。那牛皮尚存一二五號房間，是一個同志吃了嘔出來的。

錄自全烏克蘭監獄工農通訊去工作欄，一九三二，十。

儲藏室藏着衣服可是學生沒有穿

尼古拉葉夫實業區的物質環境並沒有阻擾學生們的進步。進學校的六十一個人，大都衣服敝舊。管理處早就收到給這些犯人穿的九十套衣服，但衣服至今仍躺在儲藏室裏，而管理人呢，也似乎躺着了。

來福托伏壁報，一九三一，十二。

洗澡日和開水

洗澡的日子特別能發覺，洗澡回來，常常很口渴——然而絕對沒有開水喝，除非你是監督，或恰巧在樓下值班。然而鍋爐室裏常有開水，幹麼不給確乎需要水喝的囚犯們？我們因此只好湊着水龍頭喝，算數，雖然大家知道浴後就飲涼水是多麼危險的事。管理處如果能想想辦法，那當然很好。

「阿爾麥司」

來福托伏，一九三二，三，卅一。

一五七號房間中兩人去做工了，還有一個根契洛夫在上課，房間裏沒有人了。當根契洛夫回來，看見房裏弄得七顛八倒，而他出去以前，門是明明關好了的。他就去叫監督員。那監督員在別的房屋間裏作樂，出來粗暴地說道：「你嘩喇嘩喇叫喊些什麼？」根契洛夫告訴他鞋子和麵包失竊了。他道：「那沒有什麼。他們會查出的，就查不出也不打緊。」這事極應該查究一下。

兒子和繼子

監督不小心的結果，廠裏的布疋給割斷了，物證俱全，犯罪的人們帶去訊問了，可是並沒有全體帶去。例如密乞洛夫，也曾割過幾疋布，然而既未申斥，又沒有責罰。教導員們不能待遇各人一律平等，而不痛愛兒子而苛待繼子呢？許多案件中，密乞洛夫常是作俑者和搗亂製造者。

打倒私交主義

私交主義現在在廚房裏極其盛行。監督員邱立可夫，配伙食的有名胖子庫諾赫，買辦，管開水的，洗碟子的以及其他，連棧房工人和圖書館員都在內，交情全都不壞。對於所有這些同志們我們務必出力，使他們的飯菜和我們完全一樣纔與。

蘇可爾尼基，一九三二年九月。

診察室關門了！

眼科診室說是爲一些有眼病的人們而設立的，然而事實上「門雖設而常關」，醫師也常不在。當他回來人們不容易瞞他，因爲一長串病人守候在門外終於輪着進去了，普通的藥方是這樣的：「我沒有時間了，我累得要命，你明天再來。」那意思就是：「我不在的時候你來吧。」這種待遇是不好的，希望主任醫師注意。

「鐵摩與科」

太根卡，一九三二年九月。

關於牙醫的三句話

三天前我往牙醫師處。我們的租長替我掛了號，但終於沒有受到診治。我牙痛得很，請編輯部幫幫忙。

「雪可爾基斯」

來福托伏，一九三二年十月。

我們已經討論過一次理髮室中的變態情形。但是忘記提起一樁事：價錢。人們看了那裏的價目表，會誤會是踏進了彼得洛夫加或脫凡爾斯加雅街的最講究的理髮店，而並非獄中的理髮室。我以為來福托伏監獄最好不要在理髮室上謀利，因為理髮是囚犯衛生上必需的事。太根卡的價目定得符合於囚犯們的收入。而我們理髮室的價目表卻使人望而卻步。我的意見是政治訓練部

應該研究這問題而會同管理處重新釐訂價目，使我們不當理髮是奢侈，而是正當適意的事。

「雪多爾」

拿文斯基女子監獄壁報。

八月九日廠裏發生了一場可怕的事。良好工人亞帕來伐很不幸，處在古來亦伐勢力範圍之下。那天傍晚亞帕來伐在廠裏做工，那妖怪出現了，而且跟她說：「停吧，我們還房間去。」亞帕來伐準備跟她走了。我轉向監督員，請她把她趕出去，她照辦了。不料古來亦伐指着監督員用盡各種龔駭字眼大罵起來。古來亦伐定該受罰的，我們請她以後不必上工廠了。

太根卡。

百貨公司！

讀者恐怕不相信太根卡獄中有大店舖存在，但是我保險，親愛的讀者們，那是事實。在九十六

號房間，婦女部份那乖乖的杜拉麥歌兒特地爲囚犯們開了一月百貨公司。結就的紗短衫、絲短衫、各種各色的長統襪、運動鞋和普通鞋、帽子、內衣、各色俱全，應有盡有。麥歌兒把這些東西賣給囚犯們。明天她將不得不上同志法庭了。私人的交易必得重重的懲罰。

蘇可爾尼基，一九三二，八，廿二。

四十四號屋裏恐怕是最後的爲文明生活作鬭爭的人類了。住在裏面的全都受過教育，而且文明。聽他們說話人們會誤會他們在搬動山峯，他們大概順利地在和平的敵人作激烈的戰爭吧。然而事實恰得其反。我覺得四十四號裏的罵人藝術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那理髮師，歌而諾夫，比誰都高明。他可以張開眼睛就開始咒罵，直到半夜。簡直沒有辦法。他每天發明新的咒罵，而且盡善盡美，收效極大。顯然他也不想休息。他得意洋洋地說道：「我出世就咒罵，我將咒罵而死，葬到泥裏，還是咒罵。」歌而諾夫曾定罪六次，今番最後的一次是爲了劫案。馬他也夫協助他，他們常常舉行咒罵比賽的。我們希望四十四號的寓公再順利地鬭爭下去，他們作模範來改造我們。

「唐斯可也」

第二道廊的舍長非但不禁止紙牌，而且自己玩着。他對於四十號裏成堆的垃圾一些也不干涉。四樓的教育監督巴勃立可夫拒絕在囚犯中實施教育訓導的工作。教育會的名單上必須把他除名。

來福托伏，一九三三，三，卅一。

我們這部裏賭風又盛了，不過謝謝「內部稽查」的留意，已給查出而報告管理部了。然而不幸，管理部似乎對此並無特殊的關心。十一月中旬賭客查出，紙牌充公者計有理髮匠卡洛明、鎖匠散支金、洗衣夫卡挺加和康士坦丁諾夫，管理部尚未處置這些賭客。那是賭風復盛的一個原因，同時也是宿舍失竊的原因。管理部現在必須切實注意這些事實。而把賭犯嚴辦。

拿文斯基女子監獄，一九三二年七月。

我們的外國部份！

拿文斯基可以分作兩部份：拿文斯基本身和第十號房間。住在別屋的人對集團發生興趣；她們去上課聽講。可是當她們一進十號，所有的興緻會完全消失，前後變了一個人。舉個例，當杜勃羅茜娜住在九號的時候，曾修畢了一個紅十字會課程，而且參加政治實習團體。現在變得豬一般懶了。波爾可芙尼茲加雅在八號的時候，盡責於社會，上學讀書，進了十號，就變成殭屍。那麼我們囚犯出身的守衛員呢？在任何團體中找不到她們。譬如加拉排亦夫；前途會極有希望。說是她要調往別處去的時候，挽留的聲浪不絕於耳。她有本領給叛徒們以好影響，她們也服從她。因了我們的懇請，加拉排亦夫現在纔能仍留在拿文斯基，大家情願聽她的話，但她從不到我們之中來。她穿上守衛員制服，就此安於尊貴。她也受到十號的影響麼？那是可能的麼？有生氣有活力的人們變成官僚階級！每天只做八小時門面工作，如此而已。我們必得把新空氣輸入十號房間。守衛員們，你們的責任並不單是站崗，也應該注意拿文斯基的集團生活啊！

×
×
×
×
×
×
×

壁報編輯不受公務員的任何干涉。所有給編輯的函件必須編輯直接拆閱，以使作者的隱名泄露。普通工廠和監獄裏一樣，批評都藉壁報披露，都是新俄的特點。我用這關於壁報的一章來結束我的報告，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刑罰制度工作中極重要的一部份。

末了，我要說這本蘇聯刑罰制度的調查錄難免有不完全之處。我能夠支配的時間只有六個月，那時在各種情況之下我專心於探聽各種儘可能直接的實際情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34170.1)

蘇聯監獄一冊

蘇聯監獄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 von Koerber
上海四門西倉橋街

譯述者 費祖詒
華興里四九號

主編者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3775

張

(本書校對者林懋民)

18



1.367